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洛林	厉以宁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克崱	朱 民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国宝	张晓强
张卓元	陈 元	林毅夫	周文重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楼继伟	聂振邦	樊 纲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 / 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 / John Frisbie
欧伦斯 / 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 / 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 / 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 / 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 / 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 / Marc Uzan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牛铁航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陈永杰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郑新立

副主编：王晓红 牛铁航

• 本刊专论 •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推进企业改革

李毅中(005)

“中国经济年会 2013-2014”专题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张晓强(015)

关于美国经济的几点分析

李德水(018)

中国外交：2013 年回顾与 2014 年展望

张业遂(020)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全方位发展

李礼辉(023)

中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季

贺 铿(026)

• 宏观经济 •

2013 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14 年经济形势判断

许宪春(029)

论新时期我国“两线一力”的反贫困模式

闫 坤 于树一(054)

• 国际经济 •

2013-2014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陈文玲(065)

从我国国际商务合作新趋势看企业发展新商机 沈丹阳(079)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排斥效应研究 姚战琪(089)

上海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汪胜洋 王 果(103)

• 理论前沿 •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

——国际社会政策模式、经验及启示 李 爽 常兴华 李 欧(113)

• 名人观察 •

智库建设要以搞好研究工作为基础 张卓元(122)

• 英文摘要(ABSTRACTS) • (125)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征稿通知 (128)

CONTENTS

Uphold and Improve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Promot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o Realize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Li Yizhong(005)

Five Keynote Speeches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a's Economy (2013-2014)

Zhang Xiaoqiang, Li Deshui, Zhang Yesui, Li Lihui, and He Keng(015)

Analysi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2013 and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4

Xu Xianchun(029)

China's "Two Lines One power" Anti-poverty Mode in the New Period

Yan Kun and Yu Shuyi(054)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Chen Wenling(065)

New Opportunities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from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operation

Shen Danyang(079)

Exclusion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Service Industry

Yao Zhanqi(089)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Wang Shengyang and Wang Guo(103)

What Kind of Social Policy and Welfare System Do We Need?

——International Social Policy Models,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

Li Shuang, Chang Xinghua, and Li Ou(113)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推进企业改革

李毅中

摘要：本文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现状，首先应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和认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落实到促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协调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发展上来；增强企业的活力，除在所有制上深化改革外，还要在管理体制、创新驱动、调整结构上下功夫；改革与发展要紧密结合，2020 年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基本实现。

关键词：基本经济制度 企业改革 新型工业化

作者简介：李毅中，全国政协常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设计了宏伟蓝图。其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其他方面的改革起着牵引作用。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要认真研读理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刻内涵，把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落实到企业层面，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解和认识

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的现状，从基本国情和实现改革发展的目标任务出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仍需要精心谋划、稳步推进。

第一，在经济体制改革框架中，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处在基础的位置。纵观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内容不断丰富。十五大首先提出了这一命题，并提出了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基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兴起了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的热潮。十六大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提出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动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丰富了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十七大提出“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基，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完善，牢牢把握并坚决贯彻到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之中。

第二，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富有新意的阐述。一是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指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这两个“都是”、两个“不可侵犯”准确地把公有和非公经济定位于平等的、“基础”的位置，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都是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不可分离、不可替代的组成。尤其是对非公经济的肯定、位置的提升和对非公产权的保护，大大鼓舞了民营经济、民营企业。二是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对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发展，是重大的理论突破。在股份制制度层面上突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开拓了实现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途径，使我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实践进一步扩展。三是在重申“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同时，尤其提出“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体现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落脚到增进一切所有制经济和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活力上。四是在十八大论述的基础上，更加完整地提出国家保护多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权益，保证多种所

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再加上“依法监管多种所有制经济”，充分体现了基本经济制度下，“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市场经济法则，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第三，企业是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是资本的载体，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落实到各类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之中。《决定》对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和鼓励支持非公企业健康发展提出了深化改革的内容。强调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改组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管资本要注重资本的流转进退、资本的保值增值、资本收益的分配、资本的再投入。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着力点，重点深化国有企业内部改革，针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特点提出了具体要求。可以体会到，国企改革的要求更高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更充足了，责任更大了。对非公资本和非公企业最关心的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问题，《决定》要求废除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具体办法，鼓励非公企业参与国企改革，鼓励发展非公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三个“鼓励”尤其后两个鼓励是新的亮点，必将进一步改善非公有制企业的外部环境，焕发出更大的生机。

二、促进国企、民企优势互补，协调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发展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落实到促进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协调发展、融合发展、共同发展。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几年，国企、民企都有了很大进步，但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继续努力。

（一）端正舆论导向，落实相关法规和政策，努力营造不同所有制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良好环境

国企、民企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优势互补，不可替代，同时都存在着不足和差距。在新形势、新情况下，尤其要互相多看优点，查找自身不足，增进了解，消除误会。应当承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不平等、不公平的状况，这不是企业层面的问题，而是体制机制的缺陷。要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政府转变职能等深化改革加以解决。对市场竞争中的问题不争论、不抱怨、不激化、不扩大、不炒作，端正舆论导向。希望政府和部门加快落实相关法规和政策，尤其是为各类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清除在行业准入、资质评定、项目许可等方面依附于行政权力和行政垄断形成的各种不合理规定，制定并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尽快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

国务院 2010 年 5 月发布《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 36 条”）后，在国家发改委的牵头组织下，到 2012 年 7 月，各相关部门共出台 42 项实施细则，20 多个省出台了实施办法。中小企业民营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金融服务领域虽然方向明确，但问题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明显存在。各部门的《实施细则》要有执行时间表和路径图，要落实到企业。政府要搭建公开透明的信息发布网络平台，强化政策落实，加强社会监督，促进民间资本进入“特许经营”的行业和领域。要充分发挥协会、商会作用，利用多种平台，组织国企民企交流学习、取长补短，增进互助互动，包容融合。

（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推进各类企业股份制改制实现股权多元化，有条件的要争取上市。要破除所有制界限，加大兼并、联合、重组力度，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可以广泛吸纳社会资金，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投资各方的优势和积极性，从而增强企业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活力。国有企业可通过国有股减持、增资扩股、股权分置、发行可转债等方式，进一步吸纳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及境外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有条件的大企业通过重组改制，争取整体上市。据了解，不少上市的国有企业国有股份仍占很大比例，仍有较大的减持空间。更多地吸纳社会资本，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影响力和竞争力。民营企业要通过合伙、合作、股份制改造，吸收包括国有股、社会公众股及外资股入股、参股，提升民营企业的社会化程度，有利于做强做大，有利于接受社会监督，保障决策正确和资本增值。提倡和支持国企、民企合资合作、兴建新项目、组建新公司，根据行业产业的实际状况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支持“引进来”、“走出去”，通过合资合作、并购、参股等方式吸纳境外资本。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是开拓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各类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社会公共事业和金融服务等领域的有效途径。

（三）完善、延伸产业链，促进大中小微企业共同发展

现代产业体系更加重视产业链的构建和完善，不仅增强行业的竞争力，而且使每个企业在行业发展中增强了自身实力。鼓励大企业、骨干企业与关联的中小微企业共同组成整体发展和专业分工体系，以业务为连接，以资本为纽带，形成产业联盟或产业集团。大企业、骨干企业作为龙头，将产品和技术向中小微企业扩展、延伸，做强、做优产业链；通过主辅分离，形成社会服务平台，更多地为小微企业服务，带动中小微企业发展。

同时，中小微企业或为大企业配套服务，或深度加工增加附加值，扩大了市场空间；明确产业定位，提高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和产业集聚水平，成为行业的支撑，提升行业竞争力。尤其重要的是，构建完善产业链要着眼于生产力要素的整合，不必带有所有制的标签，防止不正确的舆论误导，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通过产业链的不断整合、完善，不仅提升了行业的整体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而且促进了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的融合和发展壮大。

三、着力增强各类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激发非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就要落实到企业，夯实国民经济的微观基础。如何增强企业的活力，除在所有制上深化改革外，还要在管理体制、创新驱动、调整结构上下功夫。

（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形成企业富有活力的体制机制

现代企业制度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是适用的。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总体上已与市场经济相融合，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得到磨练和发展。经过重组改制，公司制、股份制普遍推行，明确了投资主体；经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工商登记等普遍建章立制，明晰了产权；经贯彻会计法、审计法等法律、法规，促进了规范经营，应当说多数企业有了很大进步。建立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既是现代企业制度的重点，也是形成协调运转、有效制衡运行机制的关键，但往往也是薄弱环节，尤其需要规范、完善。在股东大会的权力构架下，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构成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合理配置。就国有企业讲，还要处理好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新三会”和党委会、职代会、工会“老三会”的关系。经过多年实践，设立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是防止内部人控制的有效做法，国有企业党委书记任董事长并与总经理分设的做法也是有效方式。三中全会提出，“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般地讲，不少私营企业刚组建时规模小、企业成员单一，实行“家族式”传统的治理是可行的、有效的。但随着企业规模扩大，业务量倍增，特别是面对变化纷繁的市场竞争，企业不能单靠个人的魄力，必须依仗“团队”的智慧，避免决策的失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就愈加重要。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还要注重职业经理人的培养。企业无论大小，都应有忠于职守、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熟悉市场的高管人员。人才靠实践历练，靠学习提升，还要靠政策激励。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是新的突破，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劳动者利益共同体，可以极大地增强企业凝聚

力，使员工焕发出更大的聪明才智。

（二）依靠科技创新、技术进步，推进企业优化改造、转型升级，不断创造新活力

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创新，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评价成果、促进成果转化应用的机制。总之，科技创新源于市场、服务于市场。然而什么是市场导向？谁是市场？事实上往往不甚清晰，以至往往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并未真正落实。市场首先是指供需关系，要掌握经济社会民生的需求，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所在；其次是生产力的要素，如资源、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以及交通、物流、环境等条件的支撑或制约；再次是用户、顾客、消费者等服务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市场更重要的元素。实行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用户要自始至终参与研发研制的全过程，从实践的改进革新中提出创新思维，从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和缺陷，从而使研发研制更有针对性，提升研发的效率和水平。用户的参与密切了与研发的有机结合，心中有数才愿意承担试用的风险，为日后的推广、市场化打下基础。研发的目的全在于“用”，只有“用”才进入了市场，变为现实生产力。用户、消费者的体验就是市场的评价，用户、消费者的需求就是市场导向。

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大企业的骨干作用，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要求企业牢固树立创新驱动的战略意识。关键技术、核心技术花钱买不来，靠市场换技术的时代已经过去。大中型企业都要设立企业技术中心，吸引聚集一批专业人才，加大资金投入，组织消除瓶颈的技术攻关，组织“应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优秀骨干企业要成为行业的领头人，促进行业水平的提高。中小微企业要借助骨干企业和社会服务平台的支持和帮助，提升专业技术水平。尤其是科技型、创新型企业，体制新、机制灵、“术业有专攻”，具有较强的创新活力，更接近本专业的市场前沿，经过不懈努力，可以不断催生出新的专利成果。

（三）针对工业经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改革调整，促进行业、企业强身健体

在充分肯定成绩和进步的同时，我们要清醒地看到长期积淀形成的产能过剩、资源环境过载、科技创新不足、有效需求下滑、实体经济脱实向虚、企业和地方负债率高等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仍制约着工业经济的健康发展。经过不断实践，淘汰落后、化解产能过剩、兼并重组、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等调整结构的着力点已十分明确，有关政策措施也相对清晰，能否落实见效，关键还在于形成共识、付之行动。实施这些改革和调整的措施可能会暂时影响发展的进度、牺牲眼前的局部利益、带来一些难以避免的困难，但不改革、不调整，只会恶性循环、病入膏肓。

落后产能是高耗能、高污染之源，危害极大。要改进淘汰落后的标准，增加节能、环保、质量、安全等约束条件，主要用法律、经济、技术手段，加大淘汰、退出力度。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不到73%，其实不少行业都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的问题，2013年第1-3季度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不到79%。治理的药方已经开出，所列措施已实行多年，不仅成效不大反而愈演愈烈，潜伏着风险和危机。究其原因，关键要形成共识，正视而不回避，实干而不空谈。兼并重组要靠企业自愿或市场倒逼做出选择，政府积极引导而不包办，要在统计、税收、资产评估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鼓励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产业转移是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整合、结构调整。发达地区转出中低端产业，腾出空间和环境容量，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科研设计、总部经济等产业高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接收地区要根据当地资源、环境、市场条件，选定优势、特色产业，不盲目引进、全盘承接，防止落后产能的转承。产业集聚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节约能源资源、集约使用土地、保护生态环境，要总结经验和不足，改进提升各类园区的质量水平，与城镇化紧密结合。

（四）增强企业活力，要继续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

关于对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防止工业被“空心化”的警觉，2011年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近两年，在舆论导向、政策支持上做了不少工作，目前看仍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工业投入不足，资金供给紧张，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低下，与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互联网业形成极大反差。2013年的经济工作会再次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对实体经济的政策支持。

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更大程度上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加强对企业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产业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政府要进一步减税减费，近日抽样调研结果表明，工业企业平均税负占主营业务收入的7.8%，收费占4.05%，这种状况仍需改进。对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暂免营业税、增值税，特别是营改增等改革受到欢迎，但仍需提高额度、加大力度。金融体制改革正在推进，银行推进利率市场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关键是要引入民营资本，形成竞争机制，才能逐步降低贷款利息、提高存款利息、减少存贷差。

增强企业活力，要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投资主体。对国有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主要以管资本为主，减少对项目投资的审批，赋予更大的自主权，使国企能捕捉市场机遇，提高决策效率，获得发展的商机。对民营企业，最重要的是真正解决进入基础产业、特许经营的障碍，废除不合理规定，消除多种隐性壁垒，制定具体办法，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使民营资本发挥更大的功能效能，从而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四、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推进新型工业化基本实现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的历史阶段，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是重要目标之一，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发展是第一要务，改革潜能的释放将有力推动发展，要在发展中深化改革，注重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防止顾此失彼。不久前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了全面部署。

（一）要加深对工业化重要性和艰巨性的理解，不能盲目超越

剖析我国工业经济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自主创新不足。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不足 1%，发明性专利只占全球不到 3%，一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些成套设备、重要零部件元器件、关键材料依赖进口。二是资源环境难以支撑。2012 年全国一次能源消耗折 36.2 亿吨标准煤，用占世界 21.3% 的能源创造了占世界 11.6% 的 GDP。近 10 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平均 0.8，即使今后降到 0.5，GDP 年增幅降到 7.5%，2020 年全国能耗将达到 45 亿吨标煤，届时原油进口将达 69%。化学需氧量年排放 2500 万吨，氮氧化物、SO₂、氨氮等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均居世界首位。大气雾霾、水源污染成为社会公害。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少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落后产能占 15%到 20%，一些规模行业集中度不高，一些产品质量低下。四是地区、行业不平衡、不协调，区域经济、空间布局、产业链条、企业结构失衡，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产业雷同，园区集群化发展粗放。基本实现工业化，要破解这些结构性矛盾、深层次问题。

借鉴先行国家经验，结合当今时代特征，从国情出发，基本实现工业化的量化指标应从人均 GDP、工业经济技术水平、一二三产结构及工业产业结构、改善民生、提高生活质量等几方面设计。其中，人均 GDP 超过 1 万美元不成为问题，基本实现工业化，主要不是量的扩张，而是质的提高，不能再依赖量的增加，而要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增加附加值，减少能耗物耗、保护环境、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上述长期积淀形成的深层次问题和结构性矛盾要得到缓解，根治这些痼疾顽瘴的改革要经受阵痛，甚至要付出伤筋动骨的代价。

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阶段，“四化”同步发展，促进改善民生对工业化提出新的要求。依靠科技进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大力提高工业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尤其是解决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结构等方面的病灶，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实现工业化是全国概念，东部离不开中西部的资源和劳动力，同样中西部离不开东部的市场、技术和人才，全国一盘棋。总之，看到问题、设定目标，可知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幅提升信息化水平绝非易事，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建议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十三五”规划，尽

早提出 2020 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可量化、可达到、可考核的指标体系。

（二）改造优化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工业多数行业技术经济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工业经济的质量效益不高，集中表现在工业增加值率偏低，当前只有 26.5%，而发达国家为 35%-40%。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是工业化、信息化的紧迫任务。可以预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支撑我国经济发展还要靠传统产业的改造优化，在落实如前所述各项调整结构的改革措施的同时，要把更多的人财物投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上来，其中技术改造是重要的战略措施。以品种质量、节能降耗、减排治污、装备改善、安全生产以及信息化提升等为重点，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提升企业生产力要素水平，具有技术新、效益好、投资省、见效快等显著特点，是内涵为主的发展方式，必须持之以恒地抓紧抓好。据统计，2013 年 1-11 月技改投资占工业投资的 42.5%，同比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建议进一步增加投入，改进管理体制，更加注重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重点培育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不是追求数量，关键还是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新技术是新产业的灵魂，包括电子信息、能源环保、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国防科工等方面的 17 项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涵盖了上述战略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力争“十二五”取得决定性成效。当前各方发展新兴产业积极性很高，为防止盲目投资，要抓紧制定并组织实施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要抓紧编制技术标准、行业规范，制定出台支持政策，要改革不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机制、制度，要抓好典型示范工程。尤其是要注重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融合，传统产业为新兴产业提供了技术、装备、人才、市场基础。新兴产业要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扩大传统产业的先进生产能力，共同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

（三）大力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战略取向，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工业化进程中是不会改变的。大力发展服务业并不是要弱化工业。“退二进三”本意是指，工业产业空间布局在城市建设扩张的情况下，工厂由城区、近郊迁到远郊或进入工业园区，置换出的土地用做发展三产，利用级差地租解决资金来源，是可行的、成功的。但不应把地理位置的变化引申为产业的进退，“工业退、服务业进”，“二产退、三产进”，这样的思路是不合适的。

要鼓励和引导制造业围绕产品功能拓展服务业务，搞好售后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发展故障诊断、维护检修、检测检验、远程咨询、在线商店、更新改造等增值服务和专业服务，增加附加值。推进主辅分离，构建社会服务平台，推广服务外包，创新产业模

式。大力发展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科技管理咨询、工业设计、信息服务、软件技术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在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工业仍然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更多是工业的延伸。没有工业的充分发展，就没有雄厚的财政积累，也没有丰富的物质产品，服务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工业不应被“边缘化”，应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四）大力倡导绿色、低碳，工业发展要给力生态文明建设

不言而喻，工业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伴生着能源资源的消耗和“三废”的排放。一方面，工业文明可以与生态文明相统一，发展循环经济，采用先进技术设备节能降耗、减排治污，使之控制在大自然能够自我修复的范围内，维系和增加自然财富；另一方面，生态文明不是要回到原始文明，在重大项目决策时，应深入细致做好宣传解释工作，防止不正确的舆论误导，不能把工业发展与生态文明对立起来。要把人民群众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引导好、发挥好、保护好。

三中全会把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列为 15 项重大改革之一。生态文明建设要落实到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按照三中全会的要求，“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资源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首先要靠政府推动。加快资源价税费、环保税费改革，双高产业缴纳消费税，试行节能量、碳排放、碳交易等制度，尽快形成资源有偿使用、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建议要改进对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摒弃唯 GDP 的考核办法，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生态文明纳入任期目标责任制，制定完整的可测评、可考核的量化指标；促进各级领导把生态文明纳入发展规划并付之实施，防止和避免短期行为，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后代”。在城市扩建、项目决策、招商引资等重大事项中始终把资源环境承载、生态保护放在首位，把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具体化到各个层面。

全社会环境意识的提高将会有力促进工业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企业要落实到生产经营中去。节约资源就是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目前看企业对节能降耗普遍是重视的，但仍有不少企业对减排治污、保护生态不够重视，往往处于被动的、不自觉的状态，企业应自觉纠正，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相关部门和社会要加强监管。当前，尤其要顺应治理雾霾、保护环境倒逼机制，针对生产全过程存在的问题，加大投入补缺，减少各项排放，并达到国家标准。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中国经济年会2013-2014”专题

编者按：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年会 2013-2014”于 2013 年 12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以“改革新号角，发展新阶段”为主题，就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改革发展重大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期刊出五篇年会的演讲文章。张晓强在演讲中剖析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义与重点措施；李德水分析了美国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张业遂总结了 2013 年中国外交的成就，提出了 2014 年中国外交的重点；李礼辉展望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并提出了促进措施；贺铿阐述了我国当前及今后改革的重点、难点与热点问题。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张晓强

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

从全球范围看，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改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了历史性的交汇，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包括移动互联网、云计算高速发展，信息技术对生物技术、新材料、农业、工业、医疗健康的影响日益广泛，风能和太阳能利用日益广泛，高端装备制造取得进展。在此形势下，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大国都在抓这样的机会，我国抓住这样的机会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

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2012 年，我国消费了世界 50% 的钢、水泥、煤炭，石油进口依存度达到 57%，铜的进口依存度达到 70%，而大量消费能源资源所造成的大气、水、土地、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13 年以来，多次出现的严重雾霾天气，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创新的作用，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效地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战略。

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能就科技创新谈科技创新，要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单纯从资金数量来看，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技研发投入快速增加，2012 年已经超过 1 万亿元，达到 GDP 的 1.98%，比世纪之初翻了一番，但是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低、大量的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应用技术等问题十分突出。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 10% 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 40% 的水平。因此，必须将深化改革作为有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抓手，对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及相关的财税、人才、投资等多领域进行系统配套的改革，将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紧密结合，方能事半功倍。为此，要重点把握以下四点。

1. 着力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此，一定要把处理好市场和政府关系作为关键，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目前，我国大中型企业科技研发经费占工业收入比重 1%，与发达国家大企业占比 5% 的水平有很大差距。为此，要加快构建企业牵头，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支撑，各类创新体系相互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即使是一些基础性科研专项，注意也要发挥企业的创新作用。围绕激励企业创新，要完善金融、税务、价格、知识产权等管理政策，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打通科技与经济之间的通道。在我国财政科技支出中，企业仅占 15%，发达国家企业占 30% 以上，我们应积极研究提高财政科技支出用于企业比例的相关措施。

2. 产业领域积极作为，加强支持与协调。总体确定技术方向路线，以用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为抓手，抢占制高点，改革国家科技资源管理体制机制，解决好多单位分蛋糕、抢课题的重复浪费顽症，解决好科研单位与高校存在的大批高端科研装备不开放、不共享、低利用率问题。改革绩效评价体系，弱化发表学术论文数量、出了几位两院院士、获了多少科技成果奖等指标，突出发明专利授权、技术成果转化率、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考核。2013 年中组部发布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明确提出，要更加重视科技创新考核。目前，党政机关都在积极推动创新驱动。

3. 根据经济社会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

金链及相关支持体系。目前，我国正处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化解过剩产能的攻坚阶段。要通过积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发展现代农业，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这既是优胜劣汰、破旧立新，又能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作用。而通过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消费、新材料、物流等产业，也可以为化解产能过剩中突出的就业、税收减少等矛盾，提供广阔的增量空间，并提高我国产业的总体素质。

4. 深入把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丰富内涵，在加快科技创新同时，加强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近几年，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 iPhone、iPod、iPad 大获成功，这是基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用户体验创新的协同效应。近几年，马云先生创造的淘宝、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快速增长，2012 年交易额超过一万亿元，据说 2013 年达到一万八千亿，创造直接就业 130 万，间接就业超过千万人，这是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商业创新的有机结合。

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点措施

第一，结合深化投资管理制度改革，在最大限度取消和下放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权限的同时，及时建立、完善重要产业准入和监管机制，并充分考虑体现创新驱动发展。要使产业技术经济政策发挥重大作用，对钢铁、水泥、石化、船舶、光伏、装备产业，提出更高的技术标准，并提高环境保护、能源利用效率、资源利用效率、产品质量、安全和土地集约利用等标准。这样，通过努力既防止一放就乱，又在简政放权中更好地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

第二，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创新发展转型。东部地区基础能力强、科技资源丰富，但要素成本不断地上升，环境污染问题极为突出，资源约束瓶颈和转型升级压力增大。将京津冀、上海、江苏、辽宁等东部地区作为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推进区域，进行知识产品制度改革，完善科技创新投资、金融支持政策，加大国际创新合作力度，及时总结经验，有序扩大政策适用范围，推动高技术产业园区和高技术产业基地加快发展，实现创新发展的二次创业。

第三，研究制定重要产业创新发展路线图和实施方案。对能源、汽车、冶金、石化、集成电路等行业或者重要产品，明确提出创新发展的主要目标、技术路线、保障措施和推进时间表，使之与产业发展规划、重大生产力布局规划有机结合，协调推进。

第四，实施新兴产业引导工程。对信息消费及信息惠民、节能环保、宽带中国、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智慧城市、电子商务以及智能物流等，统筹推进重大产业引导工程，以企业为主体，政府给予引导支持，加快相关产业的技术创新步伐。

第五，实施创新企业百强工程。发挥好重点行业领军企业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引领

带动作用，积极提升骨干企业技术研发机构能力，推动建设更多的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产业技术联盟，支持企业建立与完善全球化的研发网络，更有效地开展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技术先进的创新型旗舰企业。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9 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我们要充分认识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关于美国经济的几点分析

李德水

一、美国经济出现回暖迹象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世界经济进入了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经济发展一直处于时好时坏、总体低迷的态势。作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的美国——这艘世界经济的超级航母，更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2012 年冬至 2013 年春发生了“财政悬崖”和“强制减赤”闹剧，2013 年 9 月又爆发了财政预算和国债上限危机，导致 10 月 1 日起美国政府关门 16 天，国债违约一触即发，在全球掀起了轩然大波。

从另一方面看，美国经济在急剧折腾中也出现了明显的转机。主要表现在：一是据美联储报告，2013 年第三季度美国居民和非盈利机构的资产净值增加约 1.9 万亿美元，达 77.3 万亿美元，美国居民负债率回落到长期趋势水平。这说明美国家庭部门去杠杆化已基本完成。二是从 2012 年 2 月份开始，房地产市场回升，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的销价和销量以及新房开工率都增长了 10% 以上。三是 2013 年美国股市有望创下 10 年来的最佳年度表现，道指已上涨 20%。四是美国人的借贷意愿增强，2013 年第三季度抵押贷款折年率增长 0.9%，为 2009 年年中以来首次实现正增长，消费信贷第 3 季度增长 6%。五是经济增长环比折年率逐季上升：2012 年 4 季度增长 0.1%，2013 年一季度 1.1%，二季度 2.5%，三季度 4.1%，预计四季度会有所回落。

二、2014 年初美国或可顺利渡过财政预算和国债法定上限危机

2013 年 10 月 17 日凌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妥协，把 2014 年财年预算案推到 2014 年 1 月 15 日再议，国债上限法案延至 2 月 7 日再谈，双方暂时休战，轻松过个圣诞节。人们关心的是，届时会不会又大闹一场呢？我估计，会比较缓和地得到解决。预算方案两党争论的焦点，在医改法要不要推迟一年实施，预算支出额的差距只有 700 亿美元。2013 年 11 月 14 日，奥巴马总统已决定推迟一年实施新医疗保健法，并在白宫说：“有好几次我曾认为，我们被不公正地打了耳光。好吧，这个耳光是该打的，我们认错。” 共和党已经满足了要求并挣足了面子。12 月 10 日，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代表举行会谈，已就预算案达成协议。所以，2014 年元月份乃至今后至少两年内，美国政府不会再出现关门事件了。国债上限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其实，2013 年 5 月份美国国债余额就已达 2011 年 8 月 2 日通过的 16.7 万亿美元的法定上限。财政部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拆东墙补西墙，苦苦支撑到 10 月 16 日。17 日达成协议允许再借债，国债余额当天就上升到 17.076 万亿美元，即一天增加了 3000 多亿美元。下一轮国债法定上限将定为多少？我估计，可能要到 20 万亿美元左右，否则过不去。这样，美国国债余额与 GDP 之比更要远远高于欧元区的水平。人们不要把国债问题的争论简单地看作是民主、共和两党选战的需要。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过：“要征服和奴役一个国家有两种方式：剑和债。” 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国家可以靠长期大量举债去保持它的伟大。防止美国国债过多地增长，是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甚至兴衰安危的大事。2013 年 11 月 10 日，美国共和党名人沙拉·佩林说，美国政府开支靠向外国借钱，这些债务一旦到期，美国会像奴隶一样“受制于外国主人”。2001 年美国国债余额 5.77 万亿美元，小布什总统任期 8 年翻了一番，达 11.88 万亿美元。奥巴马在 2008 年大选中抨击小布什说，他“任内 8 年所干的就是以我们孩子的名义找中国人民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如今奥巴马只干 5 年总统，国债余额就增加了 5 万多亿美元，再干 3 年必将超过小布什的“政绩”。这是很难扭转的现实。不过，共和党出于明年届中选举的需要，在下一轮国债上限谈判中可能会收敛许多。但从长远看，这终究是一大难题。美国的根本出路在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

三、用平常心去看美联储淡出 QE3

由于美国经济明显回暖和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 2013 年 1 月 23 日突破 3 万亿，达 3.01 万亿美元，急剧上升到 12 月 18 日的 4.01 万亿美元，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猛增 1 万亿美元，美联储 12 月 18 日宣布将从明年开始小幅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同时加强对超低利率政策的前瞻指引。2013 年 5 月，伯南克说了一句“将适时淡出 QE3”，就引起

国际金融市场的不少震荡，许多发展中国家资金外流、货币贬值。这次是否又会引起一场国际风波呢？我估计，肯定有影响，但不会太严重。从每个月购买 850 亿债券，到每月缩减 100 亿美元（其中：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MBS 和美国国债各缩减 50 亿美元），不应该引起太大的杠杆效应。而且，如果美国失业率出现反弹，这项政策还可能回调。美联储是在投石问路，底气并不很足。2013 年是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集体走低的一年，只有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近 2.5%。在国际金融资产纷纷流向美国的同时，由于人们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以及其他的原因，也有大量外资流入中国。2013 年 10 月份，中国外汇占款猛增 4416 亿元，为 9 月份的 3.5 倍。9 月份，中国增持美国国债 257 亿美元，10 月份又增持 107 亿美元，余额达到 1.3045 万亿美元。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

中国一向奉行和平发展、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互利共赢的宗旨。中美建立起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两国人民，也有利于全世界人民。中国对美国以诚相待，特别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与美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我们购买美国国债从来不附加任何条件，但美国有些决策者却将中国的发展当成威胁，尤其是近年来加大了遏制中国的力度，在东亚和南海做了一系列小动作，这是不利于新型大国关系健康发展的。

2013 年 3 季度末，中国外汇储备已达 3.66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 1/3，为英国 2012 年 GDP 的 1.5 倍，以后还会继续增加，其中绝大部分都投放在国际市场，而如此巨额的外汇资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却并不十分明显。我们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其杠杆作用，为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的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外交：2013 年回顾与 2014 年展望

张业遂

一、2013 年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

2013 年是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一年。总的看，虽然世界很不安宁，但和平

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世界经济转型调整深入推进，变革的浪潮更加强劲。2013 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第六个年头，世界经济令人喜忧参半，既有积极信号，也有新的麻烦，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面对复杂形势和挑战，各国更加认识到，不改革没有出路，不创新没有发展。主要发达国家致力于抑制金融泡沫、增加实体经济比重，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从全球范围看，以基因科技、页岩油气开采、清洁能源开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代生物、能源、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入交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蓄势待发。

国际社会要和平、求合作的呼声更加强烈。叙利亚问题从战争边缘被重新拉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尽管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尚面临诸多困难，但销毁化武的工作已顺利开展。6 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历经 10 年谈判达成初步协议。巴以和谈得以恢复。朝鲜半岛局势备受关注，各方积极探索重启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世贸组织达成成立 18 年来首个贸易协定，为多边贸易体系注入新的活力。

国际体系变革取得新进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稳步提升。二十国集团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新兴市场国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金砖国家在建立开发银行、外汇储备库等方面达成初步共识，进一步增强了新兴市场国家合作的生机与活力。

二、2013 年中国外交成就斐然

2013 年，中国外交在保持大政方针稳定性和延续性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勇于担当，进一步开创了新的局面。

一年来，中国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 2013 年全国“两会”之后短短 8 个多月里，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出访亚非欧美四大洲 22 个国家，接待 64 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华，同 300 多位外国政要会见交流，中国与各国达成近 800 项合作协议，有力推动了中国同各国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多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中欧签署《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确立今后 5 到 10 年双方关系发展蓝图。中国同周边 21 个国家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级别交往，拓展了务实合作。中非新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水平，中拉整体合作取得新进展。

一年来，中国外交提出一系列新理念。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梦重要思想，把中国梦

与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紧密相连，成为连接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重要纽带。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就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我们强调在与周边各国交往中践行亲、诚、惠、容的理念，充实了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我们坚持正确义利观，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恪守互利共赢原则，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一年来，中国外交提出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领导人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一系列重大合作倡议。这些倡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和区域合作方向，有利于共同发展。

一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在叙利亚、朝核、伊核等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作用。我们首次派出安全部队参加联合国马里维和行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禁化武组织的有关决定，中国已决定同俄罗斯等国一道为销毁叙利亚化武提供海上护航。

三、2014 年中国外交的重点工作

中国外交的核心目标是为国家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进一步深入推进经济外交，重点做以下五方面工作。

1. 我们将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将中国自身发展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强中外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今后 5 年，中国进口商品将超过 10 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过 5000 亿美元，出境旅游人数超过 4 亿人次。中国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给各国投资者带来更多商机，也将给各国普通民众带来更多实惠。

2. 我们将积极致力于同世界主要经济体建立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强相互沟通和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确保全球金融的稳定。

3. 我们将努力维护开放、自由的贸易环境。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达成早期收获协定，这个成果来之不易，说明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生命力。中国是世贸组织的重要成员，在谈判进程中发挥了积极和建设性作用。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中国已经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2 个自由贸易协定，正在谈判的还有 6 个，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中韩、中日韩、中澳、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2014 年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人非正式会议，包括自贸区在内的亚太区域一体化是重要议题。我们希望国际上各类自贸谈判保持透明、开放和包容，多一些交流和交融，少一些排他和封闭，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和全球贸易自由化贡献正能量。

4. 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目前，境外中国企业数量超过 2 万家，直接投资存量达 5000 多亿美元，对外投资额已跃居世界第三位。我们将为中国企业提供政策法律咨询，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引导企业遵守当地法律，尊重当地习俗，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们还将继续加强对海外中国公民的领事保护力度，通过与有关国家商签互免签证协议，增加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方便中国公民的海外出行。我们同时希望各国政府对中国企业投资持开放态度，为中国企业创造公平、友好、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5. 我们将积极配合加强有关地方跨境口岸和经济合作区建设，协助沿边地区在周边自贸区建设方面先行先试，为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对外交流合作提供便利条件，加快周边互联互通网络建设，使沿边开发开放与周边外交形成互利互补局面。

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的深入推进，中国发展将进入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并将为世界发展增添开放合作共赢的新动力。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同世界各国将在改革创新的大潮中携手并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外交部副部长)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全方位发展

李礼辉

一、人民币国际地位迅速提升，但国际市场份额仍不高

2009 年 7 月，人民银行颁发《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经过几年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显著成绩。

2013 年 1-11 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达到 4.0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量达到 4045 亿元，同比增长 83%；海外人民币存款总量由 2010 年的几百亿元增长到目前的 1.2 万亿元左右。

跨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发展带动了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显著上升。国际清算银行（BIS）

报告显示，人民币已跃居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最活跃的 10 大货币之列，交易地位从 2010 年的全球第 17 位跃升至第 9 位，日均成交额增长 2.5 倍。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信用证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例，已由 2012 年 1 月的 1.89%，上升至 2013 年 10 月的 8.66%，超过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与此同时，中国和有关国家、地区的货币合作不断深化，已经与 23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超过 2.5 万亿元。此外，东南亚、东欧以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考虑将人民币作为官方的储备货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目前人民币的市场份额仍不高，人民币支付的市场份额只有 0.84%（第 12 位），排名甚至落后于泰铢（第 11 位）。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只有亚洲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柬埔寨、韩国、中国台湾，非洲的尼日利亚，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欧洲的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十分有限。

中国银行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也是全球跨境人民币业务规模最大、专业能力最强的银行。四年多来，中国银行集团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累计超过 7.2 万亿元，业务规模 and 市场份额遥遥领先国内外同业。与此同时，中行建立起了覆盖全球的人民币清算网络和支付体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人民币存款、贷款、结算、投资和交易产品线，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人民币服务。

二、未来人民币将成为全球主导货币之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币国际化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未来 15-20 年，人民币有望成为全球主要的结算、支付、交易和储备货币之一。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会在三个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人民币在贸易、投资结算中的比重将显著提高。未来我国对外经贸金融合作将更加多元化，特别是与周边国家的贸易投资往来日益频繁，人民币将越来越多地作为结算货币使用。预计 2015 年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贸易、投资结算中占比将达 15% 左右，2025 年有望超过 30%。

第二，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将不断扩大。未来上海会逐步形成成熟的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结算机制，建成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中心、人民币产品基准价格形成中心、大宗商品定价中心和金融资讯服务中心，从而有望发展成为重要的在岸人民币市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地位将进一步突出。我国也将加强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协调推进伦敦、新加坡、卢森堡等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第三，人民币国际地位将稳步提升。随着全球结算、清算、交易网络不断完善，未

来人民币可能成为全球主要的交易货币，人民币在跨境结算、融资、避险和保值等领域将被更加广泛地使用。另外，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 2025 年，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构成中的比重有望超过 5%。

三、培育新动力，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全方位发展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全方位发展，必须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不断培育新动力。

第一，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件，也有利于资本流动更加平衡，减少跨境资金套利动机，促进在岸离岸市场有效运行，确保人民币国际化的健康发展。建议先放开长期资本流动、后放开短期资本流动，先放开直接投资、再放开间接投资，先放开流入，后放开流出，抓紧推进商业信贷、债券类、股票类证券交易的相关改革，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仍然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加强反垄断审查，完善反洗钱反恐融资政策，清理并废除超国民待遇，建立黑名单制度，增加非居民存款的准备金要求，对短期资本流动征收托宾税等，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防止跨境资本流动（特别是投机性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维护市场稳定。

第二，推动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大宗商品进口大国，但是，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几乎都以美元计价，这不仅会带来汇率风险，而且会增加中国企业在大宗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成本。只有实现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才能进一步推动与之相关的贸易、投资、金融领域的人民币业务。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已经在上海自贸区成立，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未来可考虑以此为基础，建立以人民币定价的大宗商品定价体系，为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进一步创造条件。

第三，支持上海建设全球人民币中心。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为中国金融业开放提供了一块试验田。要发挥上海自贸区的先行先试作用，促进人民币回流渠道多样化，提升金融市场开放度，扩大人民币在资本配置和金融市场中的使用，以此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支持上海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人民币中心。

第四，促进在岸、离岸人民币市场协同发展。继续拓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更好地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积极推动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逐步形成全球人民币市场体系。同时，加强境内外市场衔接，积极探索在境内发展跨境人民币业务，逐步缩小人民币离岸和在岸价格差异。

第五，发挥我国大型商业银行引领作用。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责无旁贷，应当扮演人民币跨境流动的主渠道角色，更多参与大型跨境投资项目，

更快提高金融创新能力，大幅提高外汇交易水平，优化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布局，更有力地支持人民币国际化的全方位发展。

展望未来，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以及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币在全球市场的使用范围会越来越广，将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快速增长。作为主要服务银行，中国银行将继续提供一体化、高质量、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银行原行长）

中国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季

贺 铿

一、改革必须先有理论突破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的新号角，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大连达沃斯论坛致辞中所说：“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这充分说明：将要发生的故事不仅仅是产业升级，更重要的是经济体制要升级。要实行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经济体制“双转型”，中国将正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主要是创新发展，依靠科技使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主要依靠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使社会由人治向法治转变，使经济由政府起决定作用向市场起决定作用转变。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由政府主导、央企垄断的半市场经济向各类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的全面市场经济转型。

长期以来，对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一直裹足不前。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才是本质特征。回想过去，“姓资姓社”问题就像一个幽灵，始终困扰改革的深入。如果没有邓小平果敢避开这个幽灵，提出“不争论，发展是硬道理”，我们的改革有可能早已夭折。由产品到商品，由公社制到家庭责任承包制，由纯国有企业到发展民营企业，由纯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突破。没有这些突破，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改革成果。

二、改革要有顶层设计，需要大胆实验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启动“第二季”的改革试验区。中国体制经济改革“第一季”从深圳特区开始，不仅成功启动了改革，而且创造了过去35年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我深切希望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能顺利启动中国经济改革“第二季”，并且写出更加精彩的故事，引导全国人民创建更加繁荣昌盛的中国。正象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走到了这一步，就该选择一个新的开放试点。上海完全有条件、有基础实验这件事，要用开放促进改革。”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际上是以“开放”倒逼“改革”。从试验方案看，涵盖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敏感领域：其一，着力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市场行为的主导权更多地给予市场主体，使政府从过去的管理型逐步转变为服务型。其二，强调了企业法人可在自贸区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其实是把自贸区当成金融改革的试验田。其三，启动了多项文化产业政策，创造性地提出了“负面清单管理”办法。现在有一些人反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就像当年反对深圳特区一样，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捍卫社会主义。这说明试验区击中了要害，我们一定要像邓小平推进深圳实验一样，大胆、全面、深入地推进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试验。

三、金融改革不是深化而是要创新

金融改革将是重头戏，应该是第二季精彩故事中的重要内容。西方的金融理论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也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说其他改革是深化，金融改革则是要创新。不客气地说，35年的改革，最不成功的改革是金融领域的改革。金融创新的出发点，是立足金融机构不可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归宿点是如何达到高效率为实体经济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重温马克思的论述。

我们应该记取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决不可以使金融资产泡沫化、实体经济空心化。近年来，一些人“食洋不化”，忘掉了金融的本质任务，夸大了“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趋势和货币资本的作用，片面强调所谓“金融产品创新”和“钱能生钱”的思想理念。在此理念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倾向，助长了金融投机行为。“虚拟经济”膨胀和实体经济萎缩，这是形成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我们应该反对“脱离实体经济而追求货币自行增殖的资本拜物教妄想”，要限制和规范使用金融杠杆工具。美国次贷危机实际上是金融机构过度使用杠杆交易的结果，投机者把本来数额不很大的“次等级贷款”进行包装，通过证券交易达到“增值”目的，一

味推动证券市场决定金融产品价格，从中获取巨额投机收益，产生了巨大的金融资产泡沫。当次贷引起资金链断裂时，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出现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或亏损。这就是美国引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实质。

为了有效避免金融危机，当前，我们应该重点改革金融监管方式，严格防止资金脱实向虚，以钱炒钱。切实保证金融为实体经服好务。

要尽快立法建制，促进成立民营金融机构，在依法依规实行有效监管和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鼓励民营金融机构与其它金融机构平等竞争。当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是国有银行垄断、影子银行投机。公平竞争可以打破垄断，减少投机，有效保护投资者利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四、中国仍有继续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空间

当前，中国经济还面临不少困难，但是，只要宏观政策稳，注意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还有较大的跨越式发展空间。所谓“跨越式发展”，是指在引进、消化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缩短发展时间的发展。日本上世纪 50、60 和 70 年代的高速发展，是跨越式发展的典范。引进、消化、创新是当时日本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其 30 年的高速发展经验和之后 20 年停滞不前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信息化，处在所谓“后工业化”时代，需要新的技术创新才能实现快速发展。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国外还有许多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值得我们引进、消化，为我所用。因此，我们仍有继续实现跨越发展的空间。但是，必须实现经济转型，由依靠人口、劳动力红利和拼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转向以信息化促工业化的科学发展方式。

如果我们适时转换发展思路，调整财政货币政策，还可以恢复并维持较长时期 9% 左右的高速增长期。目前，经济下行是前期发展的后遗症，经过 3 年左右的调整，可以重回 9% 的增长速度。日本从 1964 年人均 GDP1000 美元到 1982 年的 10000 美元，只用了 18 年，亚洲四小龙也只用了 17 年或 18 年。中国 2003 年已实现人均 GDP1000 美元，在 2025 年以前可以突破人均 GDP10000 美元。也就是说，我国至少还有 10 年以上跨越发展的空间。要实现跨越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转换发展方式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号角已经吹响，方向已经明确，重在行动。

(作者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

责任编辑：刘英奎

2013年经济形势分析与 2014 年经济形势判断

许宪春

摘要：本文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 2013 年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包括从生产和需求两个角度对 2013 年的经济增长形势进行分析；从季度、月度居民消费价格变动和居民消费价格变动与相关价格变动关系角度对 2013 年的通货膨胀形势进行分析；探讨 2013 年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基本特点。第二部分是对 2014 年经济形势进行初步判断，包括从生产和需求两个角度对 2014 年经济增长形势进行初步判断；通过对影响居民消费价格变动的若干因素分析，对 2014 年通货膨胀形势进行初步判断。

关键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形势分析

作者简介：许宪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

一、2013 年经济形势分析

2013 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居民消费价格保持温和上涨。

（一）经济增长形势分析

本文从两个角度对 2013 年我国经济增长形势进行分析。一是从生产的角度，也就是从国民经济主要行业增加值变动的角度进行分析；二是从需求的角度，也就是从消费、

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变动的角度进行分析。

1. 生产走势分析

201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68845 亿元,增长 7.7%,增速与 2012 年持平。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6957 亿元,增长 4.0%,增速比 2012 年回落 0.5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 249684 亿元,增长 7.8%,增速比 2012 年回落 0.1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 262204 亿元,增长 8.3%,增速比 2012 年回升 0.2 个百分点。

(1) 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2013 年一至四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分别增长 7.7%、7.5%、7.8%和 7.7%。二季度增速最低,三季度增速最高,一、四季度持平,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之间仅相差 0.3 个百分点。2012 年一至四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分别增长 7.9%、7.4%、7.3%和 7.8%。前三季度增速逐季回落,四季度增速回升,一季度增速最高,三季度增速最低,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之间相差 0.6 个百分点。可见,2012、2013 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前四年的经济增长表现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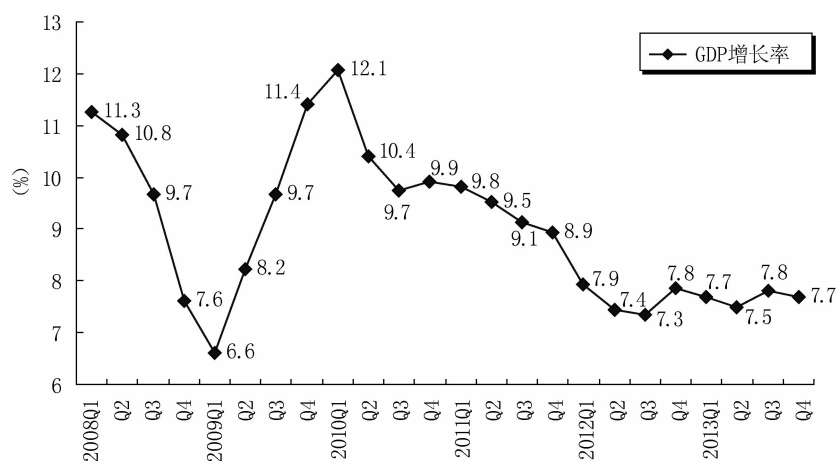


图 1 2008 年以来季度经济增长率 (%)

从图 1 可以看出,2008 年以来,我国季度经济增速明显地表现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2008 年一季度至 2009 年一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快速下降,从 2008 年一季度的 11.3%下降到 2009 年一季度的 6.6%;第二阶段,2009 年二季度至 2010 年一季度,经济增速逐季快速上升,从 2009 年一季度的 6.6%上升到 2010 年一季度的 12.1%;第三阶段,2010 年二季度至 2012 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先是快速下降,然后是比较缓慢地下降,从 2010 年一季度的 12.1%下降到 2012 年一季度的 7.9%;第四阶段,2012 年二季度至 2013 年四季度,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增速位于 7.3%至 7.8%之间。

(2) 工业保持平稳增长。工业增速主要决定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013 年,我国规

模以上工业增长 9.7%，比 2012 年回落了 0.3 个百分点。其中一至四季度同比分别增长 9.5%、9.1%、10.1%和 10.0%。二季度增速最低，三季度增速最高，最低增速与最高增速之间相差 1 个百分点。实际上，2012 年二季度至 2013 年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速一直位于 9.1%-10.1%区间，所以，这期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保持平稳增长，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前 4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的波动幅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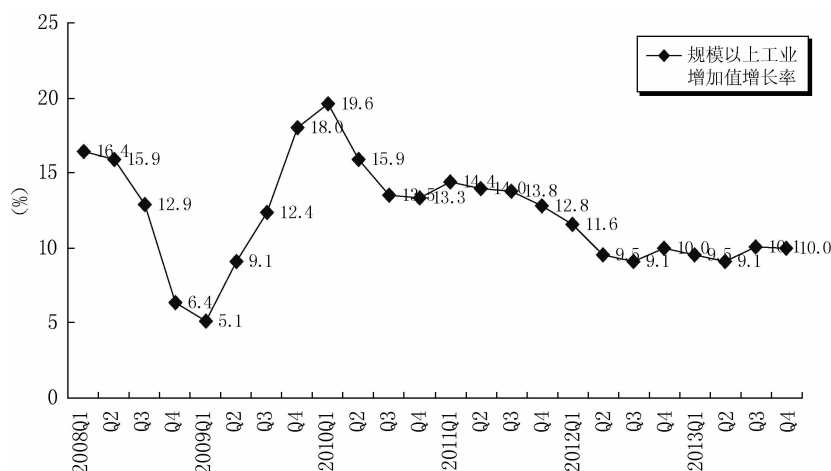


图 2 2008 年以来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率 (%)

从图 2 可以看出，除了波动幅度不同外，规模以上工业季度增速走势与经济总体非常类似，2008 年以来，明显地表现为四个不同的增长阶段：第一阶段，2008 年一季度至 2009 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逐季快速下降，从 2008 年一季度的 16.4% 下降到 2009 年一季度的 5.1%；第二阶段，2009 年二季度至 2010 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逐季快速上升，从 2009 年一季度的 5.1% 上升到 2010 年一季度的 19.6%；第三阶段，2010 年二季度至 2012 年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先是快速下降，然后是比较缓慢地下降，从 2010 年一季度的 19.6% 下降到 2012 年二季度的 9.5%；第四阶段，2012 年三季度至 2013 年四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保持平稳增长，增速位于 9.1% 至 10.1% 之间。

从月度看，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最低增速为 3 月份和 6 月份的 8.9%，最高增速为 8 月份的 10.4%，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仅相差 1.5 个百分点。实际上，2012 年 4 月份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始终保持在这一区间。所以，从月度看，2012 年 4 月份以来，规模以上工业保持平稳增长，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前 4 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速的波动幅度形成鲜明的对比（见图 3）。

（3）建筑业保持平稳增长。2013 年，建筑业增长 9.5%，比 2012 年上升 0.2 个百分点。其中，一至四季度同比分别增长 9.8%、9.5%、9.8%和 9.2%。一、三季度增速持平，二季度增速比一季度回落 0.3 个百分点，四季度增速比三季度回落 0.6 个百分点，最高

增速与最低增速仅相差 0.6 个百分点。2012 年一至四季度，建筑业同比分别增长 9.8%、9.1%、9.3%和 9.4%。所以，2012、2013 年建筑业增速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最初几年增速的波动幅度相比，显得相当平稳（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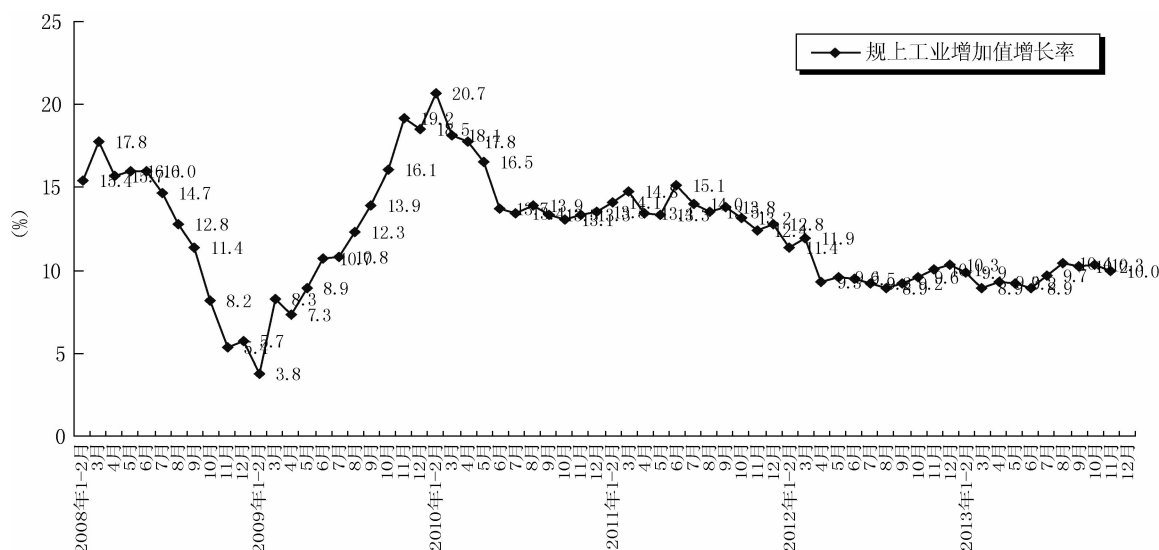


图 3 2008 年以来月度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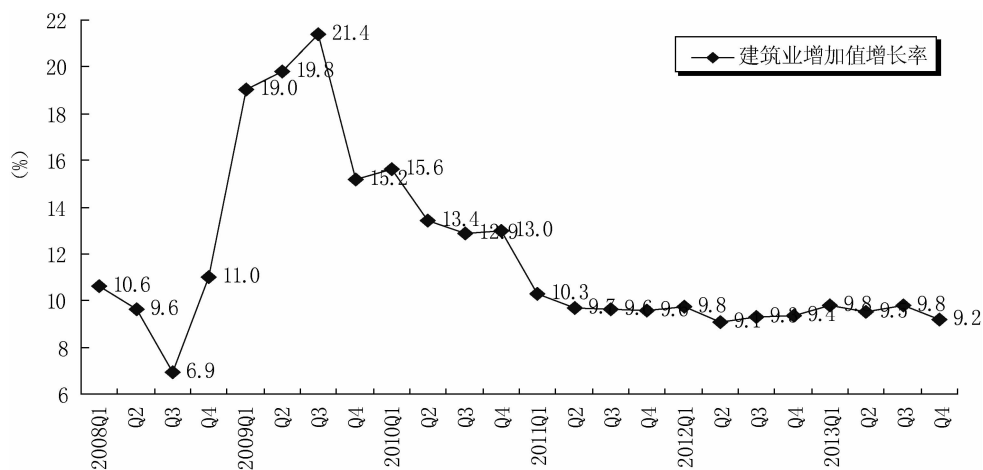


图 4 2008 年以来季度建筑业增长率 (%)

（4）第三产业保持平稳增长。2013 年一至四季度，第三产业分别增长 8.3%、8.3%、8.4%和 8.1%。前两个季度增速持平于 8.3%，三季度增速略有上升，四季度增速略有回落，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之间仅相差 0.3 个百分点。2012 年一至四季度，第三产业分别增长 7.4%、7.9%、8.2%和 8.4%，增速逐季平稳上升。近两年第三产业增速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最初几年增速的波动幅度相比，显得比较平稳（见图 5）。

综上所述，从经济总体看，2013 年我国经济增速与 2012 年持平；2013 年当年保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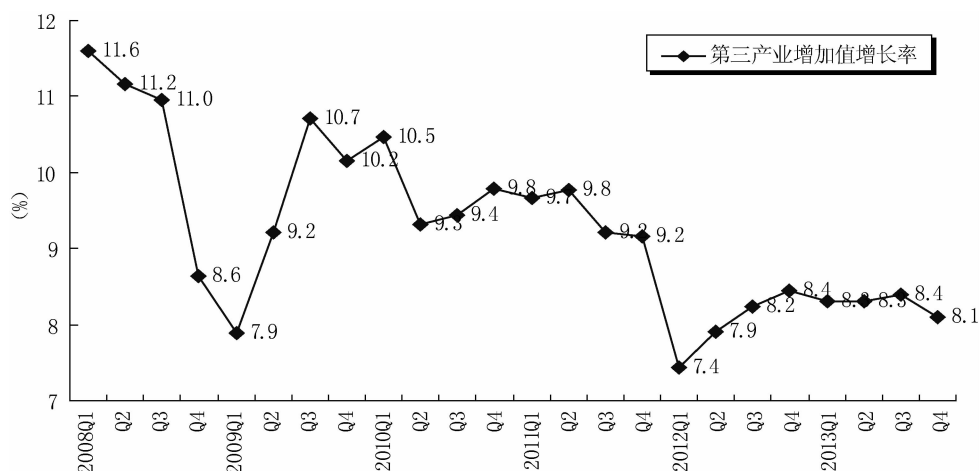


图 5 2008 年以来季度第三产业增长率 (%)

平稳增长。从一些重要行业看，与 2012 年相比，2013 年工业增速略有回落，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增速略有回升；2013 年，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均保持平稳增长。

2. 需求走势分析

(1) 居民消费支出保持平稳增长。居民消费支出包括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住户调查中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年度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趋势；住户调查中的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季度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趋势^①；住户调查中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年度和季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趋势^②。

2013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12.1%，实际增长 9.0%，分别比 2012 年回落 1.1 和 1.4 个百分点。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同比名义增速分别为 12.9%、12.8%、13.8%和 12.9%；同比实际增速分别为 10.1%、10.0%、10.8%和 9.8%。所以，2013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低于 2012 年，但 2013 年年内，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都保持平稳增长，并且仍处于历史上较快增长水平（见图 6）。

①住户调查中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年度调查指标，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是季度调查指标，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既包括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也包括实物消费支出，主要是农民关于自产自用的农林牧渔类产品的消费支出，后者只包括现金消费支出，不包括实物消费支出。

②住户调查中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支出法 GDP 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在基本用途、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和数据表现等方面都存在区别，参见许宪春：《准确理解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第 4-24 页。但是，在现行的所有有关居民消费支出的专业统计调查指标中，住户调查中的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是与支出法 GDP 中的居民消费支出在口径范围上最接近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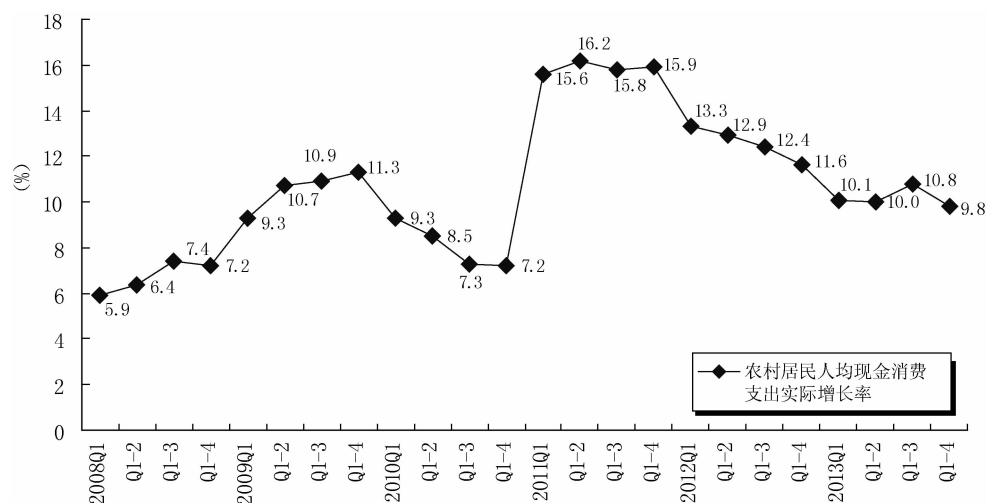


图 6 2008 年以来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 (%)

2013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长 8.1%，实际增长 5.4%，名义增速比 2012 年回落 1.9 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回落 1.7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名义增速分别为 7.3%、7.2%和 7.6%，同比实际增速分别为 4.8%、4.7%和 5.0%。因此，2013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低于 2012 年；但 2013 年年内，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都保持平稳增长（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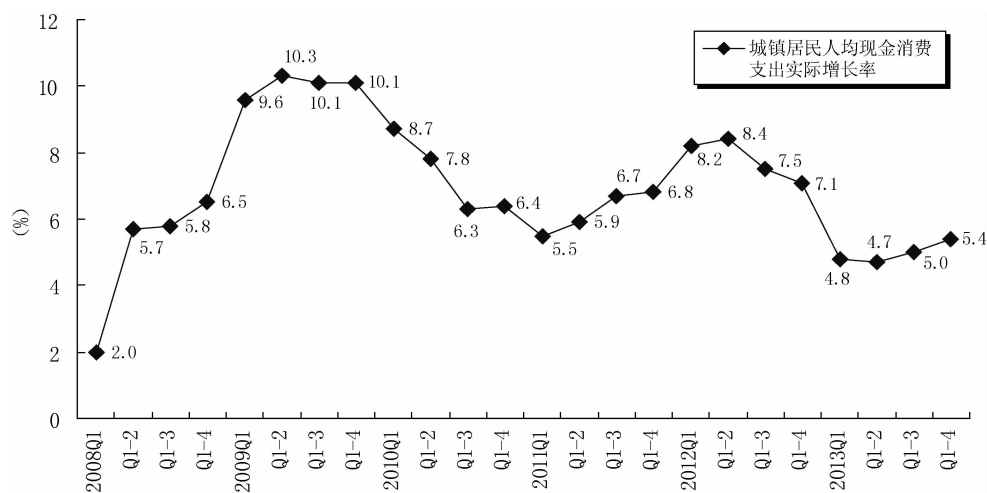


图 7 2008 年以来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率 (%)

2013 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都低于 2012 年，所以，2013 年居民消费支出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均低于 2012 年。2013 年年内，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保持平稳增长，所以，居民消费支出保持平稳增长。

(2) 政府消费支出增速前三季度逐季回落，四季度有所回升。2013 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名义增速分别为 12.1%、10.8%、8.8%和 9.3%^①，前三季度增速逐季回落，四季度增速有所回升。据测算，2013 年政府消费支出增速与财政支出^②增速趋势一致，但增幅明显低于财政支出。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在我国，反映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针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管理需要设置的专业统计指标，称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月度是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一个是支出法 GDP 的构成部分，即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严格讲，反映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指标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这两个指标在基本用途、口径范围、资料来源、计算方法和数据表现上都存在区别^③，但两者基本上保持相同的变化趋势。所以，仅从固定资本投资需求的变动趋势角度讲，不妨用前者作替代分析。

2013 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长 19.6%，实际增长 19.2%，名义增速比 2012 年回落 1.0 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回落 0.1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速分别为 20.9%、20.1%和 20.2%，实际增速分别为 20.7%、20.1%和 20.2%。所以无论是名义增速还是实际增速，2013 年固定资产投资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见图 8），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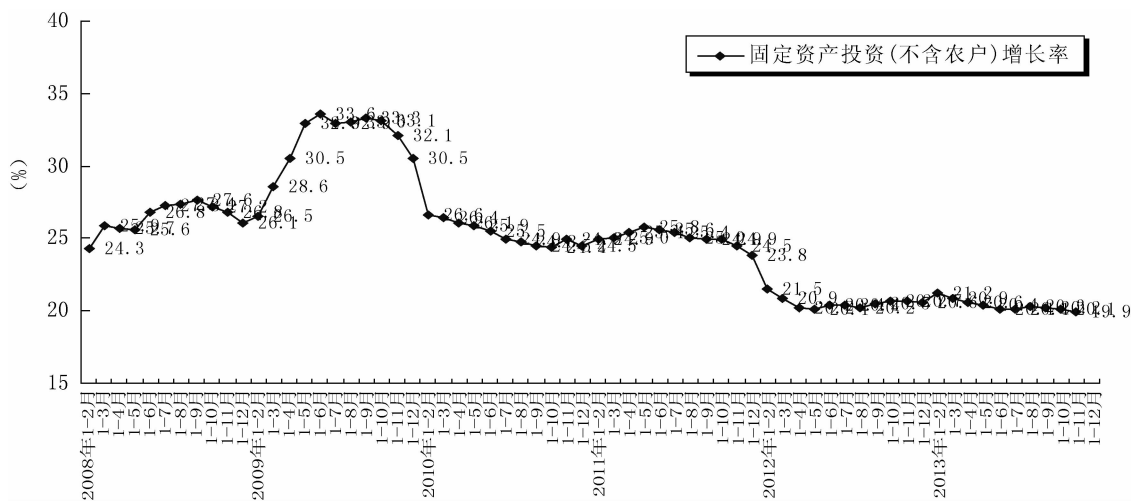


图 8 2008 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率（%）

①由于尚无全年数据，全年全国财政支出增速用 1-11 月份累计增速替代。

②政府消费支出与财政支出之间的区别参见许宪春：《准确理解中国经济统计》，《经济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21-31 页。

③详见许宪春：《准确理解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2 期第 4-24 页。

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 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 18.7%、17.1%、18.5%和 18.5%；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 26.9%、25.3%、25.1%和 21.2%；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 20.2%、20.3%、19.7%和 19.8%。这三大投资增速由前几年的较大幅度波动逐渐走向稳定（见图 9）。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稳定在 18% 左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稳定在 20% 左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逐季平稳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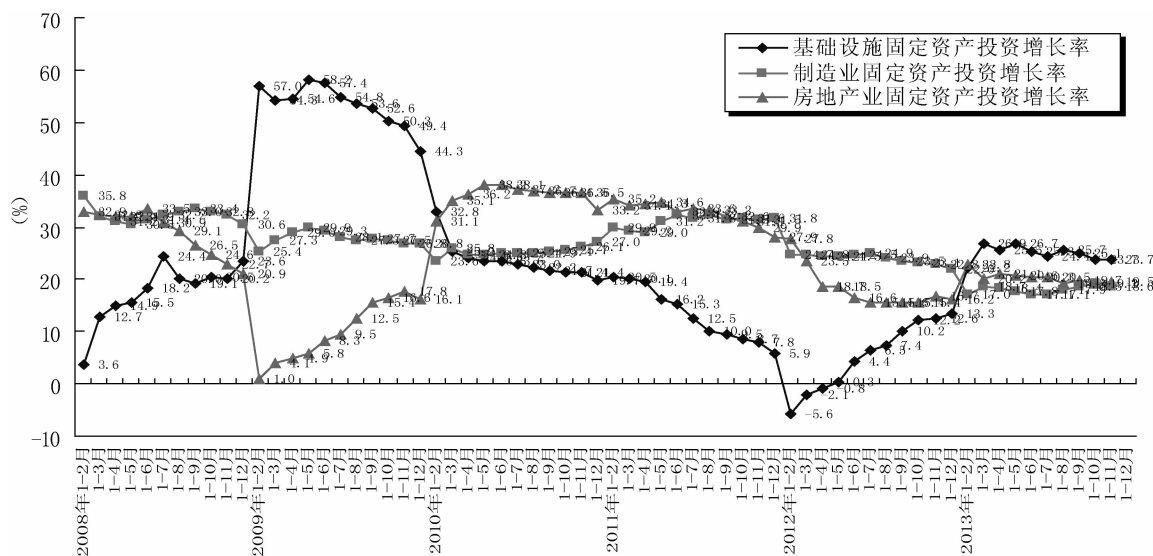


图 9 2008 年以来月度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率 (%)

(4) 存货增加由明显下降转为小幅增长。存货增加也是投资需求的构成部分。2013 年一季度，由于需求减缓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及购进价格下降，导致存货增加大幅下降，上半年和前三季度降幅逐季明显缩小，全年存货增加转为小幅增长。

(5)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大幅增长转为下降。2013 年，海关统计的贸易出口增长 7.9%，增速与 2012 年持平；贸易进口增长 7.3%，比 2012 年加快 3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增长 12.8%，比 2012 年回落 36.2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呈负增长^①，降幅比 2012 年扩大，对 GDP 的向下拉动幅度有所扩大。

2013 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海关统计的贸易出口增速分别为 18.3%、10.4%、8.0%和 7.9%，贸易进口增速分别为 8.6%、6.7%、7.3%和 7.3%。贸易出口累计增速逐季回落，但始终高于相应季度的贸易进口累计增速。由于 2012 年同期贸易顺差金额很小，2013 年一季度贸易顺差大幅度增长，上半年增速大幅度回落至 57.5%，前三季度

^①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与海关统计的贸易差额之间的区别参见许宪春：《准确理解中国经济统计》，《经济研究》2010 年第 5 期第 21-31 页。

和全年分别回落到 14.5%和 12.8%。2013 年一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大幅增长，对 GDP 呈明显正拉动；上半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增速明显回落，对 GDP 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小；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转为负增长，对 GDP 呈负拉动；全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降幅扩大，对 GDP 负拉动作用增强。所以，2013 年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

综上所述，从需求角度看，2013 年，我国主要需求项目表现出以下特点：居民消费支出保持平稳增长；政府消费支出前三季度增速逐季回落，四季度增速有所回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存货增加由明显下降转为小幅增长；货物和服务净出口由大幅增长转为下降。2013 年从需求角度测算的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与从生产角度测算的经济增速表现为基本相同的走势。

（二）通货膨胀形势分析

2013 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6%，涨幅与 2012 年持平。其中，当年新涨价因素约为 1.6 个百分点，占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的 61.5%；2012 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 1.0 个百分点，占 38.5%。

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食品价格上涨 4.7%，拉动 CPI 上涨 1.52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58.5%；居住价格上涨 2.8%，拉动 CPI 上涨 0.53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20.4%。这两部分共拉动 CPI 上涨 2.05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78.9%。可见，2013 年 CPI 涨幅主要是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上涨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食品中，鲜菜价格涨幅最高达 8.1%，拉动 CPI 上涨 0.25 个百分点；其次是鲜果价格，上涨 7.1%，拉动 CPI 上涨 0.14 个百分点。在食品中，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对 CPI 的拉动幅度最大，拉动 CPI 上涨 0.32 个百分点。（详见表 1）

表 1 2013 年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上涨率及对总指数的影响

项目名称	2012 年=100	对总指数的影响	项目名称	2012 年=100	对总指数的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2.6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101.5	0.08
一、食品	104.7	1.52	五、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101.3	0.12
粮食	104.6	0.14	六、交通和通信	99.6	-0.04
肉禽及其制品	104.3	0.32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01.8	0.20
蛋	104.9	0.04	八、居住	102.8	0.53
水产品	104.2	0.11	1、建房及装修材料	101.2	0.04
鲜菜	108.1	0.25	2、住房租金	104.1	0.06
鲜果	107.1	0.14	3、自有住房	103.8	0.35
二、烟酒及用品	100.3	0.01	4、水、电、燃料	101.6	0.08
三、衣着	102.3	0.19			

1. 居民消费价格季度变动分析

分季度看，2013 年一至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分别上涨 2.4%、2.4%、2.8%和 2.9%。前两个季度涨幅持平，后两个季度逐季上升。从 2012 年四季度至 2013 年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呈上升的走势，从 2012 年第三季度的 1.9%上升到 2013 年四季度的 2.9%，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见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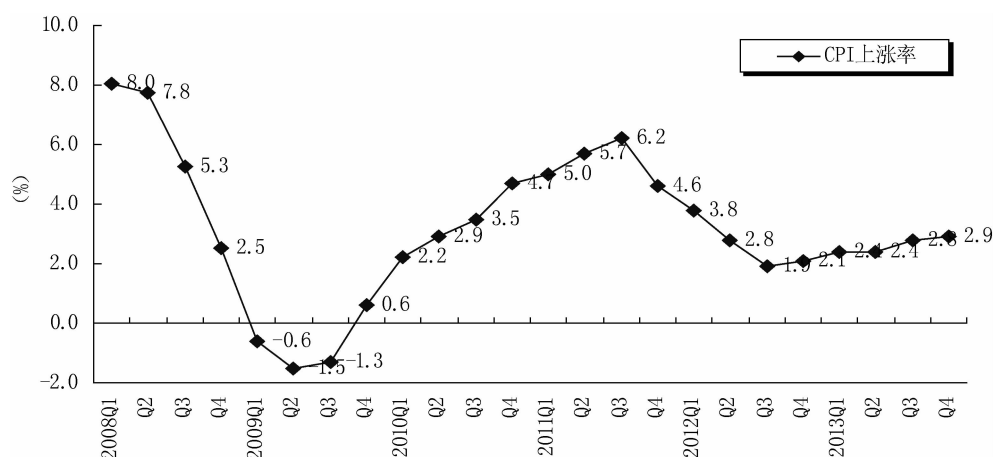


图 10 2008 年以来季度 CPI 上涨率 (%)

从图 10 可以看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明显表现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8 年一季度至 2009 年二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逐季回落；第二阶段，2009 年三季度至 2011 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逐季上升；2011 年四季度至 2012 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逐季回落；2012 年四季度至 2013 年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基本上逐季上升。

从表 2 可以看出，2013 年一至四季度，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最高，对 CPI 的拉动幅度最大。一季度，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3.8%，拉动 CPI 上涨 1.27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52.9%；二季度，食品价格上涨 4.1%，拉动 CPI 上涨 1.22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50.8%；三季度，食品价格上涨 5.3%，拉动 CPI 上涨 1.59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56.8%；四季度，食品价格上涨 5.5%，拉动 CPI 上涨 1.65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56.9%。可见，2013 年四个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中，一半以上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

从表 2 可以看出，2013 年一至四季度，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除食品外，涨幅最高、对 CPI 拉动幅度最大的商品是居住。一季度居住价格上涨 2.9%，拉动 CPI 上涨 0.54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22.5%；二季度居住价格上涨 3.0%，拉动 CPI 上涨 0.57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23.8%；三季度居住价格上涨 2.7%，拉动 CPI 上涨 0.51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18.2%；四季度居住价格上涨 2.7%，拉动 CPI 上涨 0.51 个百分点，占

表 2 2013 年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上涨率及对总指数的影响

项目名称	四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上年同期 = 100	对总 指数的 影响	上年同期 = 100	对总 指数的 影响	上年同期 = 100	对总 指数的 影响	上年同期 = 100	对总 指数的 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2.9		102.8		102.4		102.4	
一、食品	105.5	1.65	105.3	1.59	104.1	1.22	103.8	1.27
粮食	103.9	0.10	104.6	0.12	105.2	0.14	105.0	0.14
肉禽及其制品	105.0	0.32	106.6	0.42	102.6	0.17	103.2	0.24
蛋	97.8	-0.02	101.0	0.01	107.7	0.06	114.8	0.11
水产品	106.1	0.14	104.4	0.10	102.4	0.05	103.9	0.10
鲜菜	117.8	0.51	111.9	0.34	104.4	0.12	100.5	0.02
鲜果	111.7	0.22	109.1	0.17	107.7	0.14	100.7	0.01
二、烟酒及用品	99.7	-0.01	100.0	0.00	100.5	0.02	101.2	0.03
三、衣着	102.1	0.19	102.2	0.20	102.4	0.21	102.3	0.20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101.4	0.08	101.4	0.08	101.5	0.09	101.6	0.09
五、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101.0	0.09	101.2	0.11	101.5	0.14	101.7	0.16
六、交通和通信	99.6	-0.05	99.9	-0.01	99.0	-0.12	99.9	-0.01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02.7	0.34	101.5	0.18	101.4	0.17	101.4	0.16
八、居住	102.7	0.51	102.7	0.51	103.0	0.57	102.9	0.54
建房及装修材料	101.6	0.05	101.4	0.05	101.1	0.04	100.8	0.00
住房租金	104.6	0.06	104.4	0.06	104.1	0.06	103.2	0.00
自有住房	103.8	0.35	103.9	0.36	104.0	0.37	103.6	0.30
水电燃料	100.7	0.04	100.8	0.04	102.0	0.11	103.0	0.10

CPI 涨幅的 17.6%。

由上述可知，2013 年一至四季度，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拉动 CPI 上涨幅度占 CPI 涨幅的 74.0% 以上。可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引发的。

在食品中，一季度，蛋价格涨幅最高，上涨 14.8%；其次是粮食，上涨 5.0%。二季度，蛋和鲜果价格涨幅最高，均上涨 7.7%；其次是粮食，上涨 5.2%。三季度，鲜菜价格涨幅最高，上涨 11.9%；其次是鲜果，上涨 9.1%。四季度，也是鲜菜价格涨幅最高，上涨 17.8%；其次也是鲜果，上涨 11.7%。

在食品中，一至三季度，肉禽及其制品价格上涨对 CPI 的拉动幅度最大，分别拉动 CPI 上涨 0.24、0.17 和 0.42 个百分点；四季度，鲜菜价格上涨对 CPI 拉动幅度最大，拉动 CPI 上涨 0.51 个百分点。

在居住中，一季度，自有住房价格涨幅最高，上涨 3.6%，二至四季度，住房租金价格涨幅最高，分别上涨 4.1%、4.4%和 4.6%；一至四季度，自有住房价格上涨对 CPI 拉动幅度最大，分别拉动 CPI 上涨 0.30、0.37、0.36 和 0.35 个百分点。（详见表 2）

2. 居民消费价格月度变动分析

2013 年 1 至 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2.0%、3.2%、2.1%、2.4%、2.1%、2.7%、2.7%、2.6%、3.1%、3.2%、3.0%和 2.5%。前 8 个月份，除 2 月份外，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均低于 3%，涨幅较小；9、10、11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升至 3%及以上，但涨势仍比较温和；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又回落到 3%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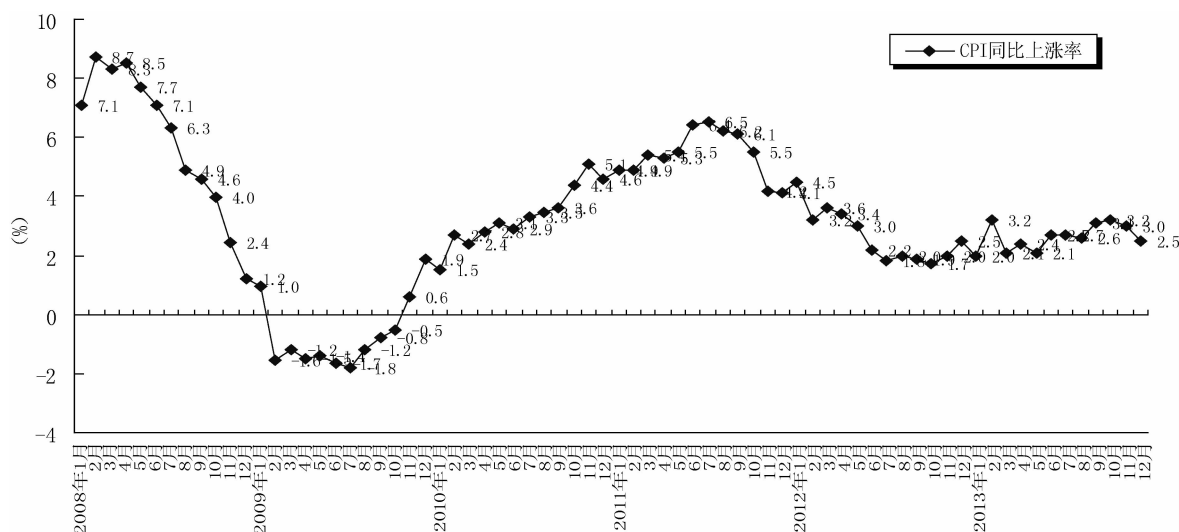


图 11 2008 年以来月度 CPI 上涨率 (%)

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高，主要受春节和气候因素影响。9 月份，新涨价因素增加较多，是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的直接原因。在 3.1% 的涨幅中，新涨价因素为 2.3 个百分点，比 8 月份增加 0.8 个百分点；翘尾因素为 0.8 个百分点，比 8 月份减少 0.3 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与翘尾因素增减抵消后净增加 0.5 个百分点，所以 9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比 8 月份扩大了 0.5 个百分点。10 月份，在 3.2% 的涨幅中，新涨价因素约为 2.3 个百分点，与 9 月份基本相同；翘尾因素约为 0.9 个百分点，比 9 月份增加 0.1 个百分点。11 月份，在 3.0% 的涨幅中，新涨价因素约为 2.3 个百分点，与 10 月份基本相同；翘尾因素约为 0.7 个百分点，比 10 月份回落了 0.2 个百分点。12 月份，在 2.5% 的涨幅中，全部是新涨价因素，翘尾因素为 0。（详见图 12）

从表 3 可以看出，2013 年 10 至 12 月份，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最高，对居民消费价格的拉动幅度最大。10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6.5%，拉动 CPI 上涨 2.11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65.9%；11 月份，食品价格上涨 5.9%，拉动 CP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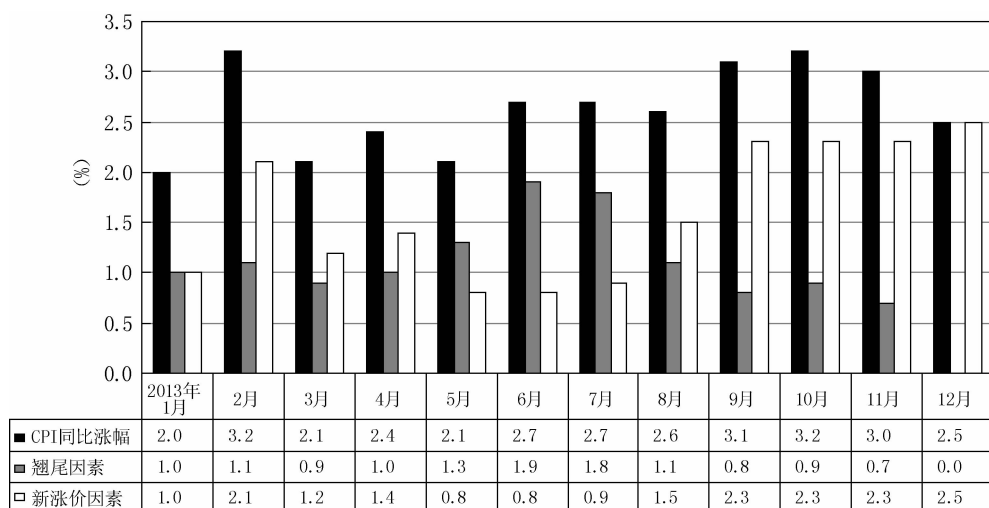


图 12 2013 年各月份新涨价因素和翘尾因素 (%)

上涨 1.92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64.0%；12 月份，食品价格上涨 4.1%，拉动 CPI 上涨 1.33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53.2%。可见，2013 年 10 至 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中，一半以上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

从表 3 可以看出，2013 年 10 至 12 月份，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除食品外，价格涨幅较高、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拉动幅度最大的商品是居住。10 月份居住价格上涨 2.6%，拉动 CPI 上涨 0.50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15.6%；11 月份居住价格上涨 2.6%，拉动 CPI 上涨 0.50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16.7%；12 月份居住价格上涨 2.8%，拉动 CPI 上涨 0.53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21.2%。

从表 3 可以看出，2013 年 10 至 12 月份，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价格涨幅较高，对 CPI 拉动幅度仅次于居住的商品是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0 至 12 月份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2.5%、2.8%和 2.9%，拉动 CPI 分别上涨 0.29、0.32 和 0.33 个百分点，分别占 CPI 涨幅的 9.1%、10.7%和 13.2%。

由上述可知，2013 年 10 至 12 月份，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食品、居住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拉动 CPI 上涨幅度占 CPI 涨幅的 87%以上，10 和 11 月份甚至达到 90%以上。可见，10 至 12 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居住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引发的。

在食品中，10、11 月份鲜菜价格涨幅最高，对 CPI 拉动幅度最大，分别上涨 31.5%和 22.3%，拉动 CPI 分别上涨 0.81 和 0.59 个百分点；12 月份鲜果价格涨幅最高，上涨 15.6%，拉动 CPI 上涨 0.29 个百分点。肉禽及其制品价格涨幅及其对 CPI 的拉动幅度较大，10 至 12 月份分别上涨，5.8%、5.5%和 3.6%，拉动 CPI 分别上涨 0.43、0.41 和 0.27 个百分点。

表 3 2013 年月度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上涨率及对总指数的影响

项目名称	12 月		11 月		10 月	
	去年同 月 =100	对总指数 的影响	去年同 月 =100	对总指数 的影响	去年同 月 =100	对总指数 的影响
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102.5		103.0		103.2	
一、食品	104.1	1.33	105.9	1.92	106.5	2.11
粮食	103.8	0.11	104.0	0.12	103.8	0.11
肉禽及其制品	103.6	0.27	105.5	0.41	105.8	0.43
蛋	95.9	-0.04	98.3	-0.01	99.3	-0.01
水产品	105.5	0.14	106.5	0.16	106.4	0.16
鲜菜	102.6	0.08	122.3	0.59	131.5	0.81
鲜果	115.6	0.29	110.6	0.20	108.8	0.17
二、烟酒及用品	99.6	-0.01	99.8	-0.01	99.8	-0.01
三、衣着	102.1	0.18	102.0	0.17	102.4	0.21
四、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	101.4	0.07	101.3	0.07	101.5	0.08
五、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	100.9	0.08	101.0	0.09	101.0	0.09
六、交通和通信	99.9	-0.01	99.5	-0.06	99.4	-0.07
七、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	102.9	0.33	102.8	0.32	102.5	0.29
八、居住	102.8	0.53	102.6	0.50	102.6	0.50
建房及装修材料	101.6	0.05	101.6	0.05	101.5	0.05
住房租金	104.7	0.07	104.7	0.07	104.5	0.06
自有住房	103.8	0.35	103.9	0.36	103.8	0.36
水电燃料	101.1	0.06	100.5	0.02	100.6	0.03

3. 居民消费价格变动与相关价格变动关系分析

2013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 1.9%，降幅比 2012 年扩大 0.2 个百分点。分月看，1 至 9 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经历了先降幅逐步扩大，后降幅逐月缩小的过程：1 月份同比下降 1.6%，5 月份降幅最大，达 2.9%，9 月份降幅缩小到 1.3%；9 月份之后降幅保持基本稳定。

2013 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下降 2.0%，降幅比 2012 年扩大 0.2 个百分点。分月看，1 至 12 月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经历了先降幅逐步扩大，后降幅逐步缩小的过程：1 月份同比下降 1.9%，5 月份降幅最大，达 3.0%，12 月份降幅缩小到 1.4%。

从图 13 可以看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变动对居民消费价格变动具有明显的传导作用。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上涨时，往往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当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下降时，往往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下降，或者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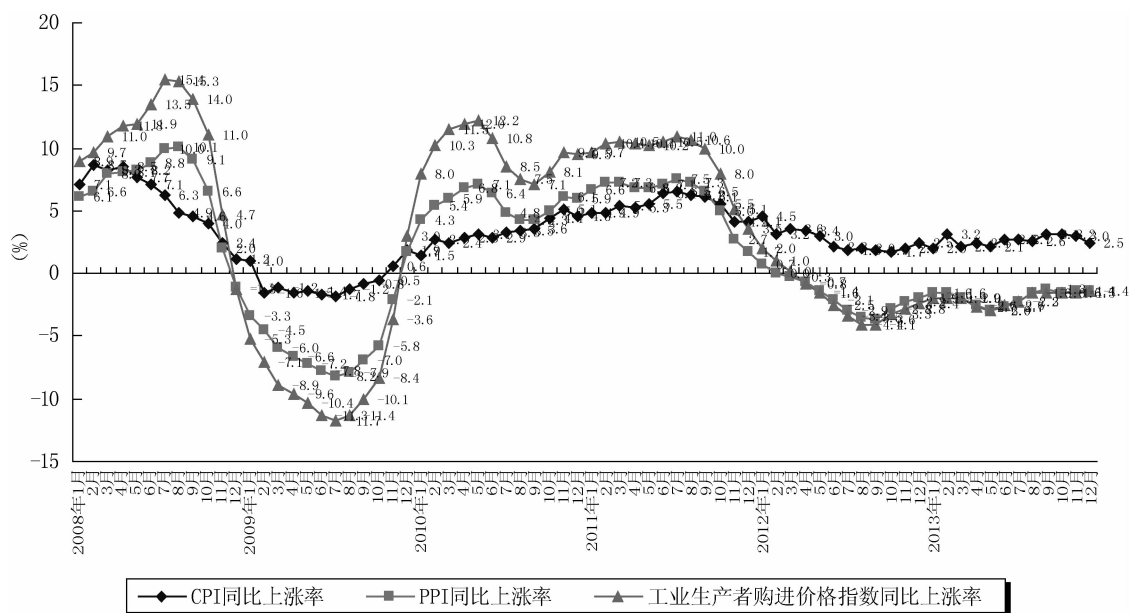


图 13 2008 年以来月度居民消费价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上涨率（%）

2013 年一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下降 1.7%和 1.9%，对 CPI 上涨起到抑制作用；二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下降 2.7%和 2.8%，降幅均比一季度扩大，对 CPI 上涨均起到进一步的抑制作用；三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下降 1.7%和 1.8%，降幅均比二季度缩小，对 CPI 上涨的抑制作用比二季度减弱；四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下降 1.4%和 1.5%，降幅进一步缩小，对 CPI 上涨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减弱。

从图 14 可以看出，2008 年以来，货物贸易进口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具有明显的输入作用。当货物贸易进口价格上涨时，往往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当货物贸易进口价格下降时，往往带动居民消费价格下降，或者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

2013 年，货物贸易进口价格下降 1.8%，降幅比 2012 年扩大 1.3 个百分点，其中一至四季度同比分别下降 1.8%、2.9%、1.1%和 1.5%，对 2013 年各季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

（三）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本文分别从经济增长、收入增长、通货膨胀和商品房销售市场四个角度探讨 2013 年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基本特点。

1. 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特点

（1）经济增速与 2012 年持平。2013 年，我国经济增长 7.7%，与 2012 年持平，比本世纪以来的 2000-2012 年年均增速 10.0%低 2.3 个百分点，比改革开放以来的 1979-2012

年年均增速 9.8% 低 2.1 个百分点。（见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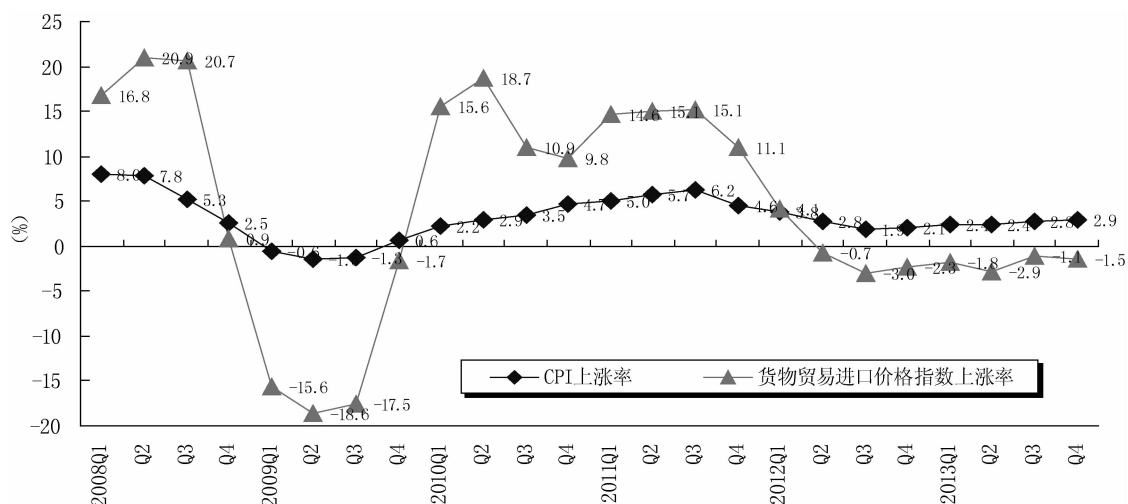


图 14 2008 年以来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和货物贸易进口价格上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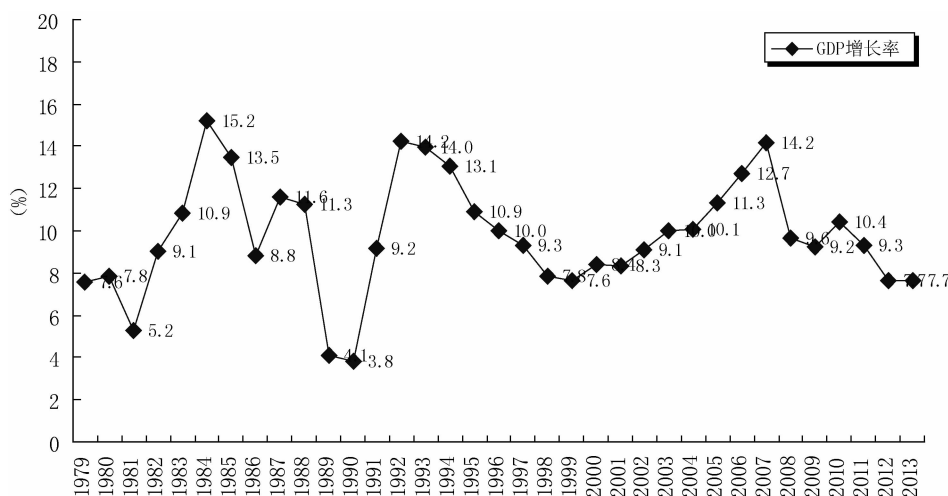


图 15 1979-2013 年年度经济增长率（%）

（2）经济保持平稳增长。2013 年，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这一特点至少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增长。2013 年一至四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分别增长 7.7%、7.5%、7.8% 和 7.7%，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之间仅相差 0.3 个百分点。二是工业保持平稳增长。2013 年一至四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同比分别增长 9.5%、9.1%、10.1% 和 10.0%，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之间仅相差 1.0 个百分点。三是建筑业保持平稳增长。2013 年一至四季度，我国建筑业同比分别增长 9.8%、9.5%、9.8% 和 9.2%，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之间仅相差 0.6 个百分点。四是第三产业保持平稳增长。2013 年一至四季度，我国第三产业同比分别增长 8.3%、8.3%、8.4% 和 8.1%，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之间仅相差 0.3 个百分点。

(3) 第三产业增速超过经济增速，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2013 年，第三产业增长 8.3%，高于 GDP 增速 0.6 个百分点。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分别为 10.0%、43.9%和 46.1%。第一、二产业比重分别比 2012 年回落 0.1 和 1.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 1.5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为 1952 年有 GDP 历史数据以来的最大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

(4) 净出口需求降幅扩大，经济增长靠内需拉动。2013 年，海关统计的贸易出口增长 7.9%，与 2012 年持平；贸易进口增长 7.3，比 2012 年加快 3 个百分点；贸易顺差增长 12.8%，比 2012 年回落 36.2 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呈负增长，降幅比 2012 年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4%，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50.0%和 54.4%，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

2. 收入增长的一些基本特点

(1)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额和利润减少额集中度比较高。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 62831 亿元，增长 12.2%，增速比 2012 年提高 6.9 个百分点。从月度看，3 月份同比增速最低，增长 5.3%，8 月份增速最高，增长 24.2%。受业务收入、价格、成本等多种因素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增速往往波动幅度较大，2013 年月度之间的波动幅度远低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前几年（见图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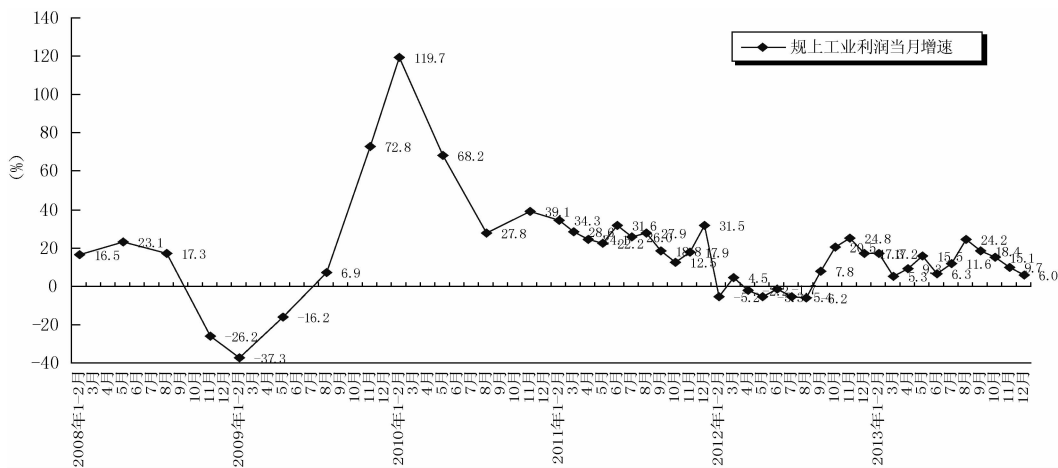


图 16 2008 年以来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增长率（%）

2013 年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总额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利润增加额和利润减少额的集中度比较高。从表 4 可以看出，全年中有 8 个月份，利润增加最多的 5 个行业利润增加额之和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额^①的比重超过 50%，2 个月份达到 60%及以上。除 6 和 12 月份外，利润减少最多的 5 个行业利润减少额之和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减少

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加额指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中所有利润增加行业利润增加额之和。

额^①的比重超过 90%。其中 3 个月份达到 100%。

表 4 2013 年各月份前 5 个行业利润增加额和前 5 个行业利润减少额占比

月份	利润总额增速(%)	前 5 个行业利润增加额占比(%)	前 5 个行业利润减少额占比(%)
1-2	17.2	59.3	99.1
3	5.3	46.8	95.9
4	9.3	50.4	99.5
5	15.5	56.3	98.8
6	6.3	61.3	86.0
7	11.6	60.0	99.6
8	24.2	49.3	100.0
9	18.4	37.2	100.0
10	15.1	42.6	100.0
11	9.7	53.8	90.2
12	6.0	53.4	83.4

注：前 5 个行业利润增加额占比即利润增加最多的 5 个行业的利润增加额之和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中所有利润增加行业利润增加额的比重；前五个行业利润减少额占比即利润减少最多的 5 个行业利润减少额之和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所有利润减少行业利润减少额的比重。

分行业看，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两个行业对利润增加额和利润减少额集中度的影响最为显著。2013 年，除 9 月份外，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均位列利润增加额最多的前 5 个行业，成为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最重要行业之一；除 9 月份外，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均位列利润减少额最多的 5 个行业，其中 9 个月份为制约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最大行业。

2013 年，一是受下游钢铁行业需求的影响，二是受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影响，三是受低价煤炭进口的冲击，煤炭价格大幅度下降，导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大幅度下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出厂价格下降 11.3%，在 41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价格降幅最大。煤炭价格大幅下降，导致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大幅下降。煤炭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对煤炭需求量最大的火电行业成本明显降低，由于电价相对稳定，从而导致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大幅增加。

2013 年，受高档车市场需求旺盛以及日系车销售复苏的影响，汽车制造业在产品价格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利润增加较多，有 11 个月份进入利润增加额最多的 5 个行业，成为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的主要行业之一。

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减少额指的是规模以上工业中所有利润减少行业利润减少额之和。

2013 年，由于原油价格下降，有 9 个月份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进入利润减少额最多的 5 个行业；由于出厂价格持续低迷，有 10 个月份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进入利润减少额最多的 5 个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起到明显的向下拉动作用。

2013 年，受出厂价格变化及基数影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一季度进入利润增加额最多的 5 个行业，4、6 月份跌入利润减少额最多的 5 个行业，三季度和 12 月份又重新进入利润增加额最多的 5 个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利润增长表现为先向上拉动，后向下拉动，再向上拉动的作用。

2013 年，主要受原油、成品油价格波动较大的影响，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6 个月份进入利润增加额最多的 5 个行业，10、12 月份后进入利润减少额最多的 5 个行业。

（2）居民收入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3 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长 12.4%，实际增长 9.3%，分别比 2012 年回落 1.1 和 1.4 个百分点。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①同比名义增长 12.2%、11.9%、12.5%和 12.2%，实际增长 9.3%、9.2%、9.6%和 9.1%。可见，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2013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 9.7%，实际增长 7.0%，分别比 2012 年回落 2.9 和 2.6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 9.3%、9.1%和 9.5%，实际增长 6.7%、6.5%和 6.8%。可见，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由上述可知，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都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距缩小。

从表 5 可以看出，2013 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速均高于 GDP 增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均低于 GDP 增速。据测算，城乡居民收入综合平均实际增速略高于 GDP 增速，符合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的政策目标。

从表 5 可以看出，2013 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名义增速均高于财政收入名义增速；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均高于财政收入名义增速，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略低于财政收入名义增速。显然，城乡居民收入综合平均名义增速明显高于财政收入名义增速，从而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政府可支配收入比例上升，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得到改善。

^①住户调查中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年度调查指标，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是季度调查指标，两者的区别是，前者既包括农村居民现金收入，也包括实物收入，主要是农民关于自产自用的农林牧渔类产品的收入，后者只包括现金收入，不包括实物收入。

表 5 2013 年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 GDP 增长率 (%)

		全年	前三季度	上半年	一季度
农村居民人均 现金收入	名义增速	12.2	12.5	11.9	12.2
	实际增速	9.1	9.6	9.2	9.3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名义增速	9.7	9.5	9.1	9.3
	实际增速	7.0	6.8	6.5	6.7
财政收入	名义增速	9.9*	8.6	7.5	6.9
GDP	实际增速	7.7	7.7	7.6	7.7

注：* 为 1-11 月份累计增速。

(3) 财政收入增速逐季上升

从表 5 可以看出，2013 年 1-11 月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9.9%，比上年同期回落 2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6.9%、7.5%和 8.6%。可见，2013 年财政收入累计增速逐季上升。

3. 通货膨胀的一些基本特点

(1) 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2013 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6%，涨幅与上年持平，比本世纪以来的 2000-2012 年年均涨幅 2.3%高 0.3 个百分点，明显低于改革开放以来 1979-2012 年的年均涨幅 5.3%，属于温和上涨（见图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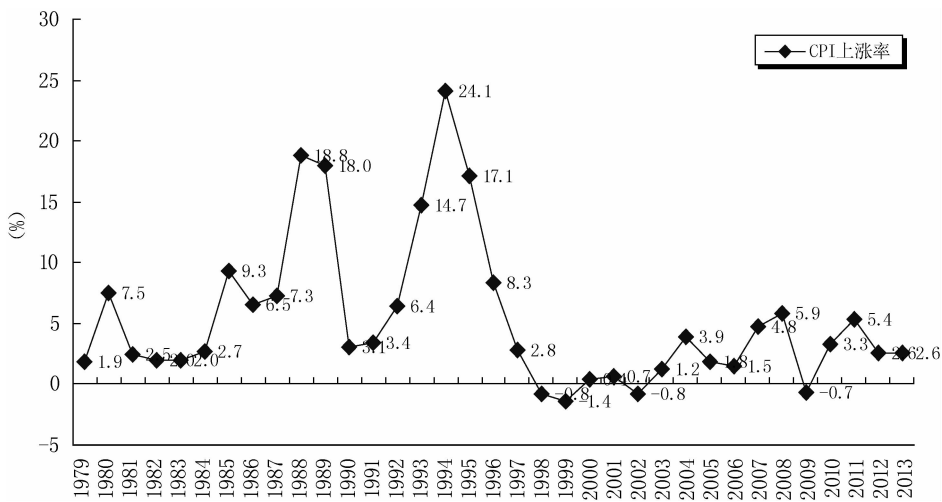


图 17 1979-2013 年年度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 (%)

(2)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平稳上升。2013 年一、二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均上涨 2.4%，涨幅持平；三、四 季度分别上涨 2.8%和 2.9%，涨幅逐季上升。所以 2013 年一至四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平稳上升。

(3)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货物贸易进口价格抑制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013 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分别下降 1.9%和 2.0%，降幅比 2012 年均扩大

0.2 个百分点；货物贸易进口价格下降 1.8%，降幅比 2012 年扩大 1.3 个百分点，对 CPI 的上涨起到抑制作用。

（4）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主要决定于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涨幅。2013 年，在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商品中，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上涨共拉动 CPI 上涨 2.05 个百分点，占 CPI 涨幅的 78.9%。可见，2013 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主要是食品价格和居住价格上涨引发的。

4. 商品房销售市场的一些基本特点

近两年，商品房销售市场最突出的特点是波动幅度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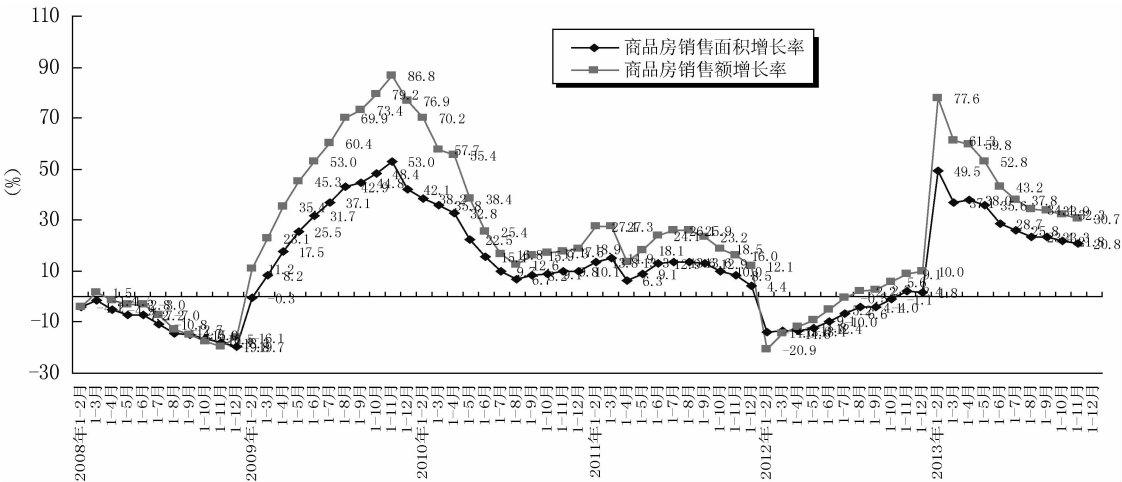


图 18 2008 年以来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增长率（%）

2012 年 1-2 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14.0%，随后降幅不断收窄，1-11 月份转为正增长，1-12 月份增长 1.8%。2013 年初，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大幅上升，1-2 月份同比增长 49.5%，随后呈回落的走势，1-12 月份增长 17.3%，增速比 1-2 月份回落 32.2 个百分点。近两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相差 63.5 个百分点。

2012 年 1-2 月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 20.9%，随后降幅逐月收窄；1-8 月份转为正增长，随后增速逐月上升，1-12 月份增长 10.0%。2013 年初，商品房销售额大幅上升，1-2 月份同比增长 77.6%，随后呈逐月回落的走势，1-12 月份增长 26.3%，增速比 1-2 月份回落 51.3 个百分点。近两年，商品房销售额最高增速与最低增速相差 98.5 个百分点。

二、2014 年经济形势初步判断

初步判断，2014 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增速可能会比 2013 年略有回落。居民消费价格将继续保持温和上涨，涨幅可能会比 2013 年略有上升。

（一）经济增长形势的初步判断

本文从生产和需求两个角度对 2014 年经济增长形势进行初步判断。

1. 需求走势判断

(1) 居民消费支出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我国正处于消费结构升级阶段，汽车消费、手机消费、电子商务消费、信息消费、养老消费、健康消费等将保持较快增长，居住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这将支撑居民消费支出保持平稳增长。

(2) 政府消费支出将保持低速增长。受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政策的影响，政府消费支出将会继续保持低速增长。

(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初步判断，2014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①，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制造业投资增速难以回升；同时，2013 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较低。这些因素可能会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所回落，因此，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

1) 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2013 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 26.9%、25.3%、25.1%和 21.2%，呈现出逐季回落的走势。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较重，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支持，所以，2014 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可能会延续 2013 年的走势，有所回落。

2)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以下因素可能会导致 2014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比 2013 年有所回落：一是部分三四线城市出现商品房供过于求；二是房地产调控预期较强；三是 2013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呈明显回落的走势^②。

3) 制造业投资增速难以回升。以下因素可能会抑制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一是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短期内难以化解，抑制制造业投资增速；二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仍处于下降阶段，制约着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影响制造业企业的投资能力。

4) 2013 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速较低，影响 2014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013 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 14.2%，比 2012 年下降 15.8 个百分点，其中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分别增长 14.0%、15.1%和 13.3%，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明显低于实际完成投资增速（见图 20），影响 2014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 存货增加增速可能会小幅上升。2013 年一季度，由于需求减缓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及购进价格下降，存货增加大幅下降；上半年和前三季度，库存增加降幅逐季缩小；全年转为小幅增长。2014 年，随着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降幅缩小，存货增加增速可能会比 2013 年小幅上升。

(5) 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速可能会有所回升。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2013 年 12 月

^①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合计约占固定资产投资的 70%。

^②从图 19 可以看出，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产生一定的滞后影响，2013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明显回落的走势，可能会导致 2014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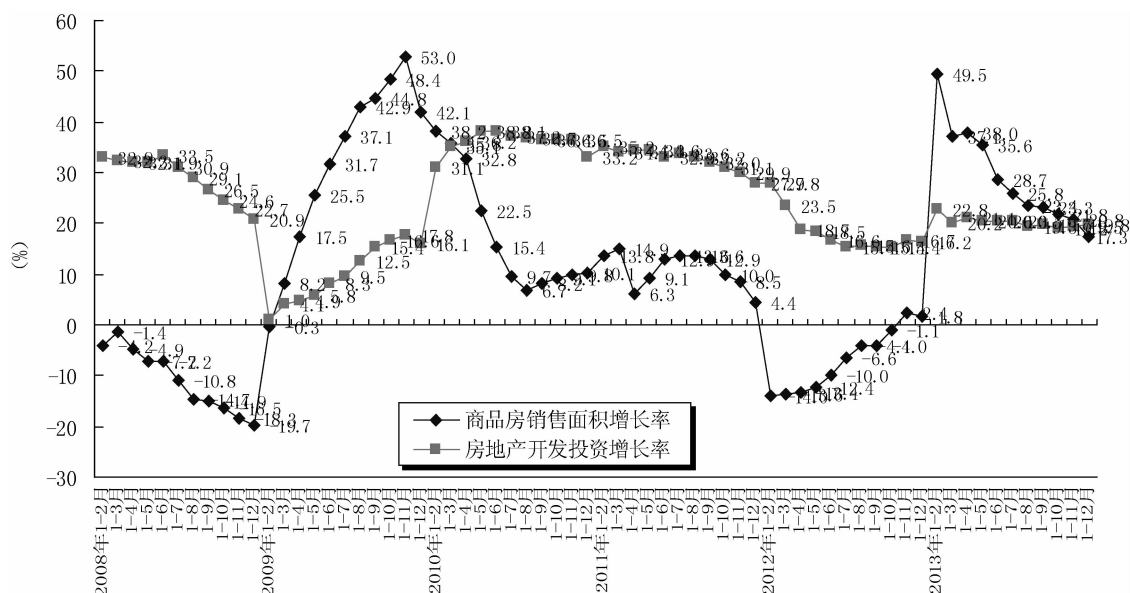


图 19 2008 年以来月度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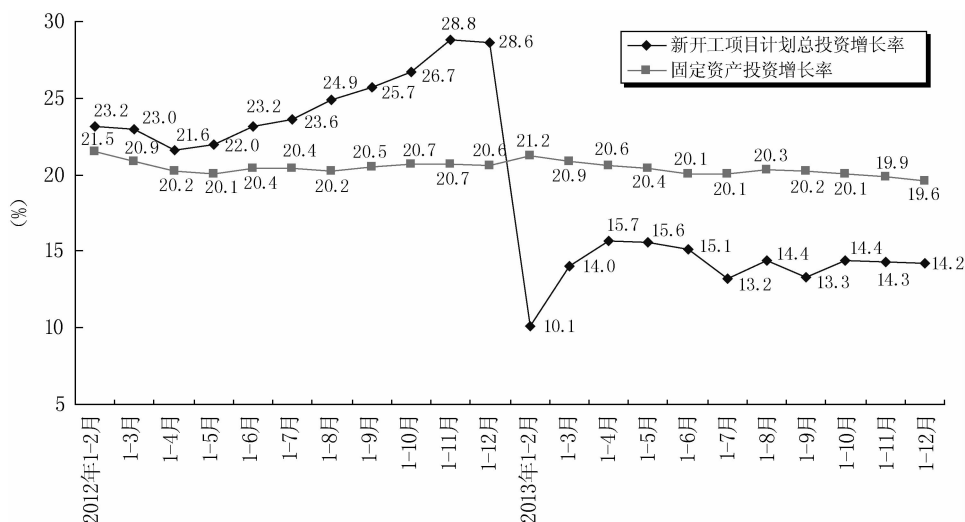


图 20 2012、2013 年月度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 (%)

预测，2014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比 2013 年加快 0.9 个百分点。英国共识公司 2013 年 12 月份预测，2014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0%，比 2013 年加快 0.6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 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6%，比 2013 年加快 0.7 个百分点。据此判断，2014 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有所加快，全球需求可能会回升，从而我国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速可能会有所回升。

综合以上各需求项目分析，初步判断，2014 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增速可能会比 2013 年略有回落。

2. 生产走势判断

(1) 农业生产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2014 年，既存在促进农业生产增长的有利因

素，也存在制约农业生产增长的不利因素。有利因素包括：一是中央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将推动农业生产发展；二是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措施将推动林业生产发展；三是优良品种的引进，将增强畜牧业的抗风险能力。制约因素包括：一是受耕地及各种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主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生产继续增产的空间有限；二是 H7N9 禽流感使家禽生产受到重创，根据畜牧业生产周期，2014 年畜牧业生产增速不会太高。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因素，2014 年农业生产增速可能会比 2013 年有所回落。

(2) 工业生产将保持平稳增长，增速可能会略有回落。2014 年，促进工业生产发展的有利因素包括：一是由于仍然存在较大的需求空间，以汽车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对工业生产增长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二是棚户区改造、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信息服务与产品消费等方面的投资对工业生产增长起到一定拉动作用；三是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工业增长；四是出口需求增速可能会有所回升，有利于拉动工业生产增长。制约工业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包括：一是化解产能过剩政策将对产能落后行业、高耗能行业生产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二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的政策，将对烟酒行业生产增长产生抑制作用；三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将会对钢铁、水泥等建材行业生产增速起到抑制作用。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因素，2014 年工业生产将保持平稳增长，增速可能会比 2013 年略有回落。

(3) 建筑业生产增速可能会略有回落。2014 年，促进建筑业生产发展的有利因素包括：一是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投资将会对建筑业生产增长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二是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对建筑业生产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三是产业升级带动有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将对建筑业生产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制约建筑业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包括：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商业性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将会对建筑业生产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二是受产能过剩的影响，有关行业投资增长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从而对建筑业生产增长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因素，2014 年建筑业生产增速可能会比 2013 年略有回落。

(4) 服务业生产可能会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2014 年，促进服务业生产发展的有利因素包括：一是我国正处于电子商务迅猛发展阶段，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将持续增加，从而将带动信息产业、信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邮政业的较快发展；二是智能手机、智能电视等终端产品的快速更新换代将带动批发和零售业较快发展；三是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新兴服务业具有较广阔的发展空间。制约服务业生产发展的不利因素包括：一是受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速回落的影响，货物运输增速可能会有所放缓；二是受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有可能回落的影响，与建材、装修材料、家电和家具有关的

批发和零售业增速可能会有所回落；三是受严格控制“三公”经费支出政策的影响，行政事业单位的业务支出将继续得到有效控制，有关服务业生产增长会受到影响。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因素，2014年服务业生产有望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综合以上各行业生产走势分析，初步判断，2014年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增速可能会比2013年略有回落。

（二）通货膨胀形势的初步判断

根据以下因素分析，初步判断，2014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将保持温和上涨，涨幅可能会比2013年略有上升。

一是2014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居民消费价格的基本稳定奠定了基础。

二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抑制作用可能会有所缩小。2013年一至四季度，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别下降1.7%、2.7%、1.7%和1.4%。可见，2013年下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逐步缩小。2014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降幅可能会进一步缩小。2013年一至四季度，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分别下降1.9%、2.8%、1.8%和1.5%。可见，2013年下半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降幅逐步缩小。2014年，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降幅可能会进一步缩小。因此，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抑制作用可能会有所缩小。

三是货物贸易进口价格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由抑制上涨转为向上小幅推动。2014年，随着世界经济增速回升，贸易需求增加，货物贸易进口价格可能会由下降转为小幅增长，从而对居民消费价格的影响可能会由抑制上涨转为向上小幅推动。

四是部分资源类产品和公共服务价格改革措施可能会推动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涨。2014年，部分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例如阶梯电价、阶梯水价改革措施；部分公共服务价格改革，例如市内交通服务等长期受到抑制的服务价格改革措施等，可能会推动居民消费价格小幅上涨。

参考文献

1. 财政部网站。
2. 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3. 海关总署网站。
4. 许宪春：《准确理解中国经济统计》，《经济研究》2010年第5期。
5. 许宪春：《准确理解中国的收入、消费和投资》，《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论新时期我国“两线一力”的反贫困模式*

闫 坤 于树一

摘要：反贫困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的重要任务。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新时期对反贫困的要求更高。为了较好地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首要的是进行中国反贫困模式创新。由此，“两线一力”的反贫困模式思路逐渐清晰，“两线”即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网两条线索，“一力”即政府主导力。

关键词：反贫困 经济发展 社会安全网 政府主导力

作者简介：闫 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于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国的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2000-2010 年，在扶贫标准从 865 元大幅提高到 1274 元的背景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9422 万减少到 2688 万，减幅为 71.5%，贫困发生率也从 10.2%下降到 2.8%。从世界范围看，在短时间内如此大幅脱贫是史无前例的^①。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健全公共财政体系研究》（批准号：10AZD020）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批准号：10BJY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新进展》白皮书，2011 年 11 月 16 日。

为此，我国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指标的国家，并得到了世界银行“中国的反贫困工作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都处于中心地位”的赞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的目标任务也全面实现。

在新时期，我国确立了新的反贫困目标：力争到2015年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然而，在新时期，除了贫困人口规模依然庞大外，反贫困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贫困人口受自然灾害、农产品市场波动、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更为严重，贫困人口更为分散，流动贫困人口更为快速增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一批新的贫困群体被催生，部分已经脱贫的群体重新返贫等等。这使反贫困工作的复杂和困难程度显著增加，迫使我们思考新的反贫困路径，即“两线一力”的反贫困模式。“两线”是其基本线索，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网；“一力”是政府主导力。

一、经济发展仍然是我国新时期反贫困模式的主要线索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是减贫的最重要条件。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发展质量也在稳步提高，正是将经济发展对反贫困的促进作用发挥到极致的大好机会。从经济发展的具体方面看，区域经济、产业、乡村经济、金融、科技、教育的发展更加注重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能力的开发，对于反贫困的作用最大，应该给予重点支持。

（一）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主要是在中央整体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下，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先富”地区帮扶发展缓慢、群众生产生活条件非常困难的贫困地区。

我国中央整体区域发展布局体现在制定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同时积极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划定珠江和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经济圈、海峡西岸经济区给予重点支持，形成了一个区域整体发展格局，为通过区域经济发展反贫困打下了坚实的战略基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进入区域扶贫阶段，开展东西扶贫协作。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1996年我国实施了沿海发达的6个省、3个直辖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贫困省、自治区的政策。在2004年，新增加了福建厦门市和广东珠海市帮扶重庆市的对口关系。2013年开展对口帮扶贵州工作，由经济相对发达的6个省（直辖市）的8个城市分别对口帮扶贵州的8个市（州）。同时，各省、市、区也组织了相对发达的地、州、市、县和企业，对口帮扶本地贫困的地、州、市、县和困难

企业。目前，东西扶贫协作已经由初期东部单向帮扶西部，拓展为东西对口帮扶与经济协作互动，由最初政府间援助拓展为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

此外，我国从 1986 年开始还通过定点帮扶贫困地区发展区域经济来减贫，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单位、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央大型企事业单位、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实施。“八七扶贫攻坚”期间，有 138 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定点联系了 325 个贫困县，到 2010 年共有 241 个单位帮扶 440 个重点县。从 2002 年到 2009 年，参与定点扶贫的单位共向帮扶的重点县投入扶贫资金（含物资折价）84.87 亿元，帮助引进各类资金 292.5 亿元，安排扶贫项目 9432 个，引进人才 3904 名，引进先进技术 1712 项，资助贫困学生 28.8 万人次，为定点扶贫县培训干部群众 151.6 万余人次。值得一提的是，从 2007 年到 2009 年，各省直单位对帮扶地区直接投入的资金达到 98.2 亿元，远远超过了中央单位的投入^①。

（二）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确立主导产业、建立生产基地、提供优惠政策、扶持龙头企业等方式，并探讨合理的运行机制，力求同时实现贫困群体增收、企业增利与政府增税。

我国的农业产业化扶贫于 2001 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提出，目前，在农业产业化扶贫中，最有效、实施范围最广泛的是“龙头企业+基地+贫困户”产业化扶贫模式。这是因为通过产业发展发挥反贫困效果需要借助政府政策支持，包括信贷扶贫、税收优惠、土地使用、社会帮扶、贴息贷款等政策，这些政策的载体大多是龙头企业，龙头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大户带动、股份制、合作组织等机制促进贫困地区发展主导产业，从而为贫困者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其收入。此外，在某些地方还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获得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三）乡村经济发展

乡村经济发展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主要在于我国贫困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农村，通过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在贫困地区率先进行农村社区的整体建设，以乡村经济发展带动反贫困目标的实现。

2001 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一次规划、两年实施、逐村验收、分批推进”的整村推进扶贫计划。整村推进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通过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产业、精神文

^①数据来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jrzq/2010-07/08/content_1648985.htm。

明、民主政治、村级组织的建设，促进贫困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截至 2010 年底，全国已有 12.6 万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占总数的 84%^①。整村推进促进了乡村经济和县域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健康、协调、持续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贫困群众综合素质，有利于集中资金、整合资源、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因此，2012 年 9 月，《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得以出台，中西部 22 个省（区、市）的 3 万个贫困村和 200 个贫困乡镇将实施整村推进。整村推进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财政资金，包括中央财政扶贫资金、行业部门资金以及省市（地、州）政府配套资金；二是信贷资金，包括扶贫贴息贷款和商业银行贷款；三是群众自筹和投工投劳。该规划提出，人口规模中等的贫困村，整合投资不低于 300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不低于 100 万元，且确保 70% 的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用于贫困群众产业开发等增收项目^②。

（四）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主要是以金融作为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血液和命脉，增加对贫困群体的金融供给，逐步完善相应的金融服务，有效缓解贫困地区发展的资金制约。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以扶贫贴息贷款为主体，小额信贷和其他资金互助形式为补充的扶贫到户信贷工作格局。1980—2012 年，信贷资金投入 3900 亿元，占中央财政和信贷扶贫资金投入总额的 59%。2012 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 332 亿元，引导扶贫信贷资金投入 500 亿元。2008—2012 年，财政安排扶贫贴息贷款资金为 58 亿元，实际引导发放贷款 1800 多亿元^③。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要求，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鼓励开展小额信用贷款，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同时，鼓励企业采取多种形式进行扶贫方面的创新。为此，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将从七个方面进一步推动金融扶贫：一是完善国家扶贫贴息贷款政策；二是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三是尽快实现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空白乡镇金融服务全覆盖；四是引导民间借贷规范发展；五是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可贷资金 70% 以上留

①数据来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法规司网站，<http://www.cpa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FPB/s5078/201211/190169.html>。

②资料来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发指导司网站，<http://www.cpad.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FPB/gggs/201210/186827.html>。

③数据来源：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13-10/16/content_30312961.htm。

在当地使用；六是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七是加强贫困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五）科技发展

科技发展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主要是把科学理念、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技术灌输给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充分利用科技的创新成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科技水平和农民素质偏低是贫困地区的共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自 1986 年开始，我国政府根据国家扶贫开发的总体战略和要求，适时提出了科技扶贫的目标、措施和办法，并于 1996 年制定《1996-2000 年全国科技扶贫规划纲要》，2001 年和 2006 年又分别制定和颁布了“十五”、“十一五”科技扶贫发展纲要，既增加了贫困群体的收入，又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科技素质。然而，促进贫困地区科技发展还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包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队伍，针对贫困者、因地制宜的科技扶贫项目，积极依托科研部门，有扶贫龙头带动，有个人、企业、政府、生态共赢的机制保障等等，这些均是未来努力的方向。

（六）教育发展

教育发展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提高其人力资源素质，也被称作“教育扶贫”或“智力扶贫”。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教育扶贫的方式主要是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进入新阶段扶贫开发以来，我国教育扶贫的方式开始拓展，针对未成年人的基础教育扶贫得到延伸，实行“两免一补”，同时进一步开展了针对现有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扶贫，包括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及农村中等职业教育。2013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扶贫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农业部等部门研究制定的《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充分发挥教育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作用，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级各类人才，实施范围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所确定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涉及 21 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 680 个县。教育扶贫将让这些地区从根本上摆脱贫困。

此外，沿着经济发展这条主线来实现反贫困目标还必须有贫困群体的积极参与，即积极实践和创新“参与式扶贫”，以贫困者为中心，以贫困者的基本需求为重点，直接让贫困者参与到自己的经济发展和管理之中，包括参与扶贫项目的设计、实施、监测与评估整个过程，以取得更好的反贫困效果。

二、社会安全网已成为我国新时期反贫困模式的重要线索

经济发展对于反贫困的作用是间接的，主要针对相对贫困，更多是强调效率。而我

国新时期反贫困要做到效率与公平并重，也就是说，除了经济发展之外，还要有侧重公平的反贫困线索，以满足绝对贫困群体最低的生存生活需求。全面考察发现，社会安全网能够发挥直接的反贫困作用，是能够与经济发展相配合的、最适合我国的反贫困线索。

社会安全网泛指政府主导形成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涵盖内容非常广泛，狭义上一般特指“社会保障安全网”，包括对贫困和弱势群体进行收入转移、对食品或其他服务的价格补贴、公共工程项目投资或政府创造的其他短期就业机会等等。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世界银行提出社会安全网策略，截至 2011 年，世界银行对 83 个国家的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其它社会保障和劳动力计划的资金支持已接近 60 亿美元。在世界银行的推动下，社会安全网已经成为各国反贫困的重要方式。

我国也正在努力编织社会安全网，向全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对最贫困的社会群体进行救助。我国的社会安全网主要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面向城市居民的城市低保及教育、医疗、住房等多层次的福利保障；面向农村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五保供养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失地农民和农民工社会保障。此外，还有对生活无着人员的救助、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救助体系和多层次扶贫体系。对每个层次的社会安全网说明如下：

第一，社会保险目前由国家、企业（单位）、个人三方共同负担，企业（单位）缴存的比​​例总计为工资总额的 35% 左右，个人缴存的比​​例为个人工资的 16% 左右，国家则通过财政划拨的方式，每年向社会保障基金注入资金。

第二，受财力所限，儿童安全网优先保证贫困、孤残儿童，其载体是各种项目，例如“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重生行动——全国贫困家庭唇腭裂儿童手术康复计划”等等。

第三，妇女安全网主要体现在生育和创业、就业方面，实施“妇女发展纲要”。在生育方面，除了生育保险外，还要加强妇幼卫生监测；在创业、就业方面，通过中央财政全额贴息等方式加强对妇女小额担保贷款的政策扶持。

第四，贫困群体安全网主要体现在以开发式财政减贫为主，教育、科技、金融扶贫、“整村推进”、“以工代赈”等模式为辅的多层次扶贫体系。“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868.37 亿元，较“十五”时期增长 51.8%。2012 年，各级财政共支出城乡低保、医疗救助资金 1547.3 亿元，救济城市“三无”9.9 万人，农村传统救济 79.6 万人，临时救助 639.8 万户次^①。

^①民政部：《2012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cws.mca.gov.cn/article/tjbg/201306/20130600474746.shtml>。

第五，老年人安全网主要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服务、机构照料为辅，地方政府对“三无老人”和“五保对象”给予救济，地方政府不断增加对老年福利事业的投入。

第六，残疾人安全网主要包括高于社会低保水平的残疾人最低生活保障；涉及康复、就医、教育、技能培训、就业、住房等方面的残疾人专项救助；对生活不能自理的残疾人给予护理补贴，对“三无残疾人”给予供养；为在职残疾人提供与其他员工相同的“五险一金”；为残疾人提供基础设施，对医护人员进行技术培训等等。

三、我国反贫困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直至今日，我国的反贫困任务远未完成，按照 2009 年我国新启用的 1196 元的贫困线，贫困人口还有 4300 多万，而按照联合国设定的“日均消费 1 美元”的贫困线我国还有约 1.5 亿贫困人口^①。由于我国贫困人口规模大，扶贫标准低，相对贫困现象凸显，返贫问题严重，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任务十分艰巨。面对新的形势，要反思过去的不足之处，确立新的目标，完善反贫困政策措施，提高减贫效果。

（一）未知的经济发展与艰巨的反贫困任务

一方面我国面临内部经济的多方面不平衡与外部经济的失衡、不确定，这使我们对经济的前景预测的确要打个问号；另一方面，我国还面对大量的贫困人口存量，由贫富差距扩大等多种原因所造成的贫困人口增量。这些都是反贫困事业需未雨绸缪的重大问题。

（二）经济发展主线的反贫困机制存在深层次问题

在具体的反贫困机制与反贫困效果方面还存在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第一，目标瞄准性与扶贫对象的识别机制存在不合理之处；第二，扶贫项目选择机制不尽合理；第三，扶贫资金投入总量不足与管理质量不高；第四，缺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扶贫机制；第五，反贫困的政策支持力度不足与各类政策协调性较差并存；第六，对扶贫项目缺乏有效和系统的监督和评估。

（三）社会安全网主线仅搭建了比较粗的框架

我国的社会安全网已基本覆盖了生、老、病、死以及住房、教育等各方面，但还没能做到事实上的应保尽保和供求平衡，有相当一部分贫困群体未被社会安全网覆盖。例

^①《被特色的中国贫困线》，<http://www.china-gad.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7724>。

如，孤残儿童、流动和流浪儿童、“低保边缘户”^①以及相当多的老年人和残疾人还处于社会安全网之外，对女性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歧视，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网覆盖面较窄。由此可见，在我国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安全网且令其进入运行状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四）反贫困面临的新的主要问题

第一，农村贫困程度仍然较深。第二，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显。第三，处于边缘状态的城市农民工的贫困问题异常尖锐。第四，存在“特殊需要”的群体，包括残疾人、新毕业学生、女性等，使我国贫困人口的结构更加复杂。

四、关于推动“两线一力”反贫困模式运行的政策建议

（一）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带动贫困群体收入增加

第一，发展县域经济，促进收入分配。根据贫困县的具体经济发展条件，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宜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对于资源型贫困县，应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引导和项目带动，推进其经济转型并形成多元化的产业格局，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对于贫困人口集中的城郊地区，应从资金、技术、基础设施、信息等方面对其实施帮扶，弥补其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缺失，并大力扶植城郊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对于企业发展遇到困难引起的县域贫困，一方面提供政策着力扶植企业发展和相关产业发展，一方面优化投资环境吸引社会资本和外资。对于旅游资源丰富的贫困县，应在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基础上，积极引导当地居民参与旅游项目开发和从事旅游服务，促进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只能依靠传统农业发展的贫困县，应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投入，并努力提高支农资金的投入效益，鼓励特色农业发展。

第二，加快农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培育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点。一是整合贫困地区重点产业发展资金，面向贫困农户兴办有市场前景的种、养产业基地，并做好种苗、技术、防疫、销售等有关服务。二是培育和扶持农业龙头企业、扶贫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带动贫困农户发展原料生产，并打通供销渠道。三是引导信贷资金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和运销，培育贫困地区复合经济增长点。

第三，下移贫困瞄准对象到村，探索乡村经济跨越式发展。我国的反贫困政策绝大

^①指人均收入比低保对象要求的人均收入稍高的群体，但是由于他们享受不到低保对象能够享受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没有补差，得不到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救助，缺乏相关就业指导，所以他们的实际生活比低保户还要困难。

部分瞄准的是以县为主的贫困地区，但是，随着贫困人口分布分散化，应下移瞄准对象到村、到户，将非贫困县的贫困村也纳入扶贫规划整村推进。采取跨越式发展模式，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基础好、具备发展条件的贫困村实行扶贫开发重点突破。

第四，促进金融发展，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题。发展县域经济还需要金融的辅助，而要金融资源加入到反贫困中来，就需要财政引导。一方面，加强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扶贫资金的协调配合，为贫困户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项目提供担保和贴息，支持银行扩大风险基金规模，以鼓励金融机构放宽贷款条件及对资金用途的限制、延长贷款期限，但要明确对贫困农户应以发放小额信贷为主。

第五，促进贫困人口权利发展，依据实际需求提高反贫困效率。以反贫困为目的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那么，反贫困项目的设计、实施、监测与评估的全过程都要让贫困群体说了算，给予贫困群体一定的发言权、分析权和决策权，让贫困者直接、充分参与进来，使县域发展与贫困群体的基本需求和接受援助的能力相适应，有助于援助方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提升反贫困的整体价值和政府资源的利用效率。这样，措施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资源更节约，“多赢”的目标能够得以实现。

（二）建设完善社会安全网，对贫困群体做到全覆盖

第一，任何人都不被隔离在“安全网”之外，并按需获得社会福利。一是扩大社会安全网的覆盖范围，采取科学方法准确统计各类人群中未享受社会福利的人数，给予相应的资助。二是根据不同群体对社会安全网的不同需求，安排和设定有针对性的社会福利项目和标准，慎用无偿福利。三是建立科学的动态监测机制和有效的退出机制，保证社会安全网的效率和公平，条件是要有科学的分类标准和识别系统。四是注重立法，将各类人群应享受的社会福利项目、福利水平、获得方式、分类和退出标准以及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比例等内容都纳入法律约束的范围。

第二，强化资金保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社会安全网是最大的公共服务项目之一，政府有责任对其给予资金上的保障，条件是既要保证财政投入的规模，又要保证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一是准确估算覆盖各类人群的社会福利支出和其他渠道筹集收入的规模，建立财政投入的动态增长机制，使财政投入与居民消费指数、最低生活保障挂钩，实现社会福利指数化。二是通过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合作出资以及土地、税收、用水、用电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三是将用于社会安全网的财政收支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严格执行。四是设立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福利项目，明确发放现金补助等政府支持的条件，较好地克服供养懒汉、福利依赖等问题。五是形成高效的组织分工，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和经费分担比例，通过转移支付增强地方财政保障能力。

第三，与经济发展的线索相呼应，对社会安全网进行制度设计。社会安全网的制度设计应注重成本最小化，以让贫困群体更多地通过另一条反贫困主线——经济发展来减贫，这样既可减少对国家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也有助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心目标，还不会被高福利拖累，防止像西方高福利国家那样在经济危机来临时没有运作空间。因此，社会安全网的制度设计的思路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但是受益者只能从中获得最低的生活保障。也就是说，社会安全网的受益者主要是最贫困的群体，并且提供的保障具有短期性或临时性，当受众摆脱绝对贫困后，会自然离开社会安全网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只有当我国社会安全网能够做到对各类人群，尤其是贫困群体的广覆盖，且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才称得上“先进适度”。

（三）完善财政减贫制度及政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网奠定物质基础

第一，进一步优化财政体制，为减贫奠定良好制度基础。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切实减少管理层级，统筹考虑解决贫困县（村）的实际困难。上级财政充分发挥调节贫困县（村）财力差异的作用，完善转移支付的基层测算，确保贫困县（村）财政基本能力得以保障。对小乡镇积极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同时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将乡镇政府职能重点定位为提供农村公共服务并鼓励私人部门和农民积极参与。

第二，赋予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相应的财权和财力，提高贫困地区财政减贫能力。在收入安排上，进一步推进地方税收体系建设，将税制改革作为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按照“减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监管”的原则，逐步健全和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在支出安排上，完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调整政府间支出责任时上级政府必须提供足够的财力作保障。

第三，规范财政减贫程序，提高减贫效率。通过对财政减贫项目的全过程进行科学的可行性分析和论证，确保所选项目真正发挥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在项目下达环节既要发挥财政部门的分配和监督管理职能，又要与有关部门联合，对部门制定的项目计划提出合理化建议，避免雷同。在项目实施环节，要加强对贫困状况和扶贫进程的统计监测，对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跟踪，及时了解和准确反映扶贫开发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此外，要逐步建立跨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实现扶贫资金项目管理信息化，满足社会公众对财政减贫信息的需求。

第四，建立健全财政减贫资金管理的体制机制，提高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益。财政部门在反贫困工作中主要的职能之一就是对财政扶贫资金的管理。建立健全财政减贫资金管理体制机制，对于资金的分配、使用对象的确定、使用方向的选择、监督的完善等每一个环节都是必要的。具体包括，一是立足解决温饱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建立目标

瞄准机制；二是统一财政扶贫资金传递与支出拨付，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分配机制，实行报账制管理；三是以规范的监理办法为基础，建立完善扶贫项目管理机制；四是以防止和杜绝挤占、挪用、贪污现象发生为目标，完善财政扶贫资金监督机制。此外，从中央层面切实解决多头管理、职权不清、责任不明、各行其是以及政策不适应的问题，使现有列入政府预算收支科目的各项扶贫资金能真正按照扶贫政策管理使用。

第五，建立财政扶贫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向贫困地区。一是把扶贫开发投入列入年度财政预算，逐年增加扶贫投入。二是在目前贫困县财力有限、社会扶贫资金分散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中央和省（自治区）扶贫资金的安排比例。三是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财政扶贫配套资金，并在支持定点扶贫和定点帮扶工作的基础上，引导社会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投入扶贫项目。

此外，完善土地、户籍等相关制度和机制，进行财政减贫制度创新，形成减贫的内在动力；建立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使财政政策与农业、价格、土地、信贷、投资、区域发展等政策形成合力，有效发挥政策体系在减贫方面的整体作用。

参考文献：

1. 闫坤等著：《中国农村减贫财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年版。
2. 闫坤、于树一：《公共财政减贫的理论分析与政策思路》，《财贸经济》2008 年第 4 期。
3. 于树一：《引入人群维度的社会福利体系构建——借鉴俄罗斯及拉美三国的经验》，《财贸经济》2012 年第 2 期。
4. 樊琦：《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农户收入分配结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不同收入水平分组农户的调查数据》，《农业技术经济》2012 年第 6 期。
5. 林伯强：《中国的政府公共支出与减贫政策》，《经济研究》2005 年第 1 期。
6. 匡萍：《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使用效率的实证分析》，《新疆农垦经济》2009 年第 9 期。
7. 叶初升、唐晋荣：《减贫视角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县域经济层面的实证分析》，《湖北社会科学》2012 年第 7 期。
8. 胡慢华、王东阳：《贫困地区技术创新的障碍因素和动力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4 年第 5 期。
9. 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我国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瞄准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3 期。
10. 李强主编：《中国扶贫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责任编辑：李 蕊

2013—2014 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

陈文玲

摘要：2013 年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微妙，尚处于经济困境中的美国率先走出危机，日本疯狂向货币注水渐次走出“衰退的 20 年”，欧盟经济呈现复苏迹象。新兴经济体外部风险走高，资本流出加剧，经济增长下行。2014 年总体来看，全球经济仍处于强政策刺激下的弱复苏阶段，以美国为首的经济结盟——“一体两翼”自贸区战略提速，世界经济处于继续分化和深入调整的局面。

关键词：世界经济 “一低五高” 新兴经济体 中国经济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一、2013—2014 年世界经济均处于靠经济政策强刺激下的弱复苏阶段，总体特征表现为“一低五高”

总体看来，2013 年全球经济形势严峻，主要国家经济政策刺激影响下的国际经济复苏出现变局，2014 年其基本经济政策取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世界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主要特征仍可以概括为“一低五高”。

（一）“一低”：世界经济还未真正走出低迷，仍处于强政策刺激下的弱复苏阶段

所谓“一低”，就是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但总体上还未走出低迷。虽然世界银行 2014 年 1 月 14 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大幅调高增幅，2014 年全球

GDP 增长率将从 2013 年的 2.4% 提高到 3.2%，但我们认为，这个预测基于发达经济体强劲复苏，显得过于乐观。2008 年之后是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整体走高，带动世界经济发展；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经济危机，经济一直比较低迷。而当前世界经济的低迷，则表现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靠政策强刺激适度恢复增长，但经济复苏的基础不牢，增长速度总体看仍比较低；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则整体走低。

1. 美国经济虽然恢复适度增长，但复苏的基础脆弱，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在风险和挑战依然存在。在量化宽松、低利率和财政赤字三大基本政策的影响和刺激下，2013 年美国 GDP 增速已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前三季度 GDP 按年率计算增长分别为 2.5%、2.5% 和 2.8%，截至 2013 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已实现连续 17 个季度增长。制造业活动持续回暖是本轮美国经济复苏中的一大亮点。据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12 月 2 日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 2013 年 11 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 57.3，连续 6 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远超预期并创 2011 年 4 月以来新高，其中新订单、生产、就业等主要指数均位于 50 的荣枯线上方，新订单指数由前一个月的 60.6 激增至 63.6，产出指数由 60.8 增至 62.8，就业指数由 53.2 激增至 56.5。2013 年 11 月全美非农就业数据也预期继续好转，全美失业率数据预计将回落至 7.2%。美国经济数据的利好预期 2014 年美国经济增长提速，据预测，美国 2013 年全年 GDP 增速会达到 3.19%，2013-2015 年，平均增速将达到 3.39%。美国房价从 2012 年初开始稳步复苏，升势一直得以持续。以价格计算，不少市场表现相当不俗。与去年同期相比，拉斯维加斯、旧金山与洛杉矶的升幅分别高达 29.2%、25.4% 及 21.7%。

2014 年美国经济依然面临诸多挑战。美国经济恢复性增长主要由于采取量化宽松、低利率、财政赤字三大经济刺激政策，而三大政策都具有相当大的风险。2013 年 10 月 17 日，美国参众两院达成协议重启联邦政府，将美国政府债务上限搁置至 2014 年 2 月 7 日，但该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未来数月美国的财政角力仍会持续，财政政策及对美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影响十分不确定。美联储 2013 年 12 月 18 日宣布，将从 2014 年开始小幅削减月度资产购买规模，QE 缩减之靴刚刚开始落地，但资产购买仍在继续，货币政策仍保持宽松的基调，不论以何种方式退出，美联储回收流动性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通过资本流动、资产价格、货币汇率等渠道扩散至全球，给市场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此，2014 年美国经济有望好于 2013 年，但从目前来看，美国内部实质性的经济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新的经济增长点至今尚不明朗，来自国内的债务困境、失业困境短期内难以摆脱，低增长仍将是主要态势。从长期来看，美国创新驱动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能力仍然强大，美国提出重振制造业计划和扩大国家创新优势等战略，如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将为未来美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2. 2013 年欧盟经济渐次走出危机，但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未消除，2014 年经济复苏态势仍将处于微弱复苏状态。2013 年，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实行宽松货币政策。2013 年 7 月 4 日，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双双宣布，维持 0.5% 历史最低利率不变，英国央行维持 3750 亿英镑购买规模不变，8 月份将推出“前瞻性货币政策指引”，仿效美国设立目标和门槛。在宽松货币政策作用下，2013 年第二季度饱受债务危机摧残的欧盟经济，在经历了前两年的停滞不前和衰退之后开始渐次复苏。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 年二季度欧盟和欧元区 GDP 环比增长 0.3%，第三季度欧盟和欧元区 GDP 环比分别增长 0.2% 和 0.1%，同比看，渐次复苏趋势未变。但是，欧盟和欧元区的环比增速均回落，欧洲经济复苏进程预期会比较缓慢。欧盟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来自德国和英国。德国贡献了三季度欧元区 GDP 增量的 97.4%，英国贡献了三季度欧盟 GDP 增量的 55.1%。法（第三季度 -0.1%）、意、塞浦路斯和捷克仍处于萎缩状态，拖累了欧洲经济复苏进程。

展望 2014 年，欧洲危机有一定缓和，但经济增长之路和恢复财政平衡历程仍将面临重重困难。欧洲央行和英国央行的这种宽松货币政策依然还会延续，温和财政整合背景下欧洲央行宽松的政策、低通胀及消费增长，将构成欧洲经济复苏的政策支撑。但欧洲经济内生动力不足的顽症依然存在，内需不足和外需的可持续结构性问题没有缓解；高企的公共债务仍未解决，财政整合能力越来越弱，财政通缩目标受到挑战；欧洲央行的货币传导机制仍未修复，即使继续加大宽松货币政策力度，由于各国复苏分化，对货币政策诉求不同，政策作用程度减弱。因此，预计欧盟经济复苏依然是微弱而缓慢的，2014 年经济增长有可能在 0.4%—1.0% 之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十分有限，直到 2015 年才能恢复到 1%—1.4% 左右。

3. 2013 年日本经济注入“激素”迅速膨胀，但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和过渡性，其负面作用将在 2014 年集中体现。2013 年在“安倍经济学”“激素”刺激下，日本经济迅速膨胀。所谓“安倍经济学”，即是释放三支“箭”：一支箭是货币“注水”，采取超宽松货币政策；一支箭是灵活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财政赤字不变；再一支箭就是刺激民间投资。所谓“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在 2013 年射出了两支，其一是向货币注水以摆脱通缩，日元对 19 个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对人民币贬值幅度已超过 30%，日本股市大涨，消费倍增，日元贬值，企业获利；其二是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以填补供需缺口，2013 年 5 月扩大 10 万亿日元财政支出。受此影响，日本经济形势大好。据统计，2013 年日本前三季度 GDP 同比实际增长率分别为 0.3%、1.1% 和 2.7%。

安倍经济刺激计划推出已整整一年。在资产市场方面，安倍政府的货币宽松政策带来的效果明显，突出体现在日元和日股的表现上。但日本实体经济表现则好坏参半，经济增长动力昙花一现，不仅个人消费增长难以为继，而且国际收支状况更加恶化。安倍

的结构改革缺乏具体细节和切实措施，刺激效应难以持续。

2014 年，处于“激素”刺激下的日本经济难以实现强劲增长。日本继续 2013 年的经济政策，蕴含着极大的经济风险，预计将在 2014 年集中凸显或局部爆发危机。OECD 预测，2014 年日本政府和央行继续积极推进财政和金融政策，经济增速将达 1.5%，日本经济增长势头有望维持，但在该国消费税率将提高的情形下，“安倍经济学”的效果还有待检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3 年日本公共债务与 GDP 之比将高达 245%，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亦接近 10%，远高于所有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公共财政已难以持续。向货币注水的无量化、无限期宽松政策，也将在 2014 年出现危局：一是将导致日元快速贬值，日元在全球的信用水平将继续下降；二是日本把它的经济危机转嫁到了别国身上，尤其是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韩国，对中国和韩国出口企业都有很大影响，反过来这两个贸易伙伴将对日本作出反制措施；三是日元贬值不仅不能解决自身困难，也将加剧日本的债务负担，加剧财政风险。现在日本利用货币贬值和注水来刺激增长，使货币的含金量越来越少，实物量越来越少，价值量越来越少，含水量越来越多，泡沫越来越多，用这种代价换来数字的上升，只能说明“安倍经济学”是政客的疯狂行为。由于日本债务 90% 以上都是借本国企业和居民的钱，所以，在世界上没有引发太大的关注和影响，但内部集聚的风险加大。2014 年日本不准备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在经济刺激下的迅速恢复甚或增长，像一个打了激素迅速发胖的病人，这种态势绝对是不可持续的。在经济政策强刺激下，很多矛盾和问题将继续困扰日本，如提高消费税可能带来的消费意愿下降，由于货币贬值和化石能源进口猛增、贸易逆差持续走高等。日本政府 2013 年 12 月 21 日称，2014 年财政年度日本经济预计增长 1.4%，比 2013 财年年度的 2.6% 低 1.2 个百分点。

4.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虽然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 2013—2014 年或更长时期经济增长则整体走低。在美日欧三大经济体走向复苏的同时，受全球流动性泛滥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双重影响，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整体遭遇逆风。金砖五国除中国经济小幅放缓外，其余四国均大幅下滑。2013 年中国经济增速为 7.7%，印度 2013-2014 财年的预计增长率仅为 4.7%，中国和印度的增速将达到近年来的最低点；俄罗斯增速预计 2.4%，为 1999 年以来最低点；巴西经济增速从 2010 年 7.5% 下降至 2011 年 2.7%，再至 2012 年 0.9%，2013 年预计为 2.5%。在发达国家股市上涨超过 20% 的情况下，巴西、俄罗斯和中国股市跌幅分别高达 22.14%、16.47% 和 12.07%， “熊冠全球”。南非、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货币对美元汇率快速贬值。

2014 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预计中国经济年经济增速稳定在 7.5% 左右，俄罗斯 2%，印度 5%，巴西 1.95%。拉美地区增长率在 3.2% 左右，仍处于低增长状

态。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地区大国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一方面，自身内部发展来看，新兴经济体正值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社会转型期和社会矛盾多发期，普遍面临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传统产业竞争力弱化，新产业和新增长点尚未确立，产业发展失衡导致结构性通胀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发达国家凭借其在全球经济金融中的主导优势，不仅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国际金融市场操作等宏观政策，对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影响，而且还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对其它国家造成冲击，这等于发达经济体把经济危机变相转嫁给了新兴经济体，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经济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增大了新兴经济体“保增长”和“防风险”政策的选择难度。

（二）“五高”：世界经济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继续加大，“五高”仍是主要表现形式

2013年发达经济体在政策刺激下呈现复苏性增长，但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世界经济“五高”问题凸显。这些问题具有长期趋势性，有的问题尽管只是暂时现象，但后期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可低估。2014年这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而且日益加剧。

1. 高债务风险压力。金融危机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公共债务不断攀升。2013年10月18日在政府“停摆”结束后的第一天，美国主权债务首次超过1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5.37万美元，预计2013年底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20%，美国债务上限不断提高，“债务悬崖”成为常态。美国国会在债务上限死线逼近前通过法案，将债务上限的约束力暂停至2014年2月7日，财政部得以维持发债能力，避免债务违约，并结束联邦政府局部停运。由于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财政悬崖”和美国债务危机不仅是美国的，而且也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一道坎，美国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将继续给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欧洲方面，欧洲债务危机整体上还没有解决，也还没有解决问题大的进展。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二季度，欧元区政府债务88746.16亿欧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242.61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92.3%升至93.4%；欧盟政府债务112809.86亿欧元，较上季度末增加1379.74亿欧元，占GDP比重由上季度的85.9%升至86.8%。半个世纪以来财政赤字已成为美国的常态，展望2014年，美国2013年10月18日通过两年预算协议，但此项协议避开了退休制度、医保计划、税收政策、债务上限等两党分歧最大的议题，在未来肯定会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欧洲诸多成员国财政紧缩压力依然沉重，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尚处于较高水平，赤字超标难以避免。据相关预测，欧洲国家公共债务不断增加的势头可能要到2014年下半年才会有所改变，希腊可能要等到2020年才有望将债务降至124%的水平。亚洲形势也并不乐观，按照IMF预计，2013年日本政府债务率高达243.5%，2014年仍将处于较高水平，政府债务屡创历史新高，成为全球负债第一大国，削赤减债任务十分艰巨，财政紧缩将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抑制消费和投资需求。印度政府债务率高达68.1%，财政赤字占

GDP 比重近 6%，2014 年也仍将处于较高水平。中国政府债务虽然在可控范围，但也集聚着风险。债务危机正在向全球弥漫，特别是美日欧三大经济体债务危机难以根本改善，国际金融风险和不确定性仍将长期存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随时可能遭受威胁。

2. 高失业风险压力。国际劳工组织 2012 年统计全球的劳工失业率平均是 12.6%，北非中东是 25%，西欧是 4%。2013 年美国、英国、日本的失业率虽然逐渐降低，但仍面临高失业风险压力。就业最大化在过去数十年一直是美国央行两大目标之一，随着联储局把货币政策走向与失业率挂钩，劳工市场的表现就更备受关注。美国从 1 月份的 7.9% 降到 9 月的 7.2%，10 月又上升到 7.3%，仍高于降低宽松货币政策的目标 0.8 个百分点。从 2008 年第二季开始，美国失业率迅速飙升，在 2009 年 10 月升至 10%，复苏的步伐相当缓慢，按照失业率在 18 个月内的升幅推算需要近 6 年时间才能被抵消。劳动人口的相对下降体现在劳动力参与率上，2013 年 10 月，美国 16 岁以上人士中仅 62.8% 有就业或正寻找就业机会，创下 1978 年 2 月以来新低，虽然 9 月份失业率较上月下滑 0.1 个百分点至 7.2%，由于该月有 13.6 万人放弃寻找就业机会，劳动参与率维持在 63.2% 的 1978 年以来的低位，尤其是劳动力总量（就业人数与寻求就业人数之和）出现萎缩，复苏力度难以令人信服。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美国脱离劳工市场的总人数升至 9180 万人，为有史以来最高。

欧盟失业率一直在高位徘徊，据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 年 10 月欧盟 28 个国家失业率为 10.9%，欧元区 17 国失业率为 12.1%，两个数据均保持高位，较 2012 年同期分别提高 0.4 和 0.2 个百分点。欧盟各成员国中，失业率最高的是希腊和西班牙，分别高达 27.3% 和 26.7%。日本失业率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最低的，2013 年 10 月为 4%，预计 2014 年失业率仍在 4% 左右。高失业率对世界各国都是很大的压力。据经合组织一份有关就业率前景的年度报告显示，截至 2013 年 4 月，在其 34 个成员国中，共计 4800 万劳动力失业，比 2007 年的多了 1600 万。该组织预期，其 34 个成员国的失业率在 2014 年底将保持在 8% 左右，这个数据仅比 2009 年失业率最高值低 0.5%。此外，中国大学生、高端人才的就业也是很大的问题。

3. 高货币金融风险压力。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债台高筑的发达经济体财政政策已无空间，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渐次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致选择，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被迫跟进。“量化宽松”是美国在金融危机后使用最频繁、力度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货币政策。从 2009 年 3 月 18 日到目前，美国先后推出了四轮宽松货币政策。前三轮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有点羞答答地实行，还有起止的时限。从 2013 年这一轮则来势凶猛，货币政策导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美联储把利率政策与失业率及通胀挂钩，为未来利率的变动设立“门坎”，只要失业率在 6.5% 以上，未来一、二年的通胀

预期不超过 2.5%，就会维持现有接近于零的超低利率水平。过去几年美国每次推出宽松货币政策时，都有一定理由和程序，而这次掀起的“货币海啸”打破常规，流动性声势骇人。美国联邦市场委员会表示，零利率政策至少持续到 2015 年中期，而且将来不再以时间，而是以失业率作为实行货币政策的基准。可以说从现在起，美国货币政策不是“量化宽松”，而是持续性宽松，无限度宽松，无限期宽松。2012 年 12 月 12 日安倍向时任央行行长的白川方明提出多项货币政策措施，包括无限量资产购买计划，上调通胀目标至 2% 等。安倍政府超宽松货币政策目的是推低日元，再续日本的“弱日元”政策。第一支箭从 2013 年年初开始实施，宣布无限量印钞直至通胀接近 2% 的控制目标；4 月份进一步加码，宣布两年内扩大基础货币一倍。长期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也相继采取宽松货币政策，直接货币计划（OMT）从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F）向欧洲稳定机制（ESM）永久救助机制过渡，向市场释放大量流动性。

美国、日本这种蛮不讲理和毫无道理的货币政策，在全球货币政策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创举，不仅对美国，而且将对国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债务市场、大宗商品市场都会产生很大影响，给 2013 年的世界经济带来了影响，也是 2014 年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美日欧三大经济体集体带头向货币放水，不肯放弃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债务高企，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动荡，现在好多国家又加入了“放水”国家行列，印度、澳大利亚还有一些国家都在跟进，这一轮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带来的货币风险还在加大。展望 2014 年，虽然美国已明确表示 2014 年初逐步缩减 QE，但由于受失业率、通胀率和政府政治博弈等多重因素的影响，QE 的削减将是逐步的。欧盟和日本还没有放弃的迹象，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将出现资本外流和出口进一步受阻，导致经济遭遇新的困难。

4. 高市场风险压力。高市场风险是指输入性和输出性通胀和通缩同时存在，传统风险和非传统风险同时存在，国际社会大宗商品、国际金融、粮食安全等风险同时存在。同时，如网络空间安全、经济问题政治化、意识形态导致的经济金融危机等非传统风险也在急剧增加，国际市场风险出现反市场变动规律的现象。过去是美元贬值，大宗商品、黄金升值；美元升值大宗商品、黄金就贬值。2013 年以来出现美元贬值、日元贬值、欧元贬值，黄金也同时贬值，大宗商品暴跌，股市暴跌等等这些反常态化市场规律的经济现象。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为了使其宽松货币政策不受谴责，能够继续顺利实行，有意对市场操控，使市场出现反周期的现象，实质上是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经济体为维持现有政策而造成的市场假象。通过他们之间的互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日本为了解决本国的困难，向货币大量“注水”，按说它本身有那么高的财政赤字，应该受到负面评价，但它的这种行为还受到 G20 认可，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一种行为，这是很反常的。现在各国关起门来制定政策，如果如此这般只顾自己国家的话，大家都使自己

的货币贬值，都向自己的货币“放水”，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如果黄金暴涨、石油暴涨、农产品暴涨、股市暴涨，这些国家这种政策肯定搞不下去，肯定就会遭到全世界的谴责，他们的政策意图也不会实现。展望 2014 年，大宗商品的国际市场风险有增无减，目前黄金价格进一步下降，粮食价格抬头，将进一步显现反传统市场规律周期的迷局。

5. 高龄化风险压力。联合国最新人口调查报告显示，2011 年全球人口已突破 70 亿，全球人口从 60 亿增至 70 亿只用了 12 年，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80 亿，到本世纪末将达到 100 亿。发达国家老龄化与“婴儿荒”同步，美、日、意、德等国家，60 岁以上人口比例都将达到 30% 以上，儿童人口增长率持续低迷甚至负增长。令人担忧的是，老龄化在向发展中国家加速挺进，一些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或“边富边老”。到本世纪中期，发展中国家老龄化率将上升到 14%，老龄人口将比现在增长 4 倍。在劳动力曾经取之不竭的东亚，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将从 2010 年的 64% 降至 2050 年的 57%。老龄化社会加速到来，劳动适龄人口逐步减少，既预示着全球性人口红利将结束，从而改变经济规模持续扩大的发展前提；也将对传统福利社会模式、教育、就业、养老等一系列问题提出变革的迫切需求。据联合国报告预测，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将达到 91.5 亿的峰值，其中 60 岁以上人口将突破 20 亿，占全球总人口近 22%，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增至 16%；届时每位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仅能依靠 3.9 个年龄介于 15 岁至 64 岁的劳动力供养，而在 2010 年这个比例还是 1:8.7。全球人口老龄化还预示着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下降，消费水平上升，但购买力却急剧下降，这将会削减经济发展动力。全球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能否实现消费水平以及老年人口购买力水平的整体上升，取决于相关政策的执行力和有效性，例如，金融业的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将极大地降低人用于整个生命周期未来的预防性储蓄。

二、影响 2014 年乃至更长时期的几个重要变量， 将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不均衡状态

2013 年导致全球经济复苏变局的几个重要变量，在 2014 年乃至更长时期持续发酵，世界经济增长处于动力转换和区域布局深度调整状态，将进一步加剧世界经济动态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

（一）发达经济体正在从军事结盟、外交结盟到经济结盟，对非经济结盟国家和地区造成战略挤压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2008-2011 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 90% 来自发展中国家。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2012 年 12 月公布的研究

报告《2030 全球趋势：不一样的世界》，中国在 2000-2020 年间的 GDP 增长将占世界 GDP 增长的 55%，届时中国和印度将拥有世界最庞大的中产阶级。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支撑了处于困境中的世界经济，使美国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引致全球经济毁灭性打击，这不但没有记功，反而引发了发达国家的嫉妒和种种打压。

像一出传奇的大片，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美国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和清算，反而通过转嫁危机摆脱了困境。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不甘心退居次要位置，正加快与欧盟、日本实行经济结盟——建立高标准自由贸易区，预计 2014-2015 年将进入“收获期”，世界经济秩序将被进一步搅乱。美国实施“一体两翼”战略，先于 2011 年 11 月加入 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使成员国迅速从 4 个增加到 12 个，日本 2013 年 3 月高调加入谈判；美国 2013 年 6 月宣布与欧盟正式启动 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伙伴协定），设定 18 个月结束自贸区谈判，而过去类似谈判至少需要几年时间。尽管谈判中的博弈仍在继续，但步伐大大加快，预计 2014 年底或 2015 年上半年将完成 TPP 和 TTIP 谈判。如果美国战略意图如期实现，将极大影响东亚一体化（RCEP）进程，影响亚洲现有合作框架实施，最终如果如期建成亚太自由贸易区（涵盖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即 APEC 所有成员国）和美欧自由贸易区，这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的经济结盟将取得重大成果，全球贸易版图乃至经济版图将由此重写。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表演者看，美国、日本和欧盟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越来越步调一致地采取相同的战略和经济政策。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欧盟亦加快向货币注水，货币战已经打响；美国另起炉灶，加快建立高标准自贸区与 WTO 分庭抗礼，日本、欧盟亦步亦趋热烈响应，贸易摩擦此起彼伏；美国页岩气革命引发能源革命，日本可燃冰将成为能源开发新亮点，欧盟率先发起碳交易，引发世界性碳革命；美国“重返亚太”，将经济竞争的中心转向亚太市场，日本、欧盟也都将竞争的目光紧盯亚太市场；在重建国际金融秩序、贸易秩序和市场秩序的进程中，美日欧三大经济体也趋向一致，以扭转其在国际竞争中的颓势，遏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例如，TTIP 谈判被称为“史上最大双边自贸协定”，将 WTO 未涉及的新领域作为谈判内容，谈判的重点是规制的协同，尤其是在新技术方面解决当前和未来工业化面临的问题。将消除相当关税于 10%-20% 的非关税措施、建立新的标准和规则、设定国有企业全球标准等。这些措施有可能产生“意大利面条碗”的溢出效应，不仅大大降低美欧开展大西洋业务的成本，还将对全球贸易规则 and 标准产生重大影响。一旦美欧在产品技术标准达成一致，成为新的国际标准，TTIP 就可能成为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基础，进而影响全球规制制定，它将和 TPP 一起，大大提高未参与国家和地区贸易投资成本和参与全球化的成本，对非经济盟国形成战略挤压或战略排斥。

（二）创新驱动发展成为世界潮流，全球制造业分工布局向有利于发达国家方向倾斜并深度调整

长期以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是世界制造业的主导，美国更是在整个 20 世纪里保持着世界头号制造业强国的地位。然而，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制造业产业转移和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 年下降至 21.5%，到 2009 年跌破 20%，2010 年所占份额为 19.4%，略低于中国的 19.8%，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头号大国的地位。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世界经济增长周期与技术革命息息相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自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及其转化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开拓新市场。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实质是主导技术的更新换代、主导产业的更替、市场竞争优势的转换，从而创造更大的利益。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加速推动了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此次结构调整与以往不同在于其本质上是一场抢占创新科技制高点的全球竞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更加重视利用科技创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运用高端科技打造核心制造业和相应的服务业，成为发达国家的核心战略。金融危机后，美国反思其多年来的“去工业化”政策，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但美国所提的“再工业化”绝不是简单的“实业回归”，而是对以往传统工业化的扬弃，其实质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高端制造业，形成新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创新政策和制度的完善，成为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核心环节。为保证“再工业化”战略有效实施，2010 年 8 月美国发布了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 年美国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强调，以驱动创新完善自由企业制度；2012 年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在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将完善创新政策作为三大原则之一。目前，美国创新技术推动下的页岩气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页岩油产量已占石油产量的 12%；3D 打印技术开始应用。美国宣称，未来 20 年通过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等，重构制造业的竞争格局，利用新技术击败中国的制造业。欧盟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则把新能源和信息技术作为两大重点。根据欧盟的计划，到 2020 年欧洲获得的电力中将有 20%来自可再生能源，到 203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30%。日本历来注重科技创新，在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中，日本在智能电网、电动汽车以及智能机器等创新技术方面全球实力开始展现。据日本经济产业省预测，到 2015 年护理机器人的市场规模将达 167 亿日元（约 2.1 亿美元），到 2035 年为 4000 亿日元（约 51.1 亿美元）。若包括可以成为老人朋友的机器人在内，到 2035 年，机器人市场规模将增加到 5 万亿

日元（约合 638.9 亿美元）。此外，2013 年日本成功从海底可燃冰中提取天然气，成为世界上首个掌握海底可燃冰采掘技术的国家。

从 2014 年和更长的时期看，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3D 打印和新型材料等技术正在引发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其实质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出现与融合。在这场革命中，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生产方式正在取代传统的人工、机器的方式，制造业开始走向数字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产业形态，如智能制造，供应链重构，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现代流通对制造流程的再造，能源革命等。创新驱动成为新一轮全球竞争的核心和关键，新一轮全球经济布局的演化，其内在因素和最大变量将取决于创新能力。

（三）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常态被打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发生转变

进入本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绝大部分时间里都保持了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新兴经济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6 年至 2008 年，“金砖四国”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 10.7%。2008 年，仅“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全球的 15%，贸易额约占全球的 1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已经超过 50%。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更是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2008—2011 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 90%来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整体崛起，支撑了处于困境中的世界经济。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 GDP 总值已约占到全球的 50%，贸易量约占 40%，外汇储备约占 70%。

虽然新兴经济体在过去 10 多年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当前的经济发展却出现发展速度放缓的迹象。根据 2013 年第三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态势出现了转折性分化，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似乎要由新兴经济体转化为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态势弱化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与发达经济体相反，经济增长进一步延续放缓态势。衡量新兴市场增长前景的汇丰新兴市场指数 2013 年 7 月份一度降至 50 以下的收缩区间，8 月份也仅略高于 50 的荣枯分界线。新兴经济体增长延续了 2012 年以来持续放缓的态势，而同期的 OECD 国家先行指数 2013 年 7 月份升至 100.7，创下 2011 年 5 月份以来新高；美日 PMI 指数也均达到两年来的高位，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态势出现加速迹象。二是与发达经济体截然相反，新兴经济体物价水平维持高位。2013 年第三季度，新兴经济体的俄罗斯、巴西通胀率持续维持在 7%和 6.5%的年内高位附近，印度物价已连续 8 个月以两位数速度上涨，而同期的美国、欧元区通胀基本保持在 2%的范围以内。即使实行“安倍经济学”的日本，物价涨幅也十分有限。三是翘翘板效应出现，国际资本流动出现从新兴经济体向

发达国家的回流的迹象。进入 2013 年第三季度以来，国际短期资本继续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回流。EPFR 数据显示，2013 年 8 月底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基金每周仍有近 30 亿美元的净流出。种种迹象显示，在超级宽松政策的刺激下，发达经济体三季度表现好于预期，大有取代新兴经济体重新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味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3 年 10 月《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13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降至 2.9%，2014 年将回升到 3.6%，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发达经济体。

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新兴经济体在经历了 10 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迎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新兴经济体将面临自身经济社会转型和外部环境恶化的双重挑战，不过从长远来看，随着新兴经济体自身结构性问题逐步解决和全球治理机制的演变，新兴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四）经济全球化基本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猛并有局部替代全球化之势

2008 年以来，世界经济调整变化并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态势。市场经济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在市场化目标下，对内经济自由化、对外开放和参与全球化分工，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已经成为各国市场化的内在制度安排。目前，全球形成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经济共同体和共同市场的组织已经超过 300 个，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已融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之中。据 WTO 统计，90% 以上的 WTO 成员国都加入了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而没有加入任何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则属于例外的情况。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大趋势。

但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加速发展契机，区域经济一体化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并成为当今世界大国的重要战略选择，局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替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开始主导和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从 2010 年 3 月开始至今 TPP 谈判已进行了 19 轮，2013 年 10 月 TPP 成员国在巴厘岛达成协议，确定 2013 年底要完成谈判。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现在 12 个 TPP 成员国的 GDP 规模已达 14.91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40%，是欧盟经济规模的 1.5 倍。TPP 如果谈成，将成为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对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格局的冲击不可低估。2013 年 6 月美国和欧盟启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协定》，现已开展了两轮谈判。2013 年 3 月，欧盟和日本开始启动经济合作协定（EPA）谈判，现已举行三轮谈判，第四轮谈判将在 2014 年 1 月举行。2013 年 10 月欧盟与加拿大就双方《全面贸易和投资协议》（CETA）达成原则性共识，此外，欧盟还与印度、韩国等签订了贸易协

定。经济金融危机也为中国加快推进区域贸易协定提供了契机。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 18 个，涉及 31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 12 个，涉及东盟、智利、巴基斯坦、新西兰、新加坡等 20 个国家和地区，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 6 个，涉及 22 个国家，分别是中国与韩国、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和挪威的自贸谈判，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谈判。此外，中国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RTA）的联合研究，加入了《亚太贸易协定》，中美自贸区谈判构想也可能启动。积极构建双边、区域、多边的经贸关系体系成为世界主要大国的重要战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被弱化，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依托的贸易之争、金融货币之争、市场空间之争、制定规则之争将变得更加激烈。

综上所述，由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的新一轮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仍在加速，发达经济体通过科技创新转换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积极参与和主导国际经济合作与联盟，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也正在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变为发达经济体，整个世界经济格局进入一个深入调整期。

（五）全球能源生产重心和消费重心转移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量，受美国页岩气革命“蝴蝶效应”影响持续扩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能源全球化进程正在加速，能源革命在全球展开，将对能源市场和能源贸易带来深远的影响，特别是美国页岩气革命为首的能源革命，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颁布了能源新政、《未来能源安全图》以及《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计划在未来 10 年投资 150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开发、积极发展下一代生物燃料和燃料基础设施，并正式提出国家层面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即在 2020 年以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改进的方式满足电力需求的 20%，其中 15% 由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来实现。欧盟峰会于 2008 年通过“20—20—20”战略，即：到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基础上减少 20%；可再生能源占总能源消费的比例在 2006 年 8.2% 的基础上提高到 20%；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20%，即能源消费量在 2006 年基础上减少 13%。为实现此目标，欧盟将该目标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分解，并要求各国启动立法程序予以保障。2011 年 8 月，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电气事业者采购可再生能源电气的特别措施法》，扶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从各国的战略决策看，以核能、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将持续突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的下降速度很可能大大超出预测。

全球能源供应重心西移。一直以来，中东始终是世界能源版图的中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保持在 60% 以上，主要进口来源地是中东。随着北美能源地位的提高，中东未来将退居为亚洲的能源中心。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从历史

最高 67%降低到 50%，预计未来 10 年内还有可能再降低 10 个百分点。同时，从美洲进口石油比重已经上升到 53%，而从中东地区进口比重已经下降到 16%，预计可能将下降到 10%以下。

全球能源需求重心东移。过去 40 年，随着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世界能源消费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能源消费重心明显东移，世界能源消费格局已经从发达国家主导转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OECD 国家年均增速 1.1%，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由高达 60.3%下降到 42.5%，下降近 18 个百分点；以亚太地区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速 3.4%，占比由 36%增至 57%，增加 21 个百分点；中、印两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速高达 4.5%，占世界能源消费的比重从 10%提高到 24.5%。全球能源消费的重心正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转移，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成为全球能源格局中的最大利益相关者之一。2013 年 11 月 12 日，国际能源署（IEA）在北京发布《世界能源展望 2013》（World Energy Outlook 2013）报告，为 2035 年前全球能源发展绘制了一幅新的图景。在报告中，IEA 指出，世界能源领域供需格局正发生深刻变革，原来的主要能源进口国正变为出口国，如北美国家；曾经的能源出口国则成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长的中心，如中东国家。总体而言，全球能源消费的重心正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转移，而在供给端，以美洲为代表的西半球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全球能源新格局正初露端倪。另外，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兴起、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正在改变全球的能源格局和能源来源。

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能源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还能促进各国注重降低能源消费量，缓和全球能源供需缺口，增加能源供应的安全性。在国际压力下，一些国家制定了减少碳排放的计划，如减少煤炭在能源结构中比重、提高能源效率、支持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能源补贴等。然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大规模消耗化石能源将面临巨大压力，谋求经济发展、摆脱贫困将面临严重制约。例如，中国的能源需求增速很高，其中包括了天然气、煤炭、可再生能源、石油和核等各种能源，但中国的五年规划中要求减少煤炭的消费。《世界能源展望 2013》报告预测，到 2035 年，中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将从 2011 年的 68%下降到 2035 年的 53%，这对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意义很大。

2014 年，国际地缘政治动荡将使全球能源市场面临较大冲击。伊朗、叙利亚等地区局势持续动荡，加大了市场不稳定性。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在经历政局动荡后的产能恢复状况也成为影响原油市场的重要因素。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伊拉克 2020 年石油产量将超过 600 万桶 / 日，2035 年日均产量超过 800 万桶，届时将成为亚洲市场的主要供应方。

责任编辑：刘英奎

从我国国际商务合作新趋势 看企业发展新商机

沈丹阳

摘要：新时期我国国际商务合作出现了新的趋势，合作规模将持续扩大，将更加多元平衡、全面发展；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商务合作迎来扩大服务业开放带来相关服务业大发展、服务出口、进口贸易增长、以及“走出去”对外投资的新商机。

关键词：国际商务合作 趋势 商机 “走出去”

作者简介：沈丹阳，商务部办公厅副主任。

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标志，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全球价值链快速拓展，我国国际商务合作出现了新的趋势，企业对外合作发展面临着许多有利的新商机。

一、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呈现三大趋势

（一）对外开放的领域将持续拓宽，开放的形式、区域、产业和对象等方面都将得到新的拓展

从开放的形式看，我国外贸将继续充当“排头兵”，国际商务合作将把“引进来”与

“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对外贸易是过去 35 年我国开放幅度最大的一个领域，但开放还没到尽头，特别是进口领域扩大开放值得期待。服务贸易的扩大开放，更是大势所趋。在对外资的开放方面，不仅不会停止利用外资的步伐，相反会继续扩大利用外资的领域。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越来越看重通过外资带来技术、管理、经验与人才，看重利用外资对我国相关体制改革的促进，看重利用外资带来的就业。同时，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也会有更多的举措。到 2013 年底，我国已有约 3.8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化经营能力是不得不为的选择。

从开放的区域看，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在这方面，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更具体的开放构想，比如：允许沿边重点口岸、边境城市、经济合作区在人员往来、加工物流、旅游等方面实行特殊方式和政策；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显然，在区域开放方面，将会把重点转到扩大内陆沿边开放上。

从开放的产业看，过去开放的主要是制造业，下一步要加大开放力度的将是服务业和农业。回头看过去 35 年我国开放历程，哪一个产业开放得早，哪一个产业发展就快；哪一个产业开放得慢，哪一个产业发展就慢。服务业和农业将同样如此，扩大开放是大势所趋。在“引进来”的同时，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领域势必更加宽广。2013 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投向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领域的，合计占了将近一半；投向采矿业占将近 22.4%，制造业仅占 9.6%，建筑业占 7.2%。今后几年，我国在技术成熟、国际市场有需求的一些行业，如轻工、纺织、家电、装备、化工、冶金、建材等制造领域，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将会大大加快。

从开放合作的对象看，尽管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们实际上已经向全世界全方位开放了，但过去几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开放增加了一个很特别的对象——那就是各种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二）对外开放将更多触及经济体制、法制建设、发展战略、合作模式等深层次问题

从体制上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上海自贸区的深度试验，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探索建立国际高标准的投资管理体制，包括投资的公平环境、投资准入的国民待遇、产业保护等。这其中就涉及到几个有深度的改革。一是在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把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二是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三是工商登记直接与现在进行的商事登记

制度的改革衔接。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突破，是通过对外开放对体制改革的一种“倒逼”，促进政府职能加快转变，探索管理模式创新，为全国深化改革积累新的经验。

在法制建设方面，全面扩大开放对体制改革的“倒逼”，必将进一步推动涉外法律体系的重大变革，使国内法律特别是涉外经贸法律在开放中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很多关键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通过开放获得外部动力，在法制建设方面同样如此。三中全会提出，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就是一个重要信号。

在发展战略和合作模式方面，今后几年加大力度实施“走出去战略”和“自贸区战略”这两大战略，是扩大对外开放、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必然，也是对外开放向深度发展的体现。我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对有利于区域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自贸区的安排都持开放态度，会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积极参与区域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的各项安排。因此，未来的开放合作模式将是多领域的合作趋势。比如，我们与东盟就是从贸易合作，到投资合作到其他领域的合作。原来自贸区建设关注的重点主要在货物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制度化安排，下一步将逐步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开展互联互通合作。这同样是对外开放朝深度发展的体现。

（三）对外开放将更加有高度，或者说水平将更高

一方面，国家将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要把对外开放与进一步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开放本身具备更高水平。另一方面，对外开放必然越来越看重“质”的目标，要通过提高就业贡献、提高经济增长贡献、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提高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在提高就业贡献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将有利于保就业并提供新的更好的就业机会。外贸的开放对我国就业的贡献很大，全国现在大约有 1.5 亿人直接或间接地从事与外贸相关的工作。今后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开放与发展，同样能解决大量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比如，到 2013 年年底，我国共有服务外包从业人员 536 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 356 万人。

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是有没有，而是有些人质疑是否会“过度贡献”的问题。外资企业多年来创造了我国一半左右的进出口、1/5 的税收和 1/4 的工业产值。对外投资同样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我们将更注重通过对外开放促进结构升级，促进消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对外开放中提高我们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地位，因为只

有通过进一步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赢得发展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

在促进国内居民消费方面，我们要通过开放扩大居民在国内的消费，而不是相反。2012 年我国消费者在欧洲退税购物金额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 30 亿欧元，首次成为全球退税购物者数量最多的国家。很多人认为，我们应该通过对进口的进一步开放，让我国消费者对在国内销售的进口产品质量和服务能够认可，让我国游客尽量把钱花在国内。

开放水平的提高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势必推动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我们在互利共赢、高效安全地参与全球化进程方面也将会更有所作为，我们将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践行者、国际规则的参与和制定者、共同利益的维护者以及和谐世界的建设者。

二、我国国际商务合作规模将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一）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十五”时期我国出口年均增速高达 25%，“十一五”时期降至 15.7%，近两年已转为个位数增长，但仍是全球主要贸易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2012 年我国出口首次超过 2 万亿美元，在全球占 11.2% 的份额。2013 年，全国出口累计也已经超过 2 万亿美元，达到 2.16 万亿美元，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一，但我国外贸出口仍然有必要并且将进一步发展。据世贸组织秘书处的统计，英国 1870 年出口占全球的 18.9%，美国 1921 年达到 22.4%，都明显高于我国目前的水平。这说明我们有进一步提高在全球外贸市场份额的空间。因此，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出口仍将继续保持适度增长，并继续稳步提高在全球市场的份额。

2012 年，我国进口达到 1.82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2013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1.95 万亿美元。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以及经济发展的需要，进口势必还会进一步扩大。预计未来五年进口将达 10 万亿美元，并继续保持全球前两大进口市场的地位。

（二）国际服务贸易加快发展、地位提升

近几年，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速。2012 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超过 4700 亿美元，比 2011 年增长 12.3%，占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5.6%，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0.8%，在全球服务进出口总额的位次从上年的第四位上升了一位，位于美国和德国之后居第三位。2013 年我国服务贸易预计将达到 5200 亿美元左右。

尽管如此，我国服务贸易目前仅占对外贸易总额的不到 11%，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

20%左右，说明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巩固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出口的同时，国家将推动出台加快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措施，制定重点服务出口领域指导目录，支持保险、通信、研发、设计等新兴服务出口，积极扩大文化艺术、新闻、教育、中医药等特色服务出口。继续推进服务外包发展，制定出台新一轮促进政策，鼓励引进高端人才。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政策的实施和服务贸易开放步伐的加快，预计今后几年也将是服务贸易继续快速大发展的时期。

（三）将成为全球主要国际投资合作大国

2013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1176亿美元，同比增长5.25%，连续11个月保持增长，连续21年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引资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将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并且列出了许多具体的重点开放领域，如推动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抓紧梳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专项产业政策中限制类条目，提出扩大开放意见。

对外资准入领域的放宽，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国正在与美国、欧盟等国家开展投资协定谈判和区域经贸合作谈判。我国企业要“走出去”，要到国外去投资，需要以开放换开放，同样，要让国外的企业和资金更多地进来。2005-2012年，我国对外投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5%。2012年，我国对外投资创下了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3年，我国共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仅就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要推动“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以及“扩大企业与个人对外投资”的要求来看，我国对外投资将会明显提速，并且与利用外资的规模趋于接近。2012年，我国利用外资金额只比对外投资多了345亿美元，2013年对外投资仅比利用外资少约274亿美元。未来3年内，我国的对外投资规模有可能会超过利用外资。

三、我国国际商务合作将更加多元平衡、全面发展

（一）市场多元化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外贸的市场多元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对发达国家和地区出口占贸易总额的70%以上，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口仅占25%，逐步调整到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贸易各占半壁江山。2013年，我们对欧盟、美国、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已经只占出口总额的38.8%，有效分散了国际市场风险。但出口多元化也还有发展的空间，比如，目前还有50多个国家我出口占其市场份额不到5%。

与此同时，今后几年，进口贸易、利用外资、对外投资等方面的市场多元化同样还有很大空间，特别是对外投资同样将呈多元化趋势。目前，我国对外投资遍布全球七成国家和地区，行业分布广泛，但无论从具体投资国别还是从投资的行业分布看，还是过于集中。比如，2013 年，对香港、东盟、欧盟、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七个主要经济体的投资达到 654.5 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72.6%。从对外投资领域看，投向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领域的，合计占了将近一半；投向采矿业占将近 22.4%，制造业仅占不到 10%，建筑业占 7%。我国在技术成熟、国际市场有需求的一些行业，如轻工、纺织、家电、装备、化工、冶金、建材等制造领域，以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将会大大加快。从对外投资的主体看，今后也将呈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中央企业、地方企业、民营企业、金融机构、个人都将是重要的投资主体。

（二）合作领域多元化

服务业国际合作。随着国际产业分工的变化，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服务外包和服务投资成为全球商务合作新热点，我国服务业尤其需要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我国服务业在 GDP 和总就业中的比重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类发展中国家，与我国发展地位很不相称。服务业开放的重要性不仅是服务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更是扩大就业的需要。2013 年 10 月我国已正式宣布参加世界服务贸易协定谈判。随着我国对服务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并与相关国家商签自贸协定，服务业国际合作将成为热点。

农业国际合作。我们这几年进口了比过去多得多的粮食，这既是农业开放的表现，也是理念上的进步。我国将以占世界 19% 的人口总量，以只有全球平均水平 40% 的人均耕地面积、全球平均水平约 1/4 的人均水资源等禀赋条件，全面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注定是一个离不开全球要素集聚、交换和整合的开放过程。进口粮食相当于进口了水资源、土地资源，进口了国外各种各样的资源要素。如果不进口粮食，要满足现在对粮食的需求，农作物播种面积还有 20% 左右的缺口，而以我们的农业资源和技术水平，最多只能弥补其中的 10% 左右，也就是说，还有 10% 要通过农业国际合作的方式来补足。

沿边开放与“一带一路”合作。今后几年，我们势必要加快推动沿边贸易、投资、创新协调发展，加快与周边互联互通，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形成全面开放的国际经济合作带，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全面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竞争日趋激烈。面对世界经贸格局新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深刻变革。发达国家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

则，积极推进“竞争中立”、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21 世纪”新议题谈判，以占领未来国际竞争制高点。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国势必要着眼经济利益遍布全球的现实，全面参与重大经贸合作谈判，在新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中抢占先机。

（三）更加平衡，全面发展

通过扩大进口，促进进出口平衡发展。随着中国与众多经贸伙伴签订自贸协定，以及继续推动贸易平衡战略，中国进口势必进一步开放，进口关税将进一步降低、非关税措施也将进一步减少。比如，最近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国务院批准，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将对进出口关税进行部分调整。760 多种进口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平均优惠幅度达 60%。还将创新进口贴息方式，加大先进技术和关键装备进口；增加我国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等进口。

通过培育竞争新优势，促进外贸竞争力提高。长期以来，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是支撑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重要优势，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外贸的比较优势将加速从“数量、价格优势”向“技术、质量、品牌优势”转换，形成新的综合竞争新优势。出口开放方面也还有一些小的空间，比如，目前一些出口商品仍实行国营贸易和配额、自动登记等管理，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这一领域的开放还会继续扩大。此外，商务部已明确表示，将出台政策支持大型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加快培育跨境电子商务、扩大市场采购贸易，形成外贸新增长点；支持汽车、船舶、摩托车等行业重点企业建立健全海外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系，推动自主品牌企业开展商标和专利的海外注册；继续鼓励加工贸易向内陆地区有序转移，引导加工贸易龙头企业向营销企业转型。

通过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多双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平衡发展。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方兴未艾，自贸区建设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截至 2013 年 7 月，向世贸组织通报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 249 个。美欧正在开展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伙伴关系（TTIP）等“高水平”自贸区谈判，对国际经贸环境影响深远。我国自 2002 年开始对外商谈自贸区，已签署 12 个自贸协定，正在商谈的还有 6 个，涉及 31 个国家和地区。从已经实施的自贸协定情况看，政治和经济效应都比预期的还更好。比如，2002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时，双边贸易额只有 548 亿美元，2012 年贸易规模已经超过 4000 亿美元，年均增长达到 22%。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为完善新时期对外经贸关系布局明确了重点。今后几年，在多边层面，我们将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减少和消除贸易投资壁垒；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

序更趋公平合理。在双边层面，我们将创新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模式，加强政策协调，增进开放互信；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优势互补、错位竞争，维护共同利益。在区域层面，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贸区战略，主动参与新议题谈判，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次区域层面，深化大湄公河、泛北部湾、大图们江等地区合作，形成于我有利的地缘经济和政治新格局。

四、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商务合作迎来新的商机

无论站在宏观层面还是企业的角度看，今后几年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商务合作都将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不排除局部地区、个别行业、少数企业由于开放和竞争而有所受损，也会存在因认识不一而产生的其他种种问题。尽管如此，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商务合作仍将是机遇大于挑战。

（一）扩大服务业开放带来相关服务业大发展的商机

仅就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提到的这些服务业领域进行分析，相关服务市场今后四年就可能增加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市场营业规模。比如，仅金融服务市场，包括银行服务、证券服务、保险服务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服务，假设进一步开放后新进入的企业每年能占有 1-2 个百分点的市场份额，这些企业就会分享到数以万亿元计的营业规模。

再如，教育服务方面，虽然我们国家的教育特别是学历教育，不可能完全走产业化道路，但职业教育、幼儿教育、特殊教育和各种教育培训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根据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最新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处于最高 25% 收入水平的家庭对子女教育投入每年平均达到 3607 元，其他收入家庭也投入近 2000 元，依此推算，今后我国所能开放的教育服务每年的市场营业规模会在 2000 亿元以上，今后四年容量也在万亿元以上。

文化服务方面，2012 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 4 万亿元。其中，仅新闻出版业的营业收入就达 1.6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14.6%。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随着开放促改革的有力带动，未来几年市场增长势必还将提速，市场商机同样非常巨大。

电子商务方面，2012 年全国交易总额突破 8 万亿元，2013 年突破 10 万亿元，同比增长都在 30% 以上。2012 年网络零售总额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5%。2013 年继续高速增长，仅双十一“光棍日”一天的销售额就达到 350 亿元。电子商务的发展可以用“井喷”来形容。

物流服务方面，2012 年我国全社会物流总费用 9.4 万亿元，2013 年还是两位数的增长，将首次超过 10 万亿元。

上面提到的这些服务业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精神，也必然要对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开放，这就给了国内企业带来很多商机。

（二）服务出口的商机

2012 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占全球比重约为 11.2%，而服务贸易出口仅占全球 4.4%。服务贸易的总额占全部贸易额的 10%，也明显低于全球服务贸易占全部贸易 20%左右的比重，所以我国在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必然也要在服务贸易领域扩大开放，积极鼓励扩大服务出口。

这几年，我国服务贸易增长很快，但进口增长明显快于出口的增长，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因此，在服务业扩大开放的同时，今后几年政府将实施更有力的措施来促进服务出口，我国服务出口将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这也将给服务企业带来发展的大好商机。一般认为，我国技术、软件和信息服务、商贸流通、金融保险、服务外包等新兴服务，以及面向国外提供中文教育、中国餐饮、中国影视、中国会展、中医药等中国特色服务，都将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三）进口贸易增长的商机

2013 年我国进口额接近 2 万亿美元，今后五年进口总规模有望超过 10 万亿美元。这除了将给世界各国带来巨大商机外，也会给国内企业带来机会。长期以来有关进口问题存在着两个认识误区，一是进口有害无益论，受几百年前“奖出限入”理论影响，有人老是觉得进口对经济有害，只有出口有利。二是进口无空间论，认为除了消费品，其他我们该进都进了，而消费品不能多进口。其实，进出口应保持大体平衡才是正确的选择，才更有利宏观经济健康发展。而扩大进口，实现进口基本平衡，我们还是有空间的，需要从政策上适当引导扩大消费品的进口。

随着消费结构的持续提升，国内居民消费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未来四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望年均增长 15%左右，2015 年有望达到 32 万亿元左右。中央提出，要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不能不考虑如何满足老百姓对进口消费品的合理需求。预计今后几年，从进口汽车、照相机、手机，到高端轻工产品、家具，以及服装、食品等消费品，都会有较大的增长空间。除了直接的进口贸易经营外，进口物流、进口融资服务，以及进口商品的国内销售、营销，包括进口商品展览会，进口市场咨询、培训等，都存在大量商机。跨境电子商务过去主要是出口商品，今后将会大量出现消费品的进口，与此相关的物流、运输、报关、保险、融资、代售贸易等，同样会有

大量商机。

（四）“走出去”对外投资的商机

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到 2012 年底累计仅 5000 亿美元左右，相当于美国的 10.2%，英国的 29.4%，德国的 34.4%，位居全球第 13 位。2013 年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额与上年相比增长 16.8%。可以预计，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投资将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整个“十二五”的对外投资年均增长将在 20%以上，到 2015 年，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可望达到 1200 亿美元左右，并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预计到 2017 年，我国境外净投资将达到 1700 亿美元以上，今后四年大约会有近五千亿美元的对外投资规模。

之所以做出我国对外投资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并且将给我国企业国际商务合作带来新商机的判断，是出于国内、国外两大因素考虑。

从国内角度看，既有需求，有内生动力，也有条件和可能。不仅因为我们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也是产业结构调整、转移的需要。我国现在部分领域具有设备、技术、管理以及标准优势，这些恰恰是可以满足很多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等方面，需要新建或者改造形成的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我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整合与国际化经营能力，已成为国家战略。《决定》提出，要“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这将进一步壮大我国“走出去”的微观主体，释放对外投资合作潜力。如果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进展顺利，今后几年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疑将面临着更好的对外投资选择，面临在全球配置资源的更多良机，可以更好地通过对外投资获得国外的人才、经验、技术及资源。

从国外来看，2008 年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计划，一些国家对外国投资限制有所放宽，部分欧美及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绿色环保产业等领域与我合作的意愿进一步增强。据不完全统计，早在 2011 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就已实现境外纳税 220 亿美元，解决当地就业岗位 88.8 万个，这就使得我国企业“走出去”总体上受到了普遍欢迎。

责任编辑：刘英奎

我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排斥效应研究

姚战琪

摘要：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增长，服务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并不明显，生产性服务业 FDI 具有相对封闭性特征；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不利于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外商投资具有更低的技术效率特征；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无促进作用；不容忽视服务业外商投资带来的安全风险。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 技术溢出 国际竞争力

作者简介：姚战琪，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持续增长，同时服务业外商投资所占比重不断上升，2011 年，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比重首超制造业。当前，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呈现以下特点：增速较快；主要集中于房地产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利润率较高的商务服务业；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紧密关联，但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影响较弱。最新研究显示，我国

产业体系仍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当前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业增长和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从此角度看，随着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我国很难排除陷入被动发展逻辑的可能。这是因为：第一，外资进入我国服务业可能不会产生明显的技术外溢效应。随着研究的深入，部分研究成果并不支持外商投资正向溢出效应，并且外商投资溢出效应是模糊的。Haddad and Harrison（1993）对摩洛哥 1985-1989 年制造业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Konings（2001）认为，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吸收外商投资也不存在溢出效应，但是，来自美国的实证研究支持了在发达国家的外商投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对技术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周洁、刘畅，2011；姚战琪、夏杰长，2013）。当前，学术界关于服务业外商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成果极少。Manuel and Machado（2005）考察了 1970-1996 年亚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数据，认为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溢出效应是不确定的，它受国内总投资率和各国利用外资政策等因素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服务业外商投资在拉丁美洲各国具有明显的负向挤出效应（即替代效应），在非洲各国没有显著的关联性。对于我国而言，我们认为，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可能不会促进服务业技术水平的改善，反而会钳制甚至抑制服务业高端化的发展，这主要是由进入我国服务业的外商投资的特性所决定的。邓宁将服务业外商投资划分为两大类：制造业外商所投资的服务企业与专业提供服务产品的外商投资（胡晓鹏，2012），而在华服务业外商投资大多属于第一类（即在跨国公司母公司原有业务的基础上，为了配合制造业生产服务或完善上下游产业链所发生的外商投资），跨国公司往往依靠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来衔接完成其基本运作，其核心技术被独立的企业体系包裹，因此本土企业学习门槛较高，导致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可能不明显。

第二，外商投资进入可能对我国服务业国内市场需求及服务贸易总额产生不利影响，不利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高。当前，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品牌效应远远大于国内企业，伴随外商投资服务业的大规模进入，将对本土市场需求造成不利影响，我国服务业的本土市场需求将遭受沉重打击。以餐饮业为例，肯德基和麦当劳进入我国市场后垄断快餐行业市场，同时其真正的核心技术和餐饮配方一直掌握在母国手中。2005-2007 年，麦当劳在我国快餐连锁市场份额为 21%，肯德基的市场份额达到 40%。同时，服务业外商投资并未显著提高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本人一项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远远小于其对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

第三，外商投资可能带来安全风险。我国政府在吸引外商投资的进程中，还需高度警惕服务业外商投资大量进入我国后所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等问题。夏杰长（2013）的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比制造业更为深刻，但是我国政府在政策

制订过程中，对“国家安全”或者“国家经济安全”缺乏基本定义，其内涵与外延都非常模糊。例如，信用服务业规模虽小，但与国家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再如，由于我国审计等专业服务规模较小，如果国外相关企业全面控制高端审计市场，将有可能导致我国国家经济数据不安全（赵玉娟，2010）。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高度重视服务业外商投资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

二、高度依赖外资工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 FDI 具有相对封闭性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显著提高我国工业企业生产效率，因此，生产性服务业 FDI 的影响因素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认为，制造业 FDI 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 FDI 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但是，由于生产性服务业 FDI 对内资工业企业具有相对封闭性特征，因此它对内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远远小于其对外资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生产性服务业 FDI 往往追随下游 FDI 进入东道国为生产者服务，服务业 FDI 的独立运营体系不利于技术扩散。在如此情形下，必然造成本土企业技术难以升级的不利后果。同时，高技术服务业 FDI 对我国制造业效率的促进作用大大小于发达国家。高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高技术服务业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和降低生产成本对提升制造业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我国，高技术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大多数产业对制造业效率影响并不显著。

（一）模型构造

本文主要研究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因此我们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FDI_{i,t} = \alpha + \alpha_1 MAFDI_{i,t} + \alpha_2 GR_{i,t} + \alpha_3 EXP_{i,t} + \alpha_4 TEL_{i,t} + \varepsilon_{i,t},$$
$$i=1,2,\cdots,n, t=1,2,\cdots,T \quad (\text{模型 1})$$

被解释变量为各省区生产性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额（FDI），解释变量包括：第一，地区生产总值指数（GR）；第二，信息化水平，用各省区每百人中的固定电话用户数量来衡量（TEL）；第三，各地区进出口额与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EXP）；第四，各省区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额（MAFDI）。

（二）数据来源

目前，学术界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具体分类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采用中央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延分类，包括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JTFDI），租赁和商务服务业（ZLFDI），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KYFDI），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XXFDI）四个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由于数据可得性限制，我们选取部分省份 2004-2011 年数据，具体包括辽宁、黑龙江、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河南、广东、贵州和甘肃等省份和地区，数据来源于《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三）实证检验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JTFDI	MAFDI	ZLFDI	TEL	EXP	XXFDI	KYFDI	GR
均值	126711.9	3745475	184194.6	168.2331	0.440396	92409.44	93528.39	112.5743
中位数	65852.40	2726262	90839.21	169.8900	0.255451	39929.33	31919.81	112.4000
最大值	487796.0	12502312	749311.2	231.7500	1.624567	483628.0	902040.4	115.2000
最小值	0.000000	3946.476	23.91540	107.1400	0.047613	0.000000	0.000000	108.9000
标准偏差	145842.3	3646190	206631.9	29.08758	0.433121	115516.8	164607.3	1.550286
样本数	70	70	70	70	70	70	70	70

本文对分产业不同年份的面板模型分析结果见表 2。制造业外商投资与我国交通运输业、商务服务业、研发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显著正相关，模型的显著性 P 值均为 0.000，因此模型是有意义的，表明制造业外商投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增长。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 Hausman Test 检验结果显示，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实证结果优于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制造业外商投资对信息服务业外商投资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目前，跨国公司在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仍未发生彻底转变，但该产业进入门槛低，规模效应不明显，获得巨额利润是其主要投资目标，而不是为外资工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因此，该产业外商投资与制造业外商投资关联度不高。

地区生产总值指数实质就是我国各地区实际增长率，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生产总值指数与交通运输业、商务服务业、研发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负相关，这表明外商在一个地区进行生产性服务业投资时主要关注的不是地区增长潜力，更关注我国各地区制造业外商投资。

各地区信息化水平与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显著正相关，同时，各地区进出口贸易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与交通运输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FDI 正相关，但与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服务业和软件业 FDI 负相关。交通运输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是外商投资进入我国的主要产业，本文实证结果表明，规模最大与所占比重最高的部分生产性服务业 FDI 流入与我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

表 2 各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外商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1	模型 2
C	1100528 (1.485167)	1017416 (1.744197)	3572481 (3.381541)	3151628 (3.503477)	1048339 (2.710567)	1420886 (1.468943)	566260.8 (2.357606)	1442246 (1.635550)
MAFDI	0.018804 (4.490730)	0.015926 (4.072665)	0.024428 (4.091850)	0.025077 (4.721975)	0.016376 (2.897998)	0.026843 (3.810535)	0.007480 (2.164354)	0.003508 (0.664555)
TEL	1571.690 (2.807160)	921.9438 (3.773307)	1205.751 (1.510527)	1475.643 (3.863971)	401.8383 (3.147387)	1249.628 (3.045538)	162.6950 (1.732361)	464.5657 (1.278056)
EXP	86953.49 (2.052678)	128529.0 (4.113097)	165141.0 (2.734382)	148781.1 (3.459523)	-401979.3 (-5.827964)	-108611.7 (-1.925605)	-125105.4 (-2.449947)	88681.70 (2.092681)
GR	-11909.81 (-1.782773)	-10315.76 (-2.029893)	-33338.64 (-3.500335)	-29945.16 (-3.816570)	-8084.161 (-2.289380)	-14093.98 (-1.671992)	-4251.516 (-1.941681)	-13169.56 (-1.713779)
R ²	0.790234	0.720335	0.790404	0.768605	0.634757	0.300923	0.824793	0.588994
F 检验值	2.111950		8.234568		7.449173		3.683983	
F 显著性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Hansuman Test		1.808013		2.837270		31.297216		2.846224
P> χ^2		0.7710		0.5854		0.0000		0.5839
样本数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注：F_{0.05}(9,69)=2.02；模型 1、模型 2 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个体随机效应。

三、低端化锁定：服务业外商投资具有较低的技术溢出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 FDI 高度依赖外资工业企业，同时，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是否提高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值得关注。目前学术界认为，外商投资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提升，对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因此，服务业外商投资绝对规模

（即外商投资总量）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并且对服务业技术进步的边际影响为正，但是 FDI 是否能促进国内技术和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传统的方法通常会得到外商投资能促进我国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等结论，但该结论已不符合我国实际和发展前景。本文进一步以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即服务业外商投资占我国第三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解释变量，探索其对我国服务业技术水平的影响。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本文实证模型设定为：

$$TFP_{i,t} = \alpha + \alpha_1 ST_{i,t} + \alpha_2 Log(FDI)_{i,t} + \alpha_3 Log(K/L)_{i,t} + \sum_{j=1} \beta_j COVA_{jt} + \varepsilon_{i,t},$$

(模型 2)

模型 2 中 ST、FDI、K/L 分别表示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即服务业外商投资占我国第三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服务业外商投资的实际金额、服务业资本劳动比，TFP 表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根据研究目的，本文加入与技术进步相关的经济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见表 3）。

表 3 控制变量描述

控制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作用	符号
固定资本形成	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	反映服务业经济增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程度	GUDING
贷款使用效率	贷款占 GDP 的比重	反映我国金融发展状况以及信贷增长对实体经济拉动作用大小	LOAN
财政支出的相对规模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反映政府提供财政支撑和衡量财政活动的规模对服务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GOV
运输线路长度	以我国各地区每平方公里土地铁路长度来测算	反映基础设施建设	YUN
人口自然增长率	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口数之比	反映人口增长速度	RZ
人均工业增加值	人均工业增加值反映经济效益	反映工业化程度	GRIN

本文使用的样本是我国 28 个省、直辖市的 1992-2011 年 20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本文将重庆并入四川，不含西藏自治区和海南省），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中国商务年鉴》等相关各期。

（二）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模型 2 对应的实证结果见表 4。

表 4 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结果（1992-2011）

解释变量	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控制变量	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C	0.680573***	27.08069	0.0000	GOV	0.150398***	6.073078	0.0000
ST	-0.000316	-1.403600	0.1611	LOAN	-0.017497***	-3.549834	0.0004
ST(-1)	-0.000495**	-2.512125	0.0123	RZ	-0.000035	-0.117309	0.9067
ST(-2)	-0.000246***	-2.973091	0.0031	LOG(YUN)	0.009533***	5.694213	0.0000
LOG(FDI)	0.005346***	5.489802	0.0000	GUDING	304.4859**	2.320859	0.0207
LOG(K/L)	0.016924***	7.638553	0.0000	GRIN	0.894450***	15.40804	0.0000
Hansuman Test	335.592161	$P > \chi^2$	0.0000	F 检验值	15.747818	F 显著性	0.0000
R ²	0.759058	截面单元	28	观察值数	476		

注：*** 表示 1% 的显著水平，** 表示 5% 的显著水平，* 表示 10% 的显著水平，括号中数字为 t 统计值。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与当期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并不显著相关，而与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显著负相关，并且伴随滞后期的延长，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越大，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越高。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反映了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业是否存在技术溢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与我国服务业技术水平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的增长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的高端化和技术水平的提升。

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绝对规模（即外商投资总量）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并且对服务业技术进步的边际影响为正。尽管服务业外商投资绝对规模促进我国服务业 TFP 增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与我国服务业技术水平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表明外商投资在我国对现代服务业低端化锁定，对我国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

资本劳动比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在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中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其对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人口增长率对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也具有负面影响。人均工业增加值、固定资本形

成、运输线路长度对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影响。地方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例对我国服务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显著增强，无论从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地方财政支出对服务业发展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四、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外商投资具有更低的技术效率特征

本文进一步剥离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服务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从而探讨外商投资和其他因素对服务业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深入分析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特征以及外商投资等环境因素对服务业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影响的差异性。

（一）变量说明

为剥离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对我国各省区服务业产业效率的影响，本文选取以下外部环境变量：1. 人力资源指标，包括人力资本变量和城镇化率两个指标，本文使用 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来度量人力资本，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居民平均受教育年数分别为 0、6、9、12 和 16 年；城镇化率为我国非农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计算各地区非农人口所占比重。2. 以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各地区对外开放指标。3. 需求条件，包括个人所得税收入和人均居民消费水平两个指标。4. 市场化进程指标，以非国有服务业企业劳动力占比指标来测算。5. 基础设施开发，以我国各地区每平方公里土地公路长度和每平方公里土地铁路长度的几何均值来测算基础设施开发程度。

（二）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笔者使用三阶段 DEA 分析法对 1985-2011 年我国服务业和工业部门生产率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见表 5），针对工业行业，外商投资规模对资本与劳动投入松弛变量的估计值均为负数，因此，工业外商投资规模的增加有利于节约资本与劳动，从而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表明工业行业外资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效率。但针对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对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松弛变量的估计值均为正数，这表明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具有较低的技术效率，伴随外商投资的增长，其对我国服务业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需求不断增长，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外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而不是减少对我国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本文研究结果发现，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外商投资环境变量，导致我国增加资本和劳动投入松弛量，不利于我国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从表 5 可看出，人力资本变量对服务业与工业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并且均能通过 10% 的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以居民平均受教育年数衡量的人力资本增加时，我国服务业与工业两种要素投入的松弛变量将会迅速减少，因此，对服务业与工业生产

率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越高，表明劳动者素质越高，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服务业与工业对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需求，从而对经济生产效率有积极作用。

针对服务业，增加非农人口所占比重有利于减少资本与劳动投入松弛变量，即有利于减少资本与劳动投入变量的浪费；针对工业，增加非农人口所占比重有利于减少资本投入松弛变量，即有利于减少资本投入变量的浪费，但是，增加非农人口所占比重促进劳动力投入松弛变量增长，不利于减少劳动力投入变量的浪费。

个人所得税收入对服务业与工业两个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正，表示该环境变量的值越大，越会造成要素投入的浪费，不利于服务业与工业效率的提高。

人均消费水平对服务业与工业两个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负，表示人均消费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投入松弛变量减少，有利于节约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变量，提高各省服务业的效率水平，这一结论与理论预期一致。

非国有服务业企业劳动力占比对服务业两个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对服务业资本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通过 1% 显著水平检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由于市场机制有待完善而导致的偏差；非国有企业产值占比对工业资本和劳动力两种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负数，说明非国有企业产值所占份额的增加，会促进工业两种投入松弛变量的减少，从而有利于工业生产率的提高。

基础设施开发对服务业与工业资本投入松弛变量的系数符号显著为正，表明基础设施开发规模增长造成投入松弛量的增加，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投入，不利于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这是因为基础设施开发多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是政府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体现，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对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的减少以及短期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五、贸易排斥：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服务业外商投资具有较低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我们还认为，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本文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Y_{i,t}=\alpha_1X_{i,t}^2+\alpha_2X_{i,t}+C \qquad \qquad \qquad \text{（模型 3）}$$

其中，Y 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指数（即服务贸易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 为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该指标与前文相同）。为了论证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

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 1981-2011 年相关数据, 数据来源于 WTO 统计数据库和商务部服务贸易资料。

表 5 我国服务业与工业 SFA 估计结果对比

变量	服务业		工业	
	劳动力投入 松弛变量	资本投入 松弛变量	劳动力投入 松弛变量	资本投入 松弛变量
常数项	3.674977E+01 (0.774064)	9.628792E+04*** (95957.760000)	-3.416586E+01 (-0.7043414)	8.467112E+01 (0.399371)
人力资本	-1.614007E-07*** (-4.217984)	-8.922846E-04*** (-3.237661)	-2.851211E-07*** (-4.813311)	-1.119049E-06*** (-4.322291)
非农人口所占 比重	-4.550613E+01 (-0.396005)	-1.864969E+06*** (-1863893.800000)	3.343565E-01 (0.003394)	-4.044730E+02 (-0.9392939)
外商直接投资 (服务业 / 工业)	3.708414E+00 (1.238275)	5.112513E+04*** (50622.411000)	-2.741961E-10 (-1.082900)	-2.215529E-09*** (-2.001957)
个人所得税	1.362490E+01*** (2.424960)	8.875323E+04*** (87709.317000)	5.035300E-09*** (4.417330)	2.480779E-08*** (4.979354)
人均消费水平	-3.174341E+01*** (-1.718906)	-2.217352E+05*** (-213061.520000)	-1.333616E-02*** (-2.584117)	-6.298652E-02*** (-2.792411)
非国有企业 劳动力占比	1.484837E-01 (0.118902)	5.195796E+03*** (1339.676800)	3.431615E+02*** (2.372753)	8.889623E+02* (1.406331)
非国有企业 产值占比			-1.555198E+02 (-1.270028)	-2.022656E+02 (-0.3779201)
基础设施开发	2.964934E-02*** (1.455050)	3.176880E+02*** (3.042393)	7.206048E-03*** (4.781370E-01)	1.010150E-01*** (1.533528)
σ^2	2.307952E+03*** (2.307973E+03)	2.693734E+11 (2.693734E+11)	0.11809003E+04*** (1180.900300)	1.603191E+04 (16031.910000)
γ	9.999988E-01*** (1.172349E+08)	1.000000E+00*** (7.106176E+03)	4.9000E-01* (1.7300)	5.0000E-02** (2.0300)
似然函数值	-152.91335	-423.58241	-143.034690	-187.322200
LR test of one side error	4.225938	0.922126	0.07135917	9.3573

注: LR 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服从混合卡方分布。*** 表示 1% 的显著水平, ** 表示 5% 的显著水平, * 表示 10% 的显著水平, 括号中数字为括号内为 t 统计值。

（二）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模型 3 对应的实证结果见表 6 与图 1。

表 6 1981-2011 年我国服务业 RCA 与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的回归结果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T 检验值	Prob.
C	3.693893	0.107086	34.49453	0.0000
X	0.213076	0.095995	2.219653	0.0361
X ²	-0.036396	0.019987	-1.821018	0.0811
R-squared	0.222387		Adjusted R-squared	0.157586
Prob(F-statistic)	0.048884		F-statistic	3.431833
Mean dependent var	3.954917		Durbin-Watson stat	2.347692

得到以下回归方程：

$$Y_{i,t} = -0.0363X_{i,t}^2 + 0.2131X_{i,t} + 3.6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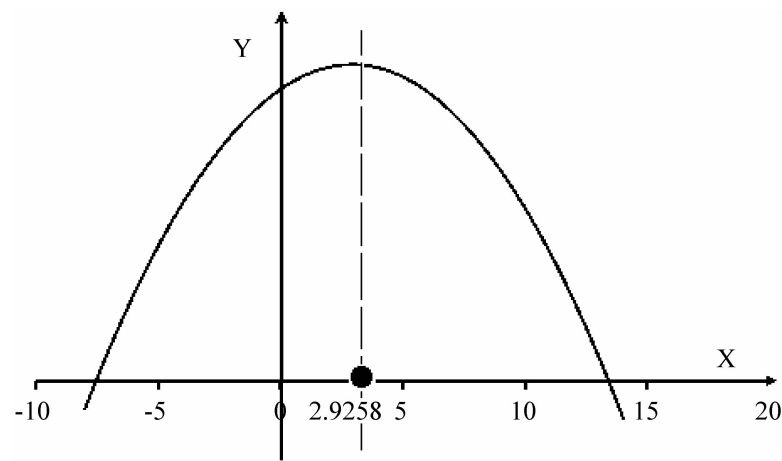


图 1 服务业外商投资阈值效应图

由以上实证结果可知，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阈值效应。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即当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大于 2.9258 时（通过计算 $\frac{\alpha_2}{-2\alpha_1}$ 可得到），会使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由正转负，即形成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服务业竞争力“倒 U 型”的影像模式。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与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之间并不呈现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呈现为二次方程形式，当前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业比

较优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大于一定数值时，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便处于下降趋势。对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与外商投资进行比较、分析和评估可以发现，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当服务业外资相对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会对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由此可见，服务业外商投资促进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但对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并无促进作用。

服务业外商投资对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并无促进作用，主要是因为服务业外商投资具有较低的技术效率，对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有逆向作用。与工业外商投资相比，由于服务业外商投资企业具有更低的技术效率，伴随外商投资的增长，其对我国服务业资本和劳动要素的需求不断增长，不断增长的服务业外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而不是减少对我国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不断增长的对劳动力和资本的需求与内资企业关联度不高，近年来，外商在华投资向生产性服务业快速扩张，但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跨国制造企业，导致我国内资生产性服务业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低端。当前，国际分工格局呈现为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和投资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发展中国家必然处于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从而导致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较低的技术效率。

六、不容忽视的安全风险：外商来华 投资高端服务业而中国发展较晚

首先，为了避免外商在高端服务业投资以及高端服务体系被外资控制带来一定程度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各地政府应合理引导外商投资方向。尤其是当前在我国东部地区致力于经济转型升级和服务经济发展，以及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资源和劳动力优势，不断促进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产业转移，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对服务业外商投资的争夺造成服务业外资进入领域管控的放松，境外资本在我国服务业领域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带来数据安全、信息安全、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风险。

第二，我国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科技研发、商务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较晚，高端服务体系不发达，我国产业整体处于国际分工全球产业链低端。当前，我国经济规模日益扩大，而国家经济安全十分薄弱，高端服务业是维护和促进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产业，因此，各级政府必须高度重视高端服务业发展，制定政策促进我国高端服务业大发展，提升我国产业安全水平（李永坚、夏杰长，2012）。同时，虽然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服务体系不完整对国家经济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必须建立高端服务体系，整合国内高端服务业资源，形成我国高端服务业竞争优势，推动我国高端服务业大发展。

第三，目前，我国学术界存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思路的缺陷，国家经济安全与产业安全研究思路仍存在重制造业而轻服务业、重市场占有率而轻产业成长功能、重产业本身而轻产业间联系、重股权而轻核心能力等问题。

七、进一步分析及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服务业外商投资绝对规模促进了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不利于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其对我国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明显，呈现为负的溢出效应，同时，生产性服务业 FDI 具有相对封闭性特征。这是因为：第一，我国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即服务业外商投资相对规模）的增加只是量的增加，而缺乏质的提高。目前，房地产业是服务业外商投资规模最大和比重最高的产业（目前该产业占服务业外商投资协议额的比重在 50% 以上），但该产业并未给中国服务业带来明显的技术优势。同时，金融、广告、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但受到有关政策的约束，此类服务业外商投资比重的增加极为有限，还不能形成技术溢出效应。第二，在服务业领域，我国企业在产品设计、管理技术、技术诀窍和服务水平等方面与跨国公司的差距远远大于制造业，即我国服务业与服务业 FDI 存在较大的技术差异，服务业吸收能力不足以及缺乏与外商投资企业进行切磋技艺的能力和水平，从而导致我国服务业技术吸收能力有限，因而未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第三，由于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较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导致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不具有为外商制造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能力，从而使生产性服务业 FDI 与制造业 FDI 互相促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不能显著地促进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第四，我国企业不能很好吸收服务业外商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服务业专业人才的严重缺乏，同时，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逆向人员流动产生明显的负溢出效应。

当前重要的是，要落实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这一战略部署，同时，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的战略部署。按照这一部署，当前服务业外商投资为我国服务业带来的技术溢出的学习和吸收能力急需加强，发挥外商投资对提升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促进作用，特提

出以下建议：第一，提高服务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缩小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尤其是对那些在竞争能力上与外商投资企业差距较大的行业，尽快出台激励与支持措施，帮助企业缩小差距。第二，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放力度，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开放金融、软件业、咨询业等服务贸易领域，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第三，引导服务业外商投资的行业投资方向，对服务业 FDI 项目的评价要从注重数量多少转变为注重评价服务业外商投资技术含量的高低。第四，注重人才培养，发挥人力资本在提升服务业技术溢出效应进程中的作用。要提升我国服务业国际竞争力，运输业等传统服务业必须尽快地向现代服务业转型，而发展现代服务业最重要的投入就是人力资本。加强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大力发展知识技术密集性的服务贸易，推动运输业等服务业尽快向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第五，加强国内服务供应商与外资企业的联系，加快技术转移。鼓励外资企业与国内购买方和服务供应商之间建立广泛的联系，同时，要不断提高本土生产性服务业为外商制造业企业提供生产性服务的能力，从而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显著地促进我国服务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

参考文献：

1. Haddad, Mona, and Ann E. Harrison. 1993. "Are There Positive Spillovers from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for Moroc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42 (1): 51-74.
2. Konings, J. 2001. "The Effe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Domestic Firm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Panel Data in Emerging Countrie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9 (3): 619-633.
3. Manuel Agosin and Roberto Machado, 2005. "Foreign Invest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es it Crowd in Domestic Investment?"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s* 33 (2): 149-162.
4. 胡晓鹏：《全球化陷阱：中国现代服务业外资排斥效应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12 年第 11 期。
5. 李勇坚、夏杰长：《高端服务业：维护和促进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产业》，《国际贸易》2012 年第 6 期。
6. 夏杰长：《打破垄断和完善规制：深化现代服务业改革的关键所在》，《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5 期。
7. 姚战琪、夏杰长：《服务业全球化趋势及中国选择》，《全球化》2013 年第 3 期。
8. 赵玉娟：《服务业 FDI 对中国的经济效应研究》，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年。
9. 周洁、刘畅：《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研究综述》，《商业时代》2011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海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思考

汪胜洋 王 果

摘要：本文总结了上海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状，结合实际调研，对上海服务外包发展做出了基本判断，分析了上海发展服务外包的优势和存在的不足之处，并结合城市发展总体目标，研究探索上海未来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战略和路径，提出要重点发展金融、航运、研发设计、软件开发等外包服务，同时还要着力集聚外包功能性机构。

关键词：服务外包 现状 思考

作者简介：汪胜洋，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王 果，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

一、上海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现状

据商务部服务外包业务管理和统计系统数据，2012 年上海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51.9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9%；离岸执行金额 36.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扣除补报 2011 年执行的部分，2012 年实际离岸执行金额为 27.62 亿美元，同口径增长 21.7%。近年来，上海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1. 点面结合，覆盖全市。目前，上海市有 5 个服务外包示范区（浦东新区、长宁区、闸北区、黄浦区和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等）和 12 个服务外包专业园区（张江金融信息、张江生物医药、南汇生物医药、卢湾人力资源、陆家嘴信息技术、浦东软件园信息技术、长宁数字媒体、天地信息技术、张江信息技术、金桥研发设计、嘉定汽车研发设计服务外包专业园区以及财经大学金融服务外包专业园区），服务外包重点企业达到 122 家，分布在全市大部分区县。

2. 专业集聚，联动发展。当前，上海 5 个服务外包示范区集中了全市 79.5 % 的服务外包执行金额。有 122 家服务外包重点企业和 283 家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还有 11 个软件出口（创新）园区和 22 家“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重点企业”，基本形成了专业集聚、联动发展的格局。同时，中心城区通过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推进升级效应已经显现，并为长三角乃至中西部地区承接在岸服务外包创造了条件。

3. 信息技术外包（ITO）占据优势，知识流程外包（KPO）占比明显提高。2012 年，上海服务外包实际执行金额为 27.62 亿美元，其中 ITO、BPO 和 KPO 分别占 66.7%、11.0% 和 22.3%，KPO 占比有明显提高。

4. 企业数量持续扩大。截至 2012 年底，全市共有服务外包企业 1246 家，比上年新增 132 家。埃森哲、汇丰和花旗等世界 500 强企业纷纷在沪设立亚太或全球数据处理中心，跨国企业也将财务、人事等业务流程共享中心设在上海，国内知名外包企业也以上海作为重要战略部署地。

5. 从业人员迅速增加。截至 2012 年底，全市服务外包企业已经吸纳就业人员 23.34 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 85.9%，比 2010 年底新增 3.16 万人。

6. 业务来源地广泛。2012 年，居服务外包发包地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日本、新加坡、荷兰和中国香港，业务占比分别为 38.7%、15.2%、6.6%、6.4% 以及 5.8%。

二、对上海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基本判断

（一）产业技术能力领先，服务外包自身发展不足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共同发展，为上海发展服务外包提供了良好产业技术条件。上海市的产业转移从上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开始，轻工业被重化工业逐步代替，产业成功升级，发展出钢铁、石化、机电、汽车、造船、计算机等六大支柱产业，新一轮的发展定位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信息技术的进步带动电子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

但是，良好的产业基础并没有引发上海服务外包的大发展，目前的服务外包无论是

规模，还是外包的专业化程度，都表现出发展不足。更多涉及服务外包的行业、项目没有纳入到外包领域，服务外包的发展势态与雄厚的产业技术能力不相匹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现象严重，内部低水平配套大量蚕食生产效率，同时也制约了服务外包的发展。

（二）城市配套能力领先，商务成本竞争不足

上海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好，服务外包政策环境优。从“硬件”环境来看，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快，起点高，系统较完善，并与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趋于融合，在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核心枢纽高效整合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正逐步形成，这为上海发展服务外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为进一步改善上海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增强城市综合功能创造了有利条件，投资者信心不断增强。同时，上海还具备大量商务配套服务良好的写字楼，招商办、工商、税务等政府部门积极为入驻企业提供热情高效的服务，在楼宇聚集区域逐渐形成集购物、餐饮、娱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商务配套设施。另外，上海的通讯基础设施也相对比较完备，具有先进的国际化的通信服务功能。从政策“软环境”来看，上海针对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资金支持、税收优惠、人才培养等方面给予扶持。

然而，一直以来上海的商务成本过高也是不争的事实。一方面，表现在企业用工成本高：2012年度上海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6300元，而同期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47593元；相应地，上海企业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其他福利费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再加上上海用工比较规范，隐性成本也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对于员工来讲上海的生活成本较高。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研究，2012年上海的房价收入比达11.7^①，位于全国35个大中城市第四位。但是，如果统计纯商品住宅（除去可售型保障房）的房价收入比，上海则以19.1排在全国首位。对于企业来讲，房地产价格高企还导致办公场所租金偏高，尤其是中心城区商务成本的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制约服务外包企业发展的因素之一。

（三）人才基础领先，高端人才不足

上海人力素质整体较高、规模大，人才门类齐全。众所周知，上海人才集聚，在吸引信息技术人才、外语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内

^①房价收入比是指房屋总价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房价收入比=住宅价格/居民有效购买力=(住宅销售单位面积价格×城镇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才高地，是我国专业人才主要的聚集地之一。特别是在国际化人才方面，上海已成为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发展的首选城市之一，并且已经形成了针对人才的市场化配置机制以及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截至 2012 年末，上海市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含独立学院）67 所，与服务外包人才相关的专业人才近 8 万人。全市共有 58 家机构培养研究生。全年在校研究生 12.7 万人，毕业生 3.45 万人。

表 1 2012 年上海市各级各类学校学生情况

类别	在校学生数(万人)	毕业学生数(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	50.66	13.99
中等专业学校	9.88	2.77
职业学校	3.55	1.05
技工学校	0.98	0.30

资料来源：2008 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从从业人员素质看，上海的服务外包企业从业人员素质高于 20 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平均水平，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见图 1-2）。并且上海的人才门类比较齐全，既能够提供发展高端服务外包所需的高层次人才，同时也能够满足发展一般服务外包的大量中低层次人力资源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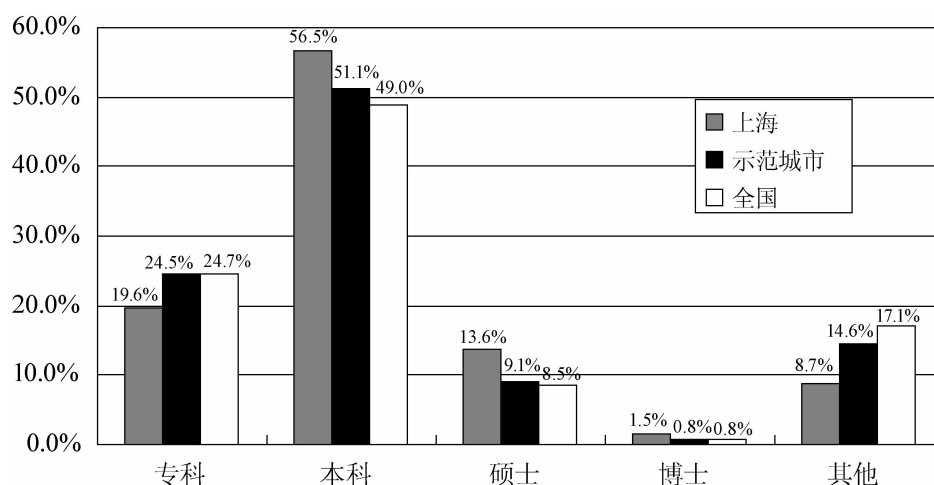


图 1 服务外包从业人员素质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数据计算。

但是，涉及企业发展的高端人才却表现为不足。目前上海在高端人才的引进、居留、税收政策，以及对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安置方面依然存在一些障碍。而周边城市近年

来加大了人才吸引和培训的力度，上海对高端人才的持续吸引力呈相对减弱趋势。此外，人才与服务外包产业需求的匹配性较弱，延缓了上海服务外包增长的进程。目前上海市的人才储备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英语和软件方面的人才在人数和实力方面都占绝对优势，但与外包行业对人才的综合性以及专业性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与印度、爱尔兰等相比，上海英语人才也处于劣势。上海的服务外包企业对项目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市场开拓和营销人才等需求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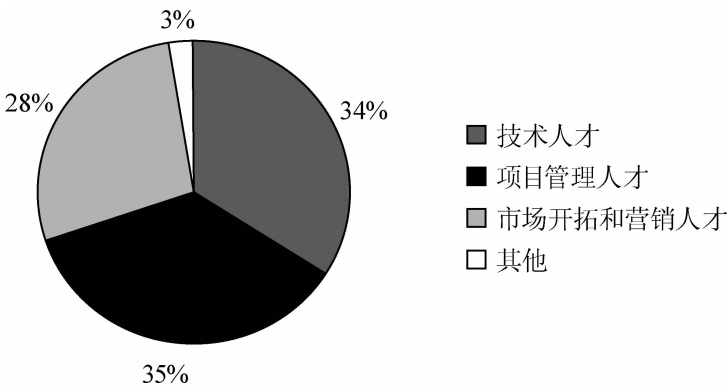


图2 服务外包企业最需要的人才

（四）外包市场发育领先，政府推动力度不足

上海的服务外包市场体系发育相对比较完善，服务外包的市场需求面广，供给形式多，领域宽。上海的信息化建设为信息技术外包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2012 年上海信息服务业经营收入 3628.79 亿元，同比增长 18%，占第三产业的比重达 10.2%，占全市 GDP 总值的 6.1%；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达 959 亿美元。另外，上海在推动服务外包市场发展过程中还特别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明确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为上海市服务外包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负责有关知识产权事务的协调推进工作，在部分服务外包示范区建立了“上海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工作站”，加大对服务外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服务外包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尽管上海是对服务外包产业研究较早、覆盖范围较广、最早出台专项支持政策的省级行政区，我国首批服务外包基地城市之一，首批“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试点城市”之一，但是，政府对服务外包发展的推动力还显不足，特别是一些区县对服务外包的发展意义、发展形势认识不够，因此，在某些方面已被周边城市反超。无论是专项资金、税收优惠、财政支持、金融支持还是人才培养支持、开拓国际市场支持、招商引资力度、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等方面，都不如苏州、无锡、杭州等周边城市，特别是随着商务成本的不断攀升，上海服务外包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政府服务效率、政府工作透明度显

得越加重要。另外，服务外包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要进一步提升，服务外包统计体系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五）国际外包规模领先，大型企业集聚不足

上海服务外包发展起点较高，有辐射内外两个市场的优势。对外，上海凭借国际化优势、多年积累起来的“上海”品牌优势、作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和长三角龙头的优势等，具有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巨大潜力；对内，越来越多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进驻上海，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营运中心落户上海。上海凭借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先发优势等优势，具有服务外包发包、分包、转包的巨大潜力。可以说，上海有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独有的优势，无论是发包还是接包的国际外包，规模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当前上海仍缺乏在全球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大型服务外包企业的集聚度不及大连和北京。IDC 中国软件外包“六小龙”中，没有一家是上海企业；在国际外包服务专业人员协会公布的全球服务外包 100 强名单中，没有总部在上海或者在上海成长起来的公司；而大连的东软、海辉等多次入选。缺乏大型服务外包企业，还与上海目前上规模的服务外包园区数量不足直接相关。当前，上海着重打造的服务外包示范区都集中在中心城区，并且发展规模与周边地区服务外包集聚区相比并不占优势，一些郊县地区尚没有发展服务外包方面的相关规划布局。在 2009 年 5 月由相关机构发起的“中国 10 大最佳服务外包园区”评选中，上海只有浦东软件园入围（见表 2）。

表 2 中国 10 大最佳服务外包园区（2009 年 5 月 16 日发布）

1、中关村软件园	6、深圳软件园
2、大连软件园	7、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软件园
3、上海浦东软件园	8、西安软件园
4、苏州高新区	9、武汉光谷软件园
5、花桥国际商务城	10、成都天府软件园

注：该评选由天津鼎韬外包服务有限公司及其所属的中国外包网发起和实施，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个面向服务外包行业的全行业评选。

三、上海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十二五”是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围绕“四个率先”，上海明确了

加快“四个中心”建设，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从本质上看，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就是要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作为开放型、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在发展服务经济的过程中，要紧紧把握服务全球化带来的重大机遇，结合城市定位积极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产业。

（一）上海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意义

1. 有利于改善上海贸易发展结构，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发展服务外包将有助于上海进一步做大贸易规模，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能级，更为重要的是，增加服务贸易的比重，在促进服务贸易长足发展的同时，将对外贸易的主战场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延伸，不断优化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结构，丰富上海国际贸易中心的内涵。因此，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培育服务贸易新兴经济领域，壮大上海服务经济实力，成为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有力抓手。

2. 有利于促进产业互动融合发展，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金融信息后台服务与金融机构前台服务是上海多功能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发展金融服务外包，有利于促进上海现代服务业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业务关联与融合，提升金融企业的经营效率，有助于完善上海多功能、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另外，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不但体现在先进的港口等硬件设施方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航运服务功能上的国际化、中心化。通过发展航运服务外包，有利于细分航运服务市场，进一步完善上海航运中心的服务功能，加快构筑完整的航运产业链，进而提升上海对全球航运资源的配置能力。

3. 有利于加快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上海服务经济大发展。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意味着对服务业分工的深化、细化，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经济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不但增加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而且在吸引外商投资过程中，构建了新型的对外开放模式，将上海服务经济对外开放推向纵深。特别是通过承接 BPO、ITO，逐渐承担 KPO 等知识、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外包业务，可以提高上海第三产业的附加值，提升上海服务经济的发展层次。

4. 有利于增强上海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上海参与全球化的能力。通过发展服务外包，在上海形成全球服务资源配置中心，有利于提升城市品牌，进而展现上海现代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上海要通过承接高端服务外包项目，率先形成服务外包产业高地，在新一轮全球服务外包竞争中抢得先机，这样既能促进服务外包相关产业链的整合和优化，又能提升上海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布局中的地位。特别是对于涉及高新技术的服

务外包领域，通过承接研发、设计、管理咨询等高端服务外包，有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经营理念，进而推动我国自主创新的发展。

（二）上海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目标

上海是跨国公司集聚的中心，是国际服务外包业务集聚的中心，上海既要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离岸服务外包，积极承接国外企业的服务外包业务，更要发挥跨国公司集聚优势，承接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的子公司发包出的服务外包业务。在功能上要反映出集聚和配置全球服务资源，既要突出集服务接包、发包、转包、分包等业务为主的核心功能，又要体现集信息发布、项目洽谈、业务交流、研究培训等服务为内容的拓展功能。总之，未来上海作为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中心城市，已不单单是离岸服务外包业务的承接地，而是以上海为中心，以跨国公司为载体，服务功能齐全的国际服务资源综合配置中心。

（三）上海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领域

城市对发展国际服务外包领域的选择有多种方法，其中基于要素禀赋性质角度和城市发展目标角度来考察是两种基本思路。朱四明等（2011）构建了基于要素禀赋和自主创新战略的上海服务外包产业选择模型，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探讨。

1. 从要素禀赋性质角度考察。要素禀赋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禀赋性质决定了该国或地区最适于从事的产业和进入这些产业时所采用的技术。对上海而言，发展服务外包的有利禀赋主要包括：完善的教育体系带来的相对较丰富的外包人力资源；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带来的便利交通；高国际化程度带来的语言优势，以及东部沿海的地理位置和长期积淀形成的城市独有的文化精神等。因此，若基于该类要素禀赋，上海则易发展金融服务、研发设计、软件开发、物流服务等发挥自身禀赋优势的外包业务。

2. 从城市发展目标角度考察。国际服务外包在我国属于新兴产业，地方政府在大力推进过程中必然会考虑到要围绕城市整体发展目标进行领域选择。对上海而言，就是要围绕“四个中心”建设目标，将发展国际服务外包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以及国际贸易中心紧密结合起来，与上海未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主线相一致。因此，从城市发展目标角度来看，上海更易发展有利于“四个中心”建设的金融服务、物流服务、研发等服务外包业务。

3. 上海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重点领域。综合以上两个角度考察结果，上海作为经济中心城市，将主要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创新性的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软件开发、研发设计、金融服务、航运物流等外包产业。同时，突出上海作为国际服务外包产业中心城市的资源配置功能，在上述产业发展过程中主要引进相应的功能性机构和

外包核心人才，增强上海城市服务外包的核心综合服务功能和国际竞争力。

（四）上海发展国际服务外包的路径

1. 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是金融市场体系建设，金融后台服务是金融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发展金融服务外包要瞄准高端金融 BPO，重点发展财务技术支持、消费者支持服务、营运流程外包、评估研究、投资研究和技术研究、金融产品开发设计等外包业务，逐步把上海建成全球跨国金融机构的亚太总部中心和服务全球的后台中心，努力从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地区吸引高级金融信息服务人才，将上海建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金融和信息中心，真正成为“世界金融办公室”。

2. 围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大力发展航运物流外包。上海要建设成为资源配置型的国际航运中心，加快发展航运服务体系。因此，上海发展航运服务外包就是要瞄准航运金融、船舶融资、航运保险等高端服务领域，着力搭建第三方物流信息平台、企业对企业（B2B）商务平台，积极培育物流供应链系统集成商（第四方物流）。重点发展与航运相关的物流采购整体解决方案设计、供应链管理系统、物流营运核心业务平台系统、物流调度及路由控制平台系统、物流自动分拣系统等高端服务外包业务，以此加快航运要素市场的集聚，推动航运服务业企业成群、行业成链、要素成市，提升上海在国际航运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3. 围绕上海创新型城市建设，大力发展研发设计外包。上海发展先进制造业，明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离不开技术研发。上海发展研发设计外包就要瞄准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对技术研发中心的引进，同时鼓励制造企业将研发部门剥离，成为能够独立承担外部研发设计业务的外包机构。培育研发设计龙头企业，支持跨国公司将高附加值的研发业务进行外包，不断增强上海的科技创新能力。

4. 围绕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大力发展软件开发外包。上海是我国软件业出口和服务外包的重要基地，上海发展软件开发外包一是要围绕金融和航运产业，积极发展相关软件开发与测试业务，促进金融、航运业的信息化建设；二是围绕上海智慧城市建设，加强对物联网基础技术、关键技术的研究，鼓励相关信息企业积极参与上海城市信息化改造。重点发展云计算服务外包，鼓励国内外企业在上海建立云计算服务中心。

5. 围绕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大力集聚外包功能性机构。上海建设全球城市，就是要成为全球资源的配置中心，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节点和枢纽。因此，上海发展国际服务外包要从提升外包资源配置功能入手，在各领域发展一批共享中心、研发中心、结算中

心等功能性机构，大力集聚企业总部，成为全球国际服务外包的接包中心、转包中心以及发包中心。

四、结 论

技术进步与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服务的跨地域可交易成为可能，服务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服务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服务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服务外包正呈现出领域扩大化、业务高端化、模式创新化、布局多点化以及分工层次化等特点。作为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大国，我国要认清楚承接外包业务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影响，而上海在加快建设“四个中心”，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过程中，更要把握服务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发挥自身国际化程度高、对内对外开放程度高以及人才资源集聚等优势，重点围绕金融、航运、信息等产业，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外包、航运服务外包、研发设计外包以及软件开发等外包业务，大力吸引国际服务外包功能性机构，提升服务外包资源的配置功能。

参考文献：

1. 江小涓：《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人民出版社，2008 年。
2. 卢峰：《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产品内部分工的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
3. 王洛林：《全球化：服务外包与中国的政策选择》，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年。
4. 肖林、马海倩：《“十二五”时期加快建设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思路研究》，《科学发展》2010 年第 3 期。
5. 肖林、任新建：《推进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战略创新》，《科学发展》2009 年第 8 期。
6. 唐忆文：《经济全球化与上海国际服务外包业发展思路》，《上海经济研究》2007 年第 6 期。
7. 喻美辞：《国际服务外包、技术外溢与承接国的技术进步》，《世界经济研究》2008 年第 4 期。
8. 朱四明等：《基于要素禀赋和自主创新战略的上海服务外包产业选择》，《华东经济管理》2011 年第 8 期。
9. 陈景华：《服务业离岸外移的经济效应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 年第 2 期。
10.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0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1. 博彦科技：《印度 IT-BPO（基于 IT 技术的业务流程外包）产业年度报告与回顾（2010）》。

责任编辑：刘英奎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

——国际社会政策模式、经验及启示

李 爽 常兴华 李 欧

摘要：国际社会政策可划分普惠型、补缺补救型、制度型、传统发展型等模式。借鉴国际社会政策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而言，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和福利制度任务艰巨，必须立足经济发展实际水平循序推进；适度普惠和发展型相结合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能是现阶段相对合理的选择；要进一步扩展和完善国家福利体系，也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要有合理的制度设计，要顾及到各社会阶层的利益。

关键词：社会政策模式 国际经验 启示

作者简介：李 爽，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常兴华，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李 欧，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国际社会政策典型模式

社会政策是个国际性并涉及到价值判断的议题。按照西方尤其是欧洲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经验，社会政策被视为现代性的产物，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呈现的结果，它表明了政府干预社会问题、修复社会结构和重塑社会关系的系统努力与制

度设置。就我国来看，随着对社会发展的不断重视，政府对社会问题的干预在不断加深，学术界对社会政策本身的探讨也在不断深入。分析国家社会政策的典型模式和经验，对我国社会政策的出台和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实践看，从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建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开始，社会政策已经走过了 100 多年的路程。尤其自 20 世纪 40 年代后，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和发展，社会政策被普遍当作政府纠正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导致的缺陷、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和推行社会福利服务的有效制度安排。从世界各国社会政策的变化过程看，随着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变化，各国社会政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总体来看，国际社会政策可划分为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一）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普惠型社会政策模式

在当今世界，国家福利体系占主导地位的北欧社会福利模式是最为值得关注的社会政策模式。这种模式以普遍主义和社会平等理念为价值核心，具有高税收、高再分配效应和普惠性等特征，旨在构建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网，对国民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度社会福利。

从政策依据上看，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北欧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发展的导向。由此，这些国家的发展也被 Esping-Andersen（1990）等人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模式。这些北欧国家所形成的社会体制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北欧模式”。

从历史演进看，北欧国家早期社会政策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家庭政策等方面。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北欧社会政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福利国家体系，并走入其独特的“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北欧社会福利模式主要集中在公共福利、社会津贴、社会保险计划等方面。在公共福利方面，北欧国家在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发展了公共服务体系，并由市政府来推进医院、学校、幼儿园等机构的发展。在社会津贴方面，北欧各国政府在战后重建阶段已发展起儿童津贴、残疾津贴和生育津贴体系（Salminen, 1993）。而在政策的制定机制上也具有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色彩，而这一机制的本质是阶级妥协和社会改良（林卡等，2013）。

北欧国家的社会政策都是具有普惠性的。在北欧国家，社会政策常常被看作追求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手段和工具，具有很强的价值导向。“社会福利”概念逐渐超越了传统的以贫困群体或少数福利需求群体等特殊对象所进行的社会救助，转化为以增进全民福祉为目标、带有浓厚的普遍主义色彩的社会政策努力（林卡等，2013）。社会福利内容包含家庭保育、学生教育、失业救助、医疗及工伤保障、退休及养老服务、残疾人服务等。社会福利覆盖所有人群，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移民，也无论是常住人口还是临时

居住。转移支付和社会服务的提供不需要经过财产审核，高收入者、低收入者以及无收入者均被融入同样的福利体系之中。这种社会福利模式创造的不仅是机会平等，而且是结果和尊严的平等，每一个公民都被平等地赋予体面生活、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福利也不仅仅被理解为工资水平和收入保障，而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把它理解为解决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儿童出生率等相关的社会问题的手段。

必须看到，北欧高水平的社会福利是建立在国民经济高度发达、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人口资源十分稀少的基础之上，某种程度上，北欧普惠型的社会政策模式具有不可复制的特点。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补缺补救型社会政策模式

依 1990 年丹麦的安德森创立的福利国家分类方法，福利国家可分成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北欧模式和西欧大陆模式三个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①。这种模式下，基本保险水平相对较低，但国家财政转移对弱势群体进行救助的比例相对较大，具有典型的补缺补救型特点。

以美国为代表的补缺补救型社会政策模式下，中产阶级基本靠市场来获取福利因素。由于自身收入较好，除了国家给的基本保险以外，又通过市场购买了相当一部分福利。如对众多的蓝领阶层，除了依靠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险，还有一部分是靠工会跟雇主、企业主讨价还价地谈判，让雇主为其在市场上购买的。除了国家的基本保险，补充保险具有重要的地位。

相对来讲，以美国为代表的补缺补救型福利制度，基本保险制度简单，层次较少，门槛较低，费率较低，待遇水平也较低，因此支出占 GDP 比重也较低；国民福利在市场上获取的比重较大，即来自第二支柱（企业补充保险）和第三支柱（商业保险）的福利供给比重较大；而国家财政支出的任务是对贫困阶层进行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即采取目标定位式的选择性救助（郑秉文，2009）。

^①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因此也是最早遭遇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的国家。1601 年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通常被认为是开了国家干预社会（济贫事业）之先河，因此这部法律也被后世认为是社会保障最早的源头。英国模式强调的是“国家责任”或“政府责任”，基本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给予”，是以政府提供社会服务这样的“集体供给”方式实施的，其核心是“需要”。由此，“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可以理解为对因市场和家庭作用的缺失而造成社会成员的生活困难时进行补救的社会福利模式，其源头应该在英国。上个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欧美国家纷纷建立“福利国家”。但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各个国家都仍然会依据自己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不同的偏好。有的偏向“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譬如美国，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比英国还英国”。

（三）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制度型社会政策模式

在社会福利理论中，与以“需要”为核心的“补救型”的补缺补救型模式相对应，还有一种称为“制度型”的社会福利模式，这就是“德国模式”或“欧陆模式”。“德国模式”可以理解为以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的基本权利为基础，通过谈判明确国家和雇主责任，从而形成国家制度和社会契约的社会福利模式^①。

从制度角度，在欧洲模式里，制度叠床架屋，层次很多，非常复杂，费率较高，待遇水平较高，企业负担十分沉重，无力发展第二支柱的“市场福利”，国家财政负担较重，能用于社会救助的支出比例较少，因为普遍的高水平保险制度需要财政补贴。正是由于这些原因，在过去几十年里，欧洲大陆模式的改革倾向是降低缴费型福利制度的费率水平，减少普享性支出，强化选择性原则（郑秉文，2009）。

需要注意的是，在西欧国家中，社会阶层间、甚至行业间的流动性都很差。西欧社会福利模式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不是在同一个福利平台上。由此，对社会福利政策的不满，就极易导致社会冲突。

（四）以日韩等东亚国家为代表的传统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

东亚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是西欧国家的模式为基础发展而来，但实际上在其社会福利发展路径和内容上与西欧却不尽相同。因为东亚国家依旧保持着以孝思想为基础的固有传统文化，如家长制度、家庭中心主义和共同体意识等（朴炳铉等，2012）。这些固有文化也反映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正是这些固有文化，使东亚的社会福利和西欧的有所区别。

发展型社会政策模式强调福利政策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参与，同时强调经济政策要有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发展型福利体制还认为，虽然经济发展是经济变革的助推器，但只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结合起来才能减少工业国家的贫困和社会排斥问题，才能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增长成果。如韩国 1995 年首次提出“生产型福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经济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平衡发展。在实现策略上，一是满足社会中最弱势阶层的最基本生活，这样可以鼓励其找到在社会中生活的意义并希望参与到社会中去；二是将福利津贴与就业和人力资源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贡森等，2012）。

^①19 世纪末，德国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并开始崛起，但在当时并未形成有效的社会责任机制。劳资矛盾十分尖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导致了激烈的社会动荡。为此，一批经济学家建立了“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他们认识到：在社会分配过程中存在着“弊害”，主张“现代国家的主要目的，在变更财富的国民分配，而使劳动阶级获受利益”，他们帮助俾斯麦首相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

二、国际社会政策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一）惠及各阶层的社会福利政策更具有可持续性，更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社会政策着眼于社会，某种程度上说，具有普及性、惠及性的社会政策才是真正的社会政策。如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就充分利用了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基本达到了人人享有其该有的社会福利政策。在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在享受国家基本保险的同时，也通过市场购买福利（补充保险）；退休者的收入，既包括基本养老金，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来自雇主为其交的补充保险，从而保证了其社会福利水平维持在一定的水准；对于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比较大，受益人口的比例也比较大；对于公务员，虽然基本保险与企业、私人部门一样，不是很高，但政府为其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又建立了第二层福利保障。可见，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基本是惠及社会各阶层的，在保证社会政策可持续性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维护了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甚至是政治制度的稳定。北欧国家普惠型的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模式，不仅仅在于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更在于其良好的社会环境、相对平等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一个既具有高度民主又具有创新活力的社会秩序^①。当然，这与北欧国家的基本国情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历史发展有直接关系。

相对来说，在西欧模式里，社会福利阶层特点较为明显，西欧国家的社会阶层间、甚至行业间的流动性较差，其所享有的社会福利也有较大的差异。对中产阶级来说，其福利主要来自国家的法律规定，某种程度上说，享有福利特权。但也正是这种特权造成国家的负担非常重。劳工阶级则难以和中产阶级在一个福利平台上，要解决社会地位和福利问题，就要靠工会和国家去争，而不是跟雇主去争（国家把雇主的权利和义务做了规定）。近几年，法国等国家社会冲突不断，与这种块状的、阶层固化的福利制度是不无关系的。

（二）更加积极的福利政策和合理的社会政策内部结构，能保持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

依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各阶层对福利需求的变化，传统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关注点和内容也在不断调整变化。在强调社会政策更加积极的同时，一些国家也强调要保持社会政策内部的合理，要注重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如近年来，一些西欧国家将具体

^①林卡、张佳华：《北欧国家社会政策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

政策的设计由原来追求结果公平转变为机会公平，强调社会福利建设的重心在于为风险社会中的人们提供平等的抵御风险的机会。如德国福利体制改革就“不仅要致力于各种抵御风险的保障，而且还在努力进行‘机会管理’”。福利政策也开始由过去的“消极”变得更加“积极”，强调福利既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义务和责任。上世纪 90 年代，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建设积极“福利社会”的政策主张，认为积极“福利社会”是指在方式上实现从直接给予经济利益转变为投资人力资本，最终通过建立起新的关系，建设富有动力和创新的福利国家。这一改革设想很快得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认同，各国社会民主党将促进就业放在福利制度改革的核心位置，提出了新的福利政策。在积极的福利政策中，传统的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方法被认为根本无法解决失业问题，而通过政府投资来提高工作能力，可以提高个人进入市场和冒险创业的能力。西欧社会民主党引入“工作福利”制度，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的受益规则，要求接受政府福利补助者必须同时接受政府或立法规定的与工作有关的特定义务，建立以提高就业能力为核心的“造血型”福利机制。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在 1997 年设立巨额基金，用于资助青年人和单亲家庭的就业，实施了为年轻失业者就业提供教育培训的“新政”，启动资金高达 26.2 亿英镑。显然，给予“渔”比起给予“鱼”，能缓解财政支出的压力，更能保持社会福利政策的制度稳定和可持续性。某种程度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制，在保证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最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强调要把福利津贴与就业和人力资源联系起来，才能更广泛地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三）从社会福利政策与主权债务危机的关系看，社会福利政策既可以缓冲危机，也可以放大危机

一直以来，对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为民众带来高福利进行称道的同时，也不断充满了质疑，认为所谓高福利会带来经济的低效和社会的惰性、沉重的债务负担和福利的不可持续性等。尤其欧债危机的爆发，加重了这种质疑。

进一步分析欧洲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与欧债危机的相关性，不难看出，福利支出的高低与国家债务并无直接关系。社会保护支出占 GDP 比重最大的国家（如丹麦、法国、瑞典、荷兰、德国等）均超过了 30%，但目前遭遇债务危机最严重的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和爱尔兰等的福利支出却基本上都在 30% 以下。福利支出最高的丹麦债务水平仅为 GDP 的 43.7%，素有“福利国家橱窗”之称的瑞典公共债务也不到 GDP 的 40%，而社会支出占 GDP 约 16% 的爱尔兰，其负债水平却接近 GDP 的 100%。因此，并不能说明福利支出越高债务越严重。实际上，欧债危机政府赤字最高的几个欧洲国家的具体原因

也是有所不同的。

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证据证明高福利会降低一国竞争力。相反，多项研究都证明国民福利与国家竞争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关系，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1-2012 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北欧高福利国家的国家竞争力仍居世界前列，而东南欧的一些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则排名较低。虽然，北欧国家确实在 20 世纪 90 年代曾经经历了经济衰退时期，但北欧各国纷纷对自身的福利制度进行了改革，使其更富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在欧债危机面前显示了其应对危机的能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社会福利政策的设计要依据本国具体国情循序渐进，而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可以成为危机的缓冲器，但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也会成为危机的放大器。

（四）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可能会陷入“增长陷阱”

在经历了 20 世纪 50-70 年代末的增长黄金时代后，拉美国家普遍进入负增长，人们称之为“失去的 80 年代”，但继 90 年代小幅回升期后，进入 21 世纪，人均 GDP 年增长也只有 0.2% 的低速增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粹主义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福利赶超”社会政策。民粹主义在拉美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至今仍然流行甚广。拉美民粹主义在各国的不同时期均有所表现，例如智利（1970-1973）、阿根廷（1973-1976）、秘鲁（1985-1990）、墨西哥（1970-1976）、委内瑞拉（1974-1978）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以劳工利益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反对外国资本实行国有化的民族主义战略，实行财政赤字政策、汇率高估、以控制价格实行补贴等办法干预经济强制提高工资水平等。拉美民粹主义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试图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和超过财政承受能力的补贴政策，学习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以达到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快速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横向比较，由于民粹主义的影响，拉美的社会支出一直以来都比亚洲国家高出一截，社会支出占 GDP 比重从 80 年代的 5% 左右达到 90 年代末的 48% 左右，其中个别国家，如巴西、阿根廷、智利、乌拉圭达到了 60% 或 70% 以上的水平。但是由于社会政策与增长相脱节，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创造不足，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不一定能找到工作，使大幅增加的社会支出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带来的却是全面短缺和通货膨胀上升、财政赤字急剧恶化、实际工资大幅下降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拉美“增长陷阱”及其与之相关的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所提出的警示是，如何在保证大多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福利与增长的关系，这将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重要课题。

三、启示——我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

（一）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和福利制度任务艰巨，必须立足经济发展实际水平循序推进

我国的社会政策经历了改革开放前“城乡二元社会福利、国家承担重要角色”，改革开放后到本世纪初“社会政策服务于经济政策、公共政策局部调整”，再到本世纪以来“社会政策重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发展阶段。

现阶段，我国正在着力推进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社会建设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是社会建设的载体。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政策体系和福利制度，必须慎之又慎。必须充分认识到现阶段乃至未来很长时期，社会建设都将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基础。这方面，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深思，如西欧社会民主党主张的福利国家政策，其实践的基础就是政府的大规模举债和超负荷投入（尤其在选举期间，各国社会民主党为了赢得选票，为广大选民做出了大量不切实际的承诺，对于福利国家建设的过程也大都采取了急功近利的态度，结果造成了政府的财政亏空），最终也会波及劳动力就业、社会保障等社会领域。我国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必须立足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结合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进行政策和项目的安排，同时要根据各个社会群体的实际需要，分轻重缓急循序推进。

（二）适度普惠和发展型相结合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能是现阶段相对合理的选择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也必然不断提升。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福利也正在由过去的补缺型“小福利”向适度普惠型“大福利”转变。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是由政府和社会基于本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向全体国民提供的、涵盖其基本生活主要方面的社会福利。显然，我国的国情和生产力实际水平决定了，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只能实行适度普惠型的福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就现实世界看，高福利制度如果难以持续，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恐怕不比低福利制度带来的矛盾少，我们应该吸取福利国家普遍高福利带来的教训）。

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看，我国正在从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阶段。发展型的社会体制下，市场和社会在逐步发育，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趋势在日益增强，单独强调一种政策将很难达到预期目标。所谓发展型福利制度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追求经济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平衡发展，在推动福利受益者自我支持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就我国来说，相对于补缺型、普惠型的福利制度，发展型的社会福利制度显然是更为合理的选择。现阶段，我国社会政策的设计和福

利制度的完善，必须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既能坚持社会政策的社会目标，又能保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要注重保持社会政策行动中公平和效率的统一。通过设置增进全体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能力的制度安排，实现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融合、互补，提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存量，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看，适度普惠和发展型相结合的社会福利制度，至少在现阶段，仍是相对合理并更能贴近预期目标的选择。

（三）要进一步扩展和完善国家福利体系，也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

近几年来，广覆盖成为我国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的重要取向。这实际意味着我国正在逐步转变过去“小补缺”、“小福利”的状况，逐步向扩展和完善国家福利体系发展。国家福利体系强调公共福利的发展，政府将在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广覆盖、保基本仍将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的重要取向。今后，应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强化和扩展国家福利体系。同时，我们也应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这会有利于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发展型社会福利制度，也必然要求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介入）。但必须认识到，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程度的降低。事实上，“社会福利”的发展与公共福利的发展或者说公共财政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即使社会自行运行的福利体系，也需要政府的推进和公共财政的投入和帮助。而从国内外的实践和经验教训也看出，如果把福利的包袱甩给民间，只能带来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的混乱。

（四）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要有合理的制度设计，要顾及到各社会阶层的利益

近几年来，关注民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成为社会政策关注的主要问题。“更加积极、更加全面”已成为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主基调。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某种程度上，这些也基本成为了我国社会政策的主体内容。

从前述国际经验看，社会福利的几种模式中，注重社会各阶层利益，能较为充分地反映不同群体利益诉求的福利制度，更具有持续性，也更能保障和维护社会的稳定。由此，我国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应充分顾及到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在此基础上，进行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要保证各类人群和地区制度框架的统一与规范，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构建全国性的制度体系。同时，要逐步缩小现有制度下各类群体间的福利差别，保证社会政策和福利制度的稳定和可持续运转。

（下转第124页）

· 名人观察 ·

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智库建设要以搞好研究工作为基础

张卓元

为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要以搞好科学研究工作为基础。下面以最大数量的经济领域决策咨询工作为例作说明。

首先,要认真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其中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从而提高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的水平和质量。我们已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应地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和经济调节也要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从运用行政手段为主转变为以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主配合必要的行政手段,这也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过去的政府经济工作和有的智库向政府提供的咨询与政策建议中,有时做得并不好,如为了短期迅速见效,过多过滥地采用行政手段。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案例,就是前两三年对房地产价格的调控,原来想用行政手段尽快抑制商品房价格上涨过猛,但结果是越调越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看来,要控制住商品房特别是一二线城市商品房价格上涨过猛的势头,主要要采取经济手段,包括控制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增加对商品房的供应、加快保障房建设、实行房地产税抑制对商品房的投机和投资需求等,行政手段虽然较快能见到效果,但过不了多久就会失效,有时还会加倍反弹,带来房价急促上涨。因此,行政手段一般只能作为临时、短期、应急之用,不能常用滥用。

与此同时,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党的基本理论和重要文件决定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 2020 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里说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我们过去研究和阐述较少的问题,治理和管理是不同的概念,我们过去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管理,从管理转变为治理,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是贯彻以人为本,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文明社会的重要条件,很值得学界和智库深入研究。只有研究得比较清楚和深入了,我们提出的各种改革举措和政策建议才不会偏离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不说自明的。

其次,要切实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言献策。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起飞,经济增速连续 30 多年平均达到百分之九点多,到 2010 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仍排在全世界 100 位前后,按国际标准算还有上亿人属于贫困人口。因此,在研究和确定发展战略目标和实施各项经济政策时,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记得 2002 年在研究新世纪头 20 年中国发展目标时,有的单位和学者曾建议以加快实现现代化为目标,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和实际部门都认为,这个目标过于超前了。党的十六大确定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头 20 年的发展目标,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实践证明这是唯一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从这点出发,就要明确,外国再成功的经验和做法,也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运用,切不可照抄照搬,否则,肯定会碰钉子。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否定一般适用的规律性的东西。比如,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否定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是要在中国现实经济情况下,发挥好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把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结合起来,不能完全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国有经济的作用。从中国国情出发,也可以看出,中央最近关于规范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用车、职务消费,规范和缩减“三公”支出、反对奢靡之风的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大得人心的。

第三,借鉴国际经验为我所用。我们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世界眼光,在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奋力前行。为此,我们不仅要很好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而且要认真研究国外境外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吸取其中好的东西为我所用。比如,上个世纪后期有的国际组织提出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和环境的理念,就很值得我们采用。前几年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包容性发展、让人人普遍享受发展成果的设想,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世界银行总结拉美等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也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因为中国正处于从中上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根据国际经验,从中国实际出发,这几年党和政府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让老百姓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方针是正确的、很有针对性的。但是,在实践中,要摆脱原来的路径依赖是很难的,以至于转方式、调结构进展缓慢、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等问题很难解决、居民收

入差距过大现象没有很好缓解。我个人认为,这同有的学者和单位一看到经济增速下滑到 7%左右就沉不住气,建议采取刺激措施要求经济增速保持在 8%以上,而不重视刺激措施带来的不利于转方式调结构以及会加大通胀压力等严重后果,是有一定关系的。有的学者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不屑一顾,认为中国不存在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个人认为,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和道理的,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在一段时间内仍能保持 7%左右的增速,这在世界上也是处于最快行列的。但也不能盲目乐观,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不能掉以轻心,而是要认真对待,要有忧患意识,采取有力措施逐步解决,使中国经济走上持续健康发展的轨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刘英奎

(上接第 121 页)

参考文献:

1. 林卡:《“福利社会”:社会理念还是政策模式?》,《学术月刊》2010 年 4 期。
2. 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0 年版。
3. 熊跃根:《论转型时期我国福利体制的改革与社会政策的发展》,《学习与实践》2010 年第 1 期。
4. 贡森、王雄军、丁宁宁:《“十二五”期间社会政策体系的完善》,中国改革论坛,2008 年 8 月。
5. 宋江帆、袁青:《以欧盟国家社会政策经验看我国社会融合发展》,中国改革论坛,2012 年 10 月。
6. 谭鹏:《全球化时代西欧社会党的福利政策调整及启示》,中国改革论坛,2013 年 9 月。
7. 郑秉文:《中国的社会福利模式应该向美国学习》, http://news.sohu.com/20090924/n266971817_2.shtml。
8. 郑杭生:《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一种中西比较的视角》,《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 第 6 期。
9. 贡森、葛延风等:《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国际比较》,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2 年版。
10. 郑秉文:《国外社会福利模式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豆瓣网,2009 年 4 月。
11. 魏从兰:《北欧社会福利模式的启示与思考》,《合肥工作》2012 年第 1 期。
12. 朴炳铉等:《社会福利和文化》,中国社会科学网,2012 年 8 月。

责任编辑:李蕊

ABSTRACTS

(1) Uphold and Improve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Promot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to Realize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Li Yizhong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evolution of our country, we should first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n the basic economic system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to keep public ownership in a dominant position and have diverse forms of ownership develop side by side, we should advance coordinated, integrative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ones; to strengthen enterprise vitality, apart from deepening ownership reform, we must make efforts in management system, innovation drive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o realize basically new-type industrialization in 2020, we must promote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2) Five Keynote Speeches in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a's Economy (2013–2014)

Zhang Xiaoqiang, Li Deshui, Zhang Yesui, Li Lihui, and He Keng

On December 21, 2013, CCIEE hosted the Annual Meeting of China's Economy (2013–2014) in Beijing. Under the theme of *New Reform Trumpet and New Development Stage*, the Meeting made deep discussions on carrying out the spirits of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Central Economic Working Conference, and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is issue publishes five keynote speeches in the Meeting. Zhang Xiaoqiang discussed the meaning and key measures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Li Deshui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American economy; Zhang Yesui summarized China's diplomatic achievements and proposed main themes of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2014; Li Lihui analyzed the prospect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raised some promoting measures; He Keng studied the important, difficult and hot issues concerning the current and future reform in our country.

(3) Analysi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2013 and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4

Xu Xianchun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parts, of which the first one analyzes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2013, covering the economic growth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and demand, the inflation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nthly and quarterly changes in CPI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PI changes and the relevant price changes, and an examination of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second one sheds ligh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14, covering the economic growth tre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and demand; and the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inflatio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key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CPI.

(4) China's "Two Lines One power" Anti-poverty Mode in the New Period

Yan Kun and Yu Shuyi

Anti-poverty is still an important task in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 anti-poverty becomes more necessary in the new period than before. To achieve the dual goals of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the top priority is to innovate and establish a Chinese anti-poverty pattern. Thus, the mode of "two lines one power" becomes gradually clear, of which "two lines" refer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afety net lines, and "one power" refers to government-led power.

(5) Analysis and Prospect of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Chen Wenling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was complex and delicate in 2013.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d triggere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suffered in an economic woe, took the lead out of the crisis; Japan walked out of the 20-year bout of recessions gradually by money-printing; the European Union economy showed early signs of recovery. Emerging economies faced with higher external risks, aggravated capital outflow, and down-going economic growth. Overall,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still be in a weak recovery under strong policy stimulus in 2014. With the US-led economic alliance, i.e. the FTA strategy of one body and two wings, going to speed up, the world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divide and undergo adjustments.

(6) New Opportunities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from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operation

Shen Danyang

With new trends appear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operation of our country in the new period, the volume of cooperation will keep growing and go towards multinational balanced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New opportunities are rising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operation, including great development of some service industries brought by their opening up, growth of service exports and imports, and going out to invest abroad.

(7) Exclusion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Service Industry

Yao Zhanqi

With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continue to grow, and service industry becomes a hot spot for foreign investment. However,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on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obvious. Compared with tha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is low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the service sector have no effec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service trade. Foreign investment in high-technology services may bring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economic safety of our country.

(8)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in Shanghai

Wang Shengyang and Wang Guo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service out-sourcing industry; basing on investigation and survey, makes a basic judgment of this industry and analyzes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explores its futur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path in line with the city's overall development goals, and suggests focusing on developing service out-sourcing in finance, ship transport, R&D design, and software development, also clustering out-sourcing functional organizations at the same time.

(9) What Kind of Social Policy and Welfare System Do We Need?

——**International Social Policy Models, Experiences and Enlightenment**

Li Shuang, Chang Xinghua, and Li Ou

International social polic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inclusive social policy model of Nordic countries, the remedy social policy model of United States, the institutional social policy model of We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traditional social policy for development model of Japan, South Kore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main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policies reveal that: first,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which cover all social classes are more sustainable and more conducive to social stability; second, positive welfare policy and reasonable social policy structure can mainta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ird, social welfare policy could not only cushion but also amplify the social crisis; finally, populism's "over-welfare" might fall into a "growth trap".

As for China, the mission of improving the social policy system and the welfare system is arduous, and on basis of the actu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should be put forward step by step. It might be a relatively rational choice currently to combine the inclusive social welfare system with development-oriented social welfare system together. And In order to expand and improve the national welfare system, the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ons should be actively encouraged. A reasonable system design is required to build our social policy and welfare system, and so does consideration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interests.

Editor: Xie Yunliang

“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 征稿通知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深切缅怀新四军革命先辈在民族危亡之际砥柱中流，为夺取反法西斯战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伟大胜利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同时昭展丹青名家并推书画新秀；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联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文化部公共文化司等 8 家单位发起“铁的新四军”红色记忆·经典美术作品展活动，参展作品将在全国范围征集，经活动艺委会评选后的 320 幅优秀作品于 2015 年 5 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首展，之后在相关省市巡展并筹台海联展。同时活动中的部分甄选作品将捐由各大博物馆、纪念馆收藏，永世纪念、教育后人。我们诚邀全国画坛诸位艺术家与各界贤达加盟本次展览。

一、组织机构

（一）组委会

主 任：欧阳淞 蔡 武 陈昊苏

副主任：李忠杰 杨志今 左中一 王占生 邓淮生 薛德堂 毋瞩远 黄如军

委 员：张永新 张光东 韩铁成 桂建平 叶小楠 何光耀 乔泰阳 张淮流

刘延淮 周善平 赵黎明 邓小燕 张末生 彭 华 吴长江 赵长青

葛 华 颜 宁 张士明

（二）主办单位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文化部公共文化司 中组部党建读物出版社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国书法家协会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中国海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三）承办单位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四师淮北分会

中海外爱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四）协办单位

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区）美协及新四军研究会

（五）军史专家委员会

寿小松 黄如军 耿成宽 徐维国 王传厚 张学忠 徐君华

（六）艺术委员会

名誉主任：刘大为

主 任：吴长江 **副主任：**徐 里 杜 军 **秘书长：**丁 杰

二、展出日期、地点

2015 年 5 月（拟定），中国国家博物馆

三、展出规模

本次展览展出美术、书法作品 320 余幅，其中特邀美术名家名作百余幅，全国征稿入选优秀作品 100 件，同书法作品共同展出。评选委员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聘请专家组成。

四、作者待遇

1. 该展评选出的优秀作品作者具备申请加入中国美协会员的一次条件。
2. 优秀作品 100 件（税前收藏费：中国画作品 50 件；15000 元 / 件。油画作品 50 件；25000 元 / 件）。
3. 画展将出版画册，每位参展作者均可获赠一本。
4. 组委会向参展作者颁发证书。

五、参展要求

1. 参展作者需提供送展作品照片 1 张（10 寸以上）参加初评，照片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初评入围者接到电话通知后邮寄原作（送原件地址另行通知），同时通过邮局汇寄 150 元评选费进行终评，初评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照片不退。终评落选作品退件。

2. 参展作品一律为原始真实创作，如检测后发现作者使用高仿作品参评，中国美术家协会将在三年内拒绝此作者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任何展览活动。

3. 初评投递作品照片，相同作品照片如反复多次投递，中国美术家协会将视为无效稿件取消参评资格。

4. 送件要求：中国画幅尺寸不小于 6 尺整张，横竖不限；油画画芯尺寸：不小于 1 米×1 米。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用铅笔写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标题（和画面相同）、尺寸（高×宽 CM）、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身份证号码，送件须妥善包装并挂号或特快专递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

5. 收作品照片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5 年 1 月 31 日止，以收到地邮戳为准。

6. 联系方式。收件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沙滩一号院 32 号楼 A 座 710，邮编：100083；收件人：张英财；联系电话：（010）59759683。画展信息可登录 www.caanet.org.cn（中国美术家协会网站）查看。

六、特别声明

1. 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2. 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应视为已确认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中国美术家协会

2013 年 12 月